

延安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毛泽东

建党思想



陕西人民出版社

89352

A84.
57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DF68/21
延安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

范 平 姚 桓 主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

范平 姚桓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6插页 182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5074—2/G·4364

定 价：10.5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总序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的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驾驶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

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的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列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7月1日

目 录

绪 论		(1)
一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杰出贡献	(2)
二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8)
三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	(10)
第一章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成熟期		(23)
一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行动指南	(23)
二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	(29)
三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多方面展开和在全党的确立	(36)
四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42)
第二章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46)
一	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	(46)
二	党的建设主题和指导思想	(51)
三	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59)
第三章 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65)
一	国情与党情	(65)
二	党内最本质的矛盾	(70)

三	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	(75)
四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鲜明特色	(82)
第四章	组织建设的规律	(86)
一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和发展	(86)
二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	(92)
三	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	(97)
四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02)
第五章	建设一个好的党员队伍	(107)
一	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107)
二	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与方法	(112)
三	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120)
第六章	造就治党治国的人才	(132)
一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133)
二	德才兼备与任人唯贤	(136)
三	干部的考察识别与爱护使用	(141)
四	为革命胜利的干部准备	(145)
第七章	开创党风建设的新阶段	(151)
一	以三大作风为中心内容的党的优良作风 的形成	(151)
二	率先垂范，开一代新风	(158)
三	延安整风运动与党风建设	(163)
四	具有中国特色的党风理论	(169)
第八章	实现全党的坚强团结	(173)
一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173)
二	党内斗争的实质	(179)

三	既要反对党内斗争扩大化，又要反对取消斗争的自由主义·····	(184)
第九章	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193)
一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193)
二	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201)
三	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207)
四	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条件·····	(212)
第十章	新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	(217)
一	建国以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和曲折·····	(217)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恢复和发展·····	(224)
三	邓小平执政党的建设思想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突出贡献·····	(228)
四	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240)
五	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	(244)
后 记	·····	(247)

绪 论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它在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自身建设规律的科学，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领导地位、作用和如何实现正确领导的科学。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具有丰富的内容。它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和党的建设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执政党建设中也日益丰富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生 100 周年，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高潮年，也是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最集中最突出的一年。这对于坚持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创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的新局面，

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杰出贡献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必须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原是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国革命又要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历史空前的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同志既不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建党经验，又不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和建党路线，成功地解决了在一个农民国度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局面和新航程。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才建设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活力、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无产阶级的伟大政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只有明确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才能理解党所处的

历史地位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把握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精髓,保证党的建设工作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而这些方面的建设,又是以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为核心的。党的性质问题,实质上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在一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似的国度里,如何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确是党的建设面临的一个大难题。为了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的建党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既反对把党变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又反对把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同时防止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主义,而是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既要坚持工人阶级这个党的阶级基础,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又不能搞唯成份论,把够入党条件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分子排斥在外,同时又要特别注意在思想上对他们加强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同志针对党的特点提出的一条正确的建党路线,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特点和一条极其重要的建党原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杰出贡献,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断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证和基本经验。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又一杰出贡献，是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地联系起来。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党就发展、巩固、壮大；而党的建设得好，就能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离开党的政治路线，就不可能进行党的建设；但是党的建设搞不好，也不可能制定和贯彻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因此，必须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既要加强党的建设，又要坚决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党在各个革命发展的历史阶段制定和贯彻的政治路线是同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共产主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各个革命发展的历史阶段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就不可能逐步达到党的最终目标；而失去党的最终目标，党的政治路线就失去前进的方向。党就是在贯彻政治路线的过程中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毛泽东同志关于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的科学论断，揭示了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又一杰出贡献，是把民主集中制建立在群众路线的基础之上，提高到党的组织规律的高度，并广泛运用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组织活动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理，结合党的建设实践，不断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发展了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他们科学地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既反对个人专制主义，又反对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他们又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阐明了民主集中制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党

的生活中的运用。只有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集中全党的智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贯彻执行，增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保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最根本的组织保证。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又一杰出贡献，是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以及搞“五湖四海”、“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团结干部的方针和公道正派的作风。党在干部队伍建设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上有很大的创造。这在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科学地论证了党的组织路线是党的政治路线的保证这一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干部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党的干部政策应以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强调党的干部是群众的勤务员，又是群众的领导者；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又是人民的公仆；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战士，又是治党治国治军的专家。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干部，同时又强调要在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中锻炼、培养、考察和选拔干部。强调在用人问题上的公道正派作风，反对宗派主义、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强调干部队伍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并确立了一整套团结干部的正确方针和方法。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又一杰出贡献，是把党风问题提到世界观和党性的原则高度，是党同人民群众能否密切联系的问题，是能

否制定和贯彻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保证，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风貌和新的工作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风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三大作风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集中反映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表明了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特有品质，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和革命精神在党风中的集中反映。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能否坚持，党能否防止腐化变质的问题。特别是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党风问题更为突出，党风建设更为重要。党风建设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项成功经验，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而且表明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完备而丰富的内容。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又一杰出贡献，是全面论述了党的领导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原则、条件和方法。坚持和实现党的领导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目标。党的创立和建设的目的就是要使党建设成为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争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出发，科学地论证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是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要实现党的正确的领导，必须制定和贯彻正确

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同时要处理好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一是率领被领导者进行伟大的政治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这是实现党的领导两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就不能实现党的领导。为了实现党的政治领导，毛泽东同志还提出四个具体条件：一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二是发挥共产党员在实现这些具体目标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三是在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四是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党对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特别重视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问题。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领导工作，不断总结领导工作经验，创造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一整套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及抓住中心环节、照顾全局等等，具有普遍意义和重要的指导作用。

上面的论述，只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最突出的贡献，而不是全部。还需要指出的，毛泽东建党思想在基本原理方面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一致的，但又有自己的独创性，具有中国特色。这是同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党内教条主义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神圣化，照搬照抄俄共的经验，曾使党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

建党思想就是在同教条主义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建党思想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有极为丰富的内容，有一系列基本原理，有自己的独创的理论体系。正因为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无论是在过去又联合又斗争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统一战线中，还是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还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样大的动乱中，还是在国际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党都坚持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坚持了党的领导地位和发挥了党的领导作用。如果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过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或者借口历史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就否定毛泽东建党思想对党的建设的指导作用，都是十分错误的。我们要把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否则，就不能坚持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同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新的实际，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建党思想既然是一个科学体系，不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也是不断发展的。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内涵，从横的方面分析，包括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四个方面。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互相渗透，彼此制约，相辅相成的。

思想建设是基础。它决定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并贯穿和渗透其中。主要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

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干部，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决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思想建设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必然使党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走入歧途。思想上的崩溃，必然导致政治上的蜕变，组织上的瓦解，作风上的败坏。

政治建设是根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是为了保证和加强政治建设的。它决定党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政治建设集中表现在正确制定和贯彻党的纲领和路线上。党在执政以前，为夺取政权、争得执政地位而斗争；执政以后，为巩固政权、提高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并为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斗争。政治建设的方向错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必然发生混乱，导致党的瓦解。

组织建设是保证。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要由组织建设来保证和促进，否则，是难以巩固和发展的。组织建设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党员队伍、干部队伍和党的各级组织等方面的建设。这些方面的建设在党的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风建设是关键。它集中体现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的状况，反映党的面貌，对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起着保证、促进、巩固作用。作风建设的好坏决定人心的向背、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总之，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对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忽视和削弱。一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其他方面。每个方面的内容都是很丰富的。四个方面高度概括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面，包括了党的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概括。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内涵，从纵的方面分析，包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党员标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等等。这些方面体现了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内容，也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每个方面都有特定的丰富的内涵，构成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理，组成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首先是确定党的性质，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第二，建设党的目的是为了使党成为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第三，是怎样进行党的建设。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是党的建设的核心，它决定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党的建设的全部活动和一切工作都要受到党的性质的制约，都应体现党的性质的要求。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是党的本质和生命。它关系到党的指导思想和宗旨的确立和贯彻，关系到党的纲领和路线的制定和实现，关系到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的方向，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的确定和坚持。党的性质一变，其他皆变。任何一个方面的变化，都要影响到其他方面，并最终影响到党的性质，影响到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进而影响到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

三、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经验，结合新的实

际，提出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题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并在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贡献是：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创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新局面；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解决了新老干部合作和交替的问题；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把制度建设提到了全局性的地位；确认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科学论断，把党风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他在总结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和国际的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针和原则。

党的十四大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种看法，认为党的建设理论是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现在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建设理论过时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不适用了。这是既不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了解党的建设理论和毛泽东建党思想。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在要求，是为了更好地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加快经济建设，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充分体现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旧的经济体制，不是变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发展、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党

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领导、党的宗旨、党的基本路线和奋斗目标并没有改变，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仍然是党的建设的根本的指导思想。我们要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看待党的建设的问题。当然，对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党的建设工作的思路、组织体制、活动方式、工作方法，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加以改变或改进，对于过去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要结合新的实际继续运用和发展。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不断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力求在党的建设工上有新的创造，在党的建设理论上有新的建树。党的建设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不断改进和加强，使党更有力地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轨道健康发展。但是，党的建设不是服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有它的自身发展规律和本质要求。同时也要看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把党建设成为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组织上更加巩固、与群众联系更加紧密的工人阶级先锋队。

这里着重论述几个问题：

一、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要原则，更应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开拓创新，对于破除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和小生产意识，冲击封闭保守、僵化狭隘等陈腐观念，形成平等、时间、效益、信息、竞争、利益、创新等观念，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其积极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到，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在市场活动中出

现和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合理的。其消极影响，会诱发人们产生损人利己、唯利是图、金钱至上、尔虞我诈等错误思想和行为，甚至可能诱发犯罪和一些丑恶现象。这两方面的作用，不能不对党的思想建设产生影响。党员和党的干部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树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些新的观念，积极引导和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又不能局限于这些观念，停留在这样的思想水平，而应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高的追求。党员和党的干部的思想行为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不管形势和任务发生什么变化，不管政策、体制有什么变化，不管工作内容、重心、方法、条件有什么变化，党员和党的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不能变。必须自觉抵制市场经济带来的消极影响和腐朽、丑恶东西的侵蚀，经得起金钱、权力和其它诱惑的考验。做为社会的成员，党员和党的干部在经济生活中固然要按价值规律办事，但不能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在对待党的事业和党的工作上，决不能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搞等价交换，拿原则作交易，不能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转变为对金钱物质的追求，使自己的党性、人格商品化、市场化。党员和党的干部既要执行党的现行政策，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坚持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保持共产主义的纯洁性。不能因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放弃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也不能因为坚持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就排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中。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就要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既要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地发展，又要提高思想建设的水平。要把思想建设摆

在首位，坚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同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从理论上作出科学解释，在大的原则面前、是非面前，提倡什么、发扬什么，反对什么、限制什么，应有明确的界限，以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

二、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否坚持党员标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是现在的党员是否坚持党员标准，二是吸收党员是否坚持党员标准。什么是党员标准呢？党员标准的根本要求有两条：一条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条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毛泽东建党思想一贯坚持这两条。邓小平同志并作过概括。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①这两条在革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有其时代特点和具体要求，但其根本要求是不能改变的。是否坚持这两条，关系到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能否坚持的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现阶段主要表现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作出贡献。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在现阶段就是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不为现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

^① 《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245页。

而奋斗，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因为现在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是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而奋斗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共产党员要成为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献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带领群众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实绩的先进分子。

在吸收党员怎样坚持党员标准的问题上，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现在有人公开提出，应吸收私营企业主中优秀分子入党。认为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对私营经济等一系列相应政策的问题。理由有四：一是私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补充，从党的建设为经济建设服务出发，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党建工作再把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视为“禁区”，不利于发展和引导私营经济；二是私营企业主与“雇员”的关系，在政治上是平等关系，在生产经营中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在经济上是有偿自愿的，符合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的分配原则；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包括私营企业主的积极性，对那些为“三个有利于”作出贡献并有入党要求的私营企业主中的优秀分子，不应拒之党的大门之外；四是在私营企业主中适当地发展党员有利于加强党对私营企业的领导。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的：

一是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对有剥削行为的人不能吸收入党，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条重要的建党原则，是否能够成为党员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是党员又已成为私营企业主的，能否继续做一个党员，也要贯彻这个原则。

二是生产力标准同党员标准是不能等同的。党员标准不能违背生产力标准，但生产力标准不能代替党员标准。生产力标准主要是指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是指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发展是衡量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但它不是唯一标准，不能用它来代替或一概否定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具体标准。党员有党员的标准，它所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人能够成为党员。这是不能单纯用生产力标准来加以代替的。更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庸俗化，把赚钱与否和赚钱多少作为标准。因此，私营经济在发展生产力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不能以此作为标准发展私营企业主入党。

三是党的经济政策同党员标准是不能混同的。社会上允许的事，在党内不一定允许，甚至是禁止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过，既要“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又要反对资本主义思想的腐蚀，“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① 现在的情况和当时已根本不同了，但是，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对我们观察今天的问题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四是关于在私营企业主中适当地发展党员有利于加强党对私营企业的领导问题，也是值得商榷的。对于私营企业需要加强领导和管理，但吸收有剥削行为的人入党，已改变党员的性质，又怎能达到所提出的目的呢？！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党员队伍既可在价值规律这所大学里受到严格的训练，又要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经受严峻的考验。有些党员经不起权力、金钱、美女的诱惑和资产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1页。

腐朽思想的侵蚀而腐化变质，但整个党员队伍必将在新的考验中不断提高素质，~~增强战斗力~~，更加发展壮大起来。关键是要以毛泽东建党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员标准，加强教育和管理，提高素质，增强党性，使党员队伍沿着正确的轨道健康地发展。

三、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干部队伍和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仍然必须遵循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反对任人唯亲、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德才不能偏废，也不能互相代替，也不能用生产力标准取代德才兼备的标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对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的论述，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在革命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其根本要求是一致的，但其内容则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有其时代特点和具体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坚决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同时又必须具备从事某项工作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才能。在现阶段，衡量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最主要的是看他能否坚决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对干部来说，无论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既有德的要求，又有才的要求；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勇于改革创新，不断开拓经济建设的新局面。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干部，可以有不同的具体要求，但根本要求是一致的。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使干部面临着优胜劣汰的严峻考验；同时，也为培养、选拔干部

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广阔的场所。干部既要学习和掌握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加速经济建设的发展，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按照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富有开拓精神和创造活力的坚强领导集体。这是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要在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努力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适应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积极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和健全符合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同特点的科学分类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坚持。这是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组织保证。但党管干部的方式方法，则是可以多种多样的。党管干部，一方面要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另一方面要有明确的健全的有效的组织制度。要逐步建立健全各个部门和各类干部的管理、选拔、使用、教育、培训以及监督等规章制度，真正做到选贤任能，干部职务能上能下，使一批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使各类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受到有效的监督。

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成为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也是对执政党的严峻考验。必须坚持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则，把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下决心抓出成效，取信于民。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又要坚决反对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把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贯穿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加快经济建设的发展之中。要看到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严重的腐蚀作用，同时也要认识到改革愈深入，市场经济愈发展，法规制度愈健全，也能

堵塞和制止一些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又要创造适应和促进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作风。要结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不断总结新的经验，进行切实有效的教育，制定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既有利于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使党员和干部有所遵循，并能受到有效的监督。要把党性教育、遵纪守法同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加强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要重视经济领域里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而且要重视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正是由于思想上的堕落，政治上的蜕变，才导致经济上的腐败。特别是用人问题上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其危害性更大。作为执政党，廉政建设是很重要的。但廉政建设不能代替党风建设，党风建设有更高的要求。只有坚持党风建设，才能带动、促进和保证廉政建设。当然，廉政建设搞得好，也能促进和加强党风建设。搞好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关键，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发展市场经济中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形象。

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党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是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的基本行为规范。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列宁确立民主集中制这个科学概念和基本原则，到我们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和发展，集中表现在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的结合上。可以说，民主集中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过程。而两者的结合，又是随着党的建设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提高不断完善和发展的。不管党的领导体制、方式、方法如

何改变，党的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如何变化，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必须贯彻的。这是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贯彻，党员和干部是否变质，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能否坚持的问题。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集体，必须坚持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任何个人不能决定重大问题，保证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及其正确和有效实施。必须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进一步发扬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增强党的战斗力。民主集中制能否贯彻执行，关键在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等方面有一系列配套的严格而又容易操作、能够切实有效执行的规章制度。制度建设既巩固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的成果，又积极推动它们发展；既能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又能规范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行为，特别要建立健全党内的监督体系，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够受到及时的严格的有效的监督。制度建设和实施的过程，是不断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过程，是不断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和巩固党的建设成果的过程，也是不断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的改革和加强党的建设的過程。

六、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更应加强，不能削弱。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重视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员教育、管理的直接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同广大群众联系的重要环节，是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的领导的基本组织保证。它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的力量增

长的主要源泉，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如果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瘫痪，没有战斗力，甚至蜕化变质，不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而且整个党有崩溃的危险。要努力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成为团结和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战斗堡垒。农村要进一步搞好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全民所有制企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和完善厂长负责制，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在其他各种经济组织中，也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制度。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等基层党组织，都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现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面临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突出的是如何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快更好地发展经济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各种经济组织中党的建设。要加强调查研究，积极进行探索。不仅要明确规定各类党的基层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和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关的规章制度，使其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面临着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建设的新的形势和新的问题，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当前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历史关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是要全党重视党的建设，把党的建设切实摆在重要的议事日程；二是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党的建设中突出的和深层次的问题，积极探索解决的办法和途径；三是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建

设的经验和教训，提高到规律性上进行探讨；四是研究借鉴东欧和苏联党的教训。既要深入研究党的建设工作中的新的问题，又要提高到党的建设理论上进行探讨，在党的建设理论上有新的发展，在党的建设工作上有新的创造。

第一章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 建党思想的成熟期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已经经历 72 个年头了。在 70 多年的漫长岁月中，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经磨难，愈战愈强，始终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坚强的政治组织。究其原因，这不能不归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不能不归功于在延安时期全党确立的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行动指南——毛泽东建党思想。

一、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 自身建设的行动指南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操纵着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封建统治者丧权辱国，勾结帝国主义残酷压榨中国人民。为此，中华民族多少志士仁人进行过多次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变法维新，武力抗争，乃至搬来西方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但是都失败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先后组建了同盟会、国民党，领导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可是政权又重新落入封建军阀手中，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没有改变，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并没有完成。

正当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苦苦求索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仿效俄国建立布尔什维克党，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得出的正确结论。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它首先诞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落后的东方，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怎样建立共产党，这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遇到的一个新问题。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怎样建设好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的确是一个要在理论和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要完成这个重大课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的经验，是根本不可能的。周恩来曾经回忆：“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②“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③“只有中国党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在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情况下，也能够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这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来。”^④ 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创立和指导作用，我们党才建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呢？毛泽东建党思想即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它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产生、发展和自身建设规律的科学，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1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8页。

③ 同上，第178—179页。

④ 同上，第178页。

的领导地位、作用和如何实现正确领导的科学。

毛泽东建党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含义：

（一）毛泽东建党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理论同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建党思想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①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具体条件和列宁从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的具体条件，有着显著的不同。一是阶级基础的特点和党内主要成份的不同。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尽管中国工人阶级除了具有一般工人阶级的基本优点以外，还有革命性、战斗力很强，与广大的农民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等优点，但是也存在着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等不可避免的弱点。特别是由于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很少，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成分，就占了大多数。如何使党内的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无产阶级化，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显然，不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是办不

^①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240页。

到的。二是革命道路的不同。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党所处的环境。在残酷的战争条件下，在长期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严格纪律的、集中统一的党，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三是要处理的阶级关系的不同。完成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需要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中，如何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和思想上的纯洁性，这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又一个新课题。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具体条件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的具体条件不同，在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摒弃了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的作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的国情和党情进行科学的分析，找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形成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科学体系，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能够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新型政党。

(二)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大致包括，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毛泽东建党思想不是独立于毛泽东

思想科学体系之外的另一体系，而是专指毛泽东思想之中的党的建设理论。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也同样贯穿在毛泽东建党思想之中。如实事求是既是党的思想路线，又是党的优良作风；民主集中制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等等。因此，研究和理解毛泽东建党思想，不能脱离毛泽东思想这个大范畴。在毛泽东建党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系中，把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研究，才能把握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精髓以及它的范畴和基本含义。

（三）毛泽东建党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中国共产党在对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的长期探索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痛苦的教训。对成功的实践经验加以正确的理论概括，反映了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这些正确理论原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应有之义。“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①，从挫折和失败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并从反面得出正确的理论结论，也属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范畴。但是，错误的作法和错误的“理论”本身，这些当然不属于毛泽东建党思想。比如 30 年代初王明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文化大革命”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等等。即使是有些党的建设上的“左”的观点，出自毛泽东晚年，来自毛泽东本人，我们也要把它同毛泽东建党思想区别开来。

（四）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建党思想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

^①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03 页。

的。在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的贡献最大，他的功勋永远不可磨灭。但毛泽东建党思想不只是毛泽东一个人智慧的产物。它是在全党实践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集中李大钊、蔡和森、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的建设上的建树，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理论体系。对此，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中就指出过：“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①一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党的建设中积累起来的丰富而独特的经验是形成毛泽东建党思想最深厚的基础。二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参与了党的建设重大问题的讨论，也就党的建设某些方面的问题提出过卓越见解。这些，或者为毛泽东汇总作了准备；或者被毛泽东汲取、概括在他的著作之中。例如，1929年秋，在周恩来主持下，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党中央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其中不少重要的思想内容被毛泽东吸收在建党建军的纲领性文献——《古田会议决议》之中；首次完整地表述党的三大作风的《论联合政府》，则是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反复讨论研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和毛泽东一起切磋琢磨，并印发六届七中全会征求意见，最后由毛泽东吸取大家的意见修改定稿。三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卓越领导人对党的建设的某些方面所做的系统总结和精辟阐述，或者补充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许多观点，或者与毛泽东论著中的某些观点交相辉映。例如，刘少奇在

^① 转引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出版第508页。

30年代末对共产党员修养的全面论述,40年代初对党内斗争的系统而精辟的见解;陈云对党的干部政策、党的基层组织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具体而深刻的阐述,等等。四是有些党的建设的著作,是毛泽东和其他同志合写的。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篇著作,就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范文澜等几位同志共同撰写的。

正因为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形成固然离不开毛泽东的巨大努力,惊人的才能和智慧,离不开他那丰富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维能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精神,也离不开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创造,更离不开全党的实践和集体的智慧。

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早在准备建立中国共产党时,当时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已经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并且提出了效仿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0年初,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提出:“中国C派(即共产主义者们)的朋友”,应当尽快建立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这个组织“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贫民的劳动家的政党。”1920年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关键则在于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榜样和共产国际的宗旨“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方向和政治风貌阐述得最出色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1920年，在他们之间的相互通信中，共同认为，“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国一致的党。”^①在党的性质上，这个党应该是无产阶级政党，“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它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②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③在党的斗争途径和手段上，“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就是进行“阶级战争”，“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④在党的组织原则上，“党的组织为极集权的组织，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必如此才能养成少数极觉悟极有组织的分子，适应战争时代及担负偌大的改造事业。”^⑤这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探讨，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作了直接的理论准备，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建设理论研究的开始。

从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进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提出了很多关于党的建设的宝贵思想。党刚刚成立，就提出了一个鲜明的革命纲领。党的“一大”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采用无产阶级专政”，“废除资本家私有制”。党的“二大”又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他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193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页。

④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191页。

⑤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第201页。

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大会还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党员个人和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有提议时，得提到上级机关或全国大会‘判决’”，“但在判决期间均须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党的“三大”提出了统一战线的思想。以后，毛泽东、邓中夏、瞿秋白等又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导权以及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光辉思想。在这个阶段的初期和中期，党的路线也是正确的，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的革命积极性是非常之高的。但是，中国共产党当时毕竟还是一个刚组建不久的党。它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但知之不多；刚刚学习使用，还不能完整地、统一地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因此，这段历史时期是基本套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模式进行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党的幼年期”。

这个历史阶段，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基本状况是：

（一）党成立以后，立即投入了伟大的政治斗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建立了统一战线，领导了北伐战争。但是，党对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尚处在从不明确到明确的过程中。

（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确立了，但是没有很好地执行。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很快，但是没有巩固，没有能够使党员、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坚定起来。新党员非常多，可

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工作经验也不少，但是未能够很好地总结起来。

（三）党对中国的社会性质，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和党的建设的规律，都缺乏深刻的认识。党的路线和政策，党的重大政治行动，都是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制定和实行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经常对我们党发号施令，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党还不善于识别，基本上是跟着走。党的工作，正如后来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说的，“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初步形成是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七、八年的路程。在机械地学习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以城市为中心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并遭受许多挫折之后，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果断地带领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把革命发展的重点放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开始了以广大农村为中心，展开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

在毛泽东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同时，党的建设又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红色政权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一个要紧的条件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①也就是说，要有一个“很好的党”。而“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②红军中党组织的成份也大多数来自穿起军装的农民。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思想，来创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5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77页。

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新理论。

由于1929年4月中央派刘安恭带来“二月来信”后，围绕红四军要不要设立军委一级组织以及军委与前委关系问题上的争论，暴露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以及党的建设问题的不同意见，红四军召开了“七大”。但红四军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的见解没有被采纳，并批评毛泽东提出的“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中创造”的见解是对马列主义信任不够，以至党的建设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1929年9月，红四军召开了“八大”，在毛泽东缺席的情况下，这次大会“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

党中央根据陈毅的如实汇报，了解了红四军成立以来的情况及“七大”的争论，同意毛泽东的见解，并由周恩来口授，陈毅记录，经周恩来最后审定，形成“中央九月来信”，交陈毅带回红四军。“中央九月来信”分为九部分，就目前的形势、红军的任务、发展方向和战略、组织与训练、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与群众等，提出了很多正确的意见。它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建党思想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九大”上通过的、毛泽东亲手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邓小平指出：“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①1929年12月红四军第9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

^① 《邓小平文选》第41页。

田会议决议案》对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作了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论述。它的主要内容有 9 个部分：（1）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不正确倾向问题；（2）党的组织问题；（3）党的教育问题；（4）红军宣传工作问题；（5）士兵政治训练问题；（6）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7）废止肉刑问题；（8）优待伤病兵问题；（9）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案》阐述的党的建设的思想，主要有：

1. 党的建设必须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来进行。决议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它们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所构成的，而主观上则“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在党内现有成份的情况下，要保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必须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思想领导，采取各种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来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①

2. 在政治上确立了党在中国革命和革命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决议认为，我们党所建立的军队，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必须执行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为革命斗争和根据地的建设服务。而要保证党的领导的不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正确估量。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87 页。

就是盲动主义。”^① 因此，调查和研究、实事求是，是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3. 在着重思想上建党的同时，必须进行组织上的建设。决议认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之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的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非常之大”，要“努力改造党的组织，务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为此，要厉行集中指导下的党内民主生活，“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要健全党的组织，尤其是基层党组织，做到连有党支部，班有党小组，并正确开展党内批评。在发展党员中，改造旧基础与发展新基础要同时进行。对于“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等，屡戒不改的，不论干部及非干部，一律清洗出党”，“新分子入党”要符合5项条件：（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2）忠实；（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5）不吃鸦片，不赌博。

这些内容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党的建设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已经提出和初步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党的主要活动又在农村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党的思想、政治、组织建设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轮廓。它不仅为红四军，而且为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尽管后来我们党内又发生了“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错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1页。

使党的建设受到很大破坏。然而正是由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和党内冒险主义的失败，在我们党内，正确战胜了错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了教条主义。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此，中国共产党就“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①

三、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多方面 展开和在全党的确立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组成的党中央系统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深入研究了在抗日战争的情况下，在敌后广大的、分散的、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农村，在同中国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中，怎样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问题。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使《古田会议决议》中形成的毛泽东建党思想得到系统的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并被全党了解和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行动指南。正如邓小平后来指出的，毛泽东“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2页。

^②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41页。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辉煌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桎梏，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理论指导党的建设的实践，又用党的建设实践的经验，进一步丰富党的建设的理论。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中指出，中国革命“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①

1937年7、8月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从世界观上揭露和批判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科学世界观和思想路线，成为后来我们党进行延安整风以及党的建设的思想理论基础。

1937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列举了存在于党内生活中的自由主义的11种表现，深刻分析了自由主义的来源、实质和危害，并为巩固党内的组织生活，提出了正确的政治思想原则。

同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党的建设问题。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放弃党的领导的错误，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就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干部政策，党的纪律，党的民主，两条战线斗争，学习等党的建设问题，作了全面的论述。

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加强党的思想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262页。

设，提高党员、干部的素质，1939年5月，陈云写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文章，对党员明确提出了六条标准，即：第一，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第二，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第三，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第四，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第五，群众模范；第六，学习。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讲演，则对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必要性、修养的目的和目标，修养的内容以及方法、途径，进行了系统、全面地阐述。这两部著作充实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内容，也成为后来延安整风中每个党员的必读学习文件。

为了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成熟起来，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共产党人〉发刊词》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它总结了党18年来的领导经验，对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作了理论上的新的概括，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基本原理。

这篇著作阐述的党建理论有：

(1)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党在民主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① 这一精辟的论断，形象地表述中国革命的三个关键问题和党在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作用，阐明了党的建设的重大意义。

(2) 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3页。

具体实践相结合来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命题。这个命题的完整表述，从根本上指明了党的建设的方向。

(3) 第一次提出了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与否紧密联系着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它们之间密不可分、互相制约、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这就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不仅使毛泽东建党思想，而且为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增添了新的原理。

为了完成“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我们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一场普遍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党内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党的自身建设上的一个创举。

在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刘少奇写了《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论党内斗争》、《论党员在组织和纪律上的修养》；陈云写了《党的支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张闻天发表了《组织工作要中国化》、《提高干部学习的质量》，等等。这些文章中提出了许多独创性见解，使毛泽东建党思想更加具体化。

为了组织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毛泽东主持编辑了“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不久又主持编辑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941年5月，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态度，指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才是党性的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具备的态度。这篇文章和不久中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对党的高级干部转变学风，提高对王明“左”倾路线的认识，起了重要作用。

1942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它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不久，他又作了有关文风，即《反对党八股》的讲演。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党员思想上入党的问题。1943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规定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领导革命斗争的基本方法。

在全党普遍整风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全面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王明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的结论，同时阐明了党的政治、组织、思想路线，党的思想建设以及进行党内斗争的正确态度、方针和原则。它的通过，表明党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高度统一，标志着延安整风的胜利结束。

经过延安整风的洗礼，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在延安召开了党的“七大”。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分析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国际国内形势，阐述了党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奋斗的具体纲领，并对党的三大作风作了第一次全面表述。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了全面系统地阐述，从而在全党明确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理论体系。

从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并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行动指南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系统总结和多方面的展开，主

要包括：

（一）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这种路线不是“党内某些同志的自由主义路线”，也不是“无视中国的特点，机械地搬运外国党的建设经验，并把它当作教条而加以绝对化”，而是“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的路线。这条建党路线，概括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本质内容，规定了党的建设的基本方向。

（二）突出强调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抓住了用思想教育、思想入党来克服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决定性环节，从而把握了中国党的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三）把民主集中制提到党的组织规律的高度，并把民主集中制科学地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就在党内组织生活中，确立了正确的准则。

（四）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的错误，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这样就把党的团结与党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增强了党的战斗力、凝聚力。

（五）概括出党的工作作风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并从党性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对党风建设进行科学的论述。这给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对党风建设是极大的促进。

（六）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整风形式的创造和成功运用，树立了解决党内矛盾，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光辉范例。

正是由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成熟和地位的确立，全党在思想

上、政治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和团结，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使我们党顺利地开始了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研究和实践。

四、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延安整风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当我们冷静地总结过去、思考未来的时候，深深地感到，毛泽东建党思想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光辉，恰恰相反，它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都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强大的思想武器。

（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提出和运用，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中国，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条件下，怎样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找不到的。正如列宁指出的，“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你们应当提出这个任务，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解决这个任务。”^①正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的党建理论，解决了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在农村根据地中，武装斗争中以及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中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党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由早期的寥若晨星的若干个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139页。

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拥有五千多万党员的大党；由一个最初手无寸铁，被压迫、被围剿、被屠杀，处于非法地位的党，发展成为一个领导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这绝不是自发地生长起来的。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袖、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建理论原则，长期教育的结果，是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指导下，长期努力建设的成果。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建党思想，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以来，毛泽东建党思想，不仅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保持了党组织的团结统一和坚强的战斗力，而且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毛泽东建党思想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英才，培养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作为一个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必须培养造就成千上万合格的干部和几百个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使中国共产党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经历过延安时期的很多老干部在以后的几十年还深深地怀念着延安整风，感谢着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哺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曾深情地讲，我永远也不能忘记，延安整风是我思想解放的学校，毛泽东是我思想解放的老师。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周恩来总理，生前多次讲，延安整风收获了从来没有的思想上改造的成绩，它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大的。当时很多初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正是在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哺育下，在党的生活和实践中，懂得了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把自己锤炼成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们

中的很多人还讲到延安时期受到的党性锻炼的深刻教育，“回想起来一生中都受益不尽。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自己能有一点分辨是非的能力，特别是在像‘文革’那样混乱时期，能坚持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跟那段时期打下的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这对我的思想成长、革命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一生的革命实践，不论在顺境或逆境中，都起着特别重要的影响，成为推动我前进的力量。”正是毛泽东建党思想培养造就的整整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着以后几十年党的建设的各项工作，推动着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向新的里程不断迈进和发展。

（三）毛泽东建党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怎样才能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呢？首先，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理论要坚持。比如，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基本原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原理；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党的三大优良传统作风和一整套党风建设的理论原则，等等。这些理论原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客观规律，至今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要赋予其新的内容。但是坚持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是坚持的过程和结果。了解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本理论，确认其指导作用，并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它，党的建设才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其

二,毛泽东建党思想不承认任何党的建设的终极状态和终极真理,但它却提供了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党的建设理论的最根本的原则和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① 怎样才能 in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党的建设改革与创新呢?最重要的是把握毛泽东思想(包括建党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值得欣慰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已经掌握了这一原则和方法,并运用这一原则和方法,形成了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这一原则和方法以及不断丰富、完善的新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建设必将带来新的、广阔的前景。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20页)。

第二章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成功地解决了在革命转变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使党不断发展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一、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

1935年10月19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标志着延安时期的开始。也就是在同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进一步向华北发动大规模的侵略，特别是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十分严重而又紧迫的课题和任务。

（一）历史转折关头的中国社会形势与党的状况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芦沟桥事变，中国驻军奋起抵抗；8月13日，日军又进攻上海，上海军民也奋起抗御。从

此，中国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国际格局的势态是：德国和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已经同日本签定了协定，结成了反动的法西斯集团。这个法西斯侵略集团妄图通过战争的手段来重新瓜分世界。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由于他们在中国和东方的利益受到日本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同情中国的抗战；另一方面，它们又企图利用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来削弱和消灭中国和东方的革命力量，并把战争引向苏联。苏联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同情和支持的。1937年8月，苏联与中国签定了互不侵犯条约，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给了中国巨大的援助。

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全中国除了一部分最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其他民族败类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收买充当汉奸而外，整个民族都是要求抗日的。但是，由于各个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同，在抗日问题上又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其中，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抗日的最基本的力量。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则是抗日力量的核心和支柱。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是美英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一方面想通过抗日讨好英美，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则怕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发展，因此往往采取消极、片面抗战的态度。民族资产阶级和由地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开明士绅，由于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他们是动摇于工农革命势力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势力之间的一种中间势力。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能够站在抗日的一边，表现出一定的抗日积极性。但由于他们的软弱性和害怕工农革命力量的弱点，又往往在斗争中表现出动摇，缺乏勇气和决心。

总之，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使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原来一般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变为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日本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即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其他帝国主义同中国的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国内矛盾也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格局的变化，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中国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勇敢地承担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

应该明确，中国共产党经过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锻炼和考验，经过战胜党内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等三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洗礼，已经走上了完全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已经日臻成熟起来，她完全有能力领导起全民族的抗战。但是，也应该看到，历史转折关头的我们党的状况同领导全民族抗战的要求比起来，还是很不相适应的。主要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使党和红军受到了巨大损失，到十年内战后期，党员人数已锐减到几万人，抗战爆发后，虽然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壮大，人数增长很快，到1940年党员人数已达80多万，“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理解，还相距很远。”^①同时，许多党员和干部还不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和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新情况。对党内出现的历次机会主义，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还没有来得及清算。一些犯错误的同志，并没有在思想上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在历史转折关头，在

^①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603页。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自身建设的任务是相当繁重的。

（二）历史转折时期党所面临的任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国际格局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说明，中国人民的抗战不是孤立的，无论在国内或国际，都有广泛的同盟者。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以联合起国际国内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这两篇文章根据中日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的新形势，提出了党的任务和党的建设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

首先，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党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任务。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国内矛盾的变化，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①

其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坚持通过无产阶级及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由谁来领导，“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历史已经证明，离开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革命就要流产。毛泽东说：“依现实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44页。

国就不能成功。”^①在当时，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有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的时候，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因此，“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②

第三，在全党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是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指南针，是克服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思想武器，同时又是向尾巴主义作头争和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条件。

第四，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最好的群众领袖。毛泽东说：“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还说：“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③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和宗派主义，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有的性格和作风。

第五，要发扬党内民主。鉴于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和党的状况，我们党十分强调要发扬党内民主。毛泽东说：“要党有力量，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发动全党的积极性，”“在新时期，集中制应该密切联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3页。

② 同上书，第253页。

③ 同上书，第257页。

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干部。”^①

第六，只有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必须团结全国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为之共同奋斗。而要达此目的，就要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团结为基础。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已经团结得很坚固。这种团结是当前民族和民主革命的最主要的基础；因为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②

总之，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完成党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艰巨任务，党必须大力加强自身的建设。这就是要迅速发展扩大党的组织到全国，同时要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对党的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真正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历次机会主义，特别是三次“左”倾错误，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中心任务进行，并且在国共重新合作、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下，共产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警惕和防止在新形势下新的投降主义的发生。所以，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任务是十分艰巨的。

二、党的建设的主题和指导思想

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期，统一战线中出现了分裂、倒退和投降的危险倾向。蒋介石在日本帝国主义政治诱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0页。

② 同上书，第268—269页。

降的形势面前，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策略。我们党也在不长的时间里，接纳了几十万新党员，党面临着如何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在这种形势和情况下，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迫切需要，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发表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发刊词》。这篇文章，对18年来党的建设的经验作了一个科学总结，提出了党的建设一系列新论断、新理论、新思想，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党的建设的主题和任务

党的建设的主题和任务是什么？这是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和我们党的状况，明确提出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党的建设的这一主题和任务的提出，主要基于这样几点：

首先，它是抗日战争发展客观形势的需要。抗日战争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39年已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抗战三年来我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到1940年，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党员已有80万，军队发展近50万，根据地人口约达100万。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方针虽然没有改变，但他们的政策重点却改变了。抗战初期，他们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有限，不足为患，用其主力向国民党战场进攻，对他们采取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政策。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政策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并把主力转向对付共产党，对我敌后根据地大举进攻。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投降危险也在迅速增长着。1938年12月，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代表的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亲日派

公开投降了日寇，成为可耻的汉奸。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顽固派，由于本身在对日作战中遭受打击和对人民抗日力量迅速发展的仇视和恐惧，在日寇诱降和英美劝降下，则随时准备投降，并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方针。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严重的磨擦事件，企图分裂统一战线，拉中国向后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日益发展着，抗日战争正处在一个紧急的重要关头。毛泽东指出：“当前时机中的特点，一方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日益发展着；另一方面，是我们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而党的任务是动员群众克服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并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不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遭受出乎意料的损失。”^①在这种形势下，党要反对投降、分裂和倒退，要担负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就必须克服和纠正“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扩大党的组织和队伍，坚持党的群众性和先进性，完成毛泽东提出的建党目标和建党任务。

其次，它是党的自身状况对党的建设的要求。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党有了迅速的发展，党员人数急剧增加，他们工作战斗在抗日斗争的各条战线，成为全民族英勇抗战的先锋和骨干。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性的党，也已经是一个群众性的党；而且就其领导骨干说来，就其党员的某些成分说来，就其总路线说来，就其革命工作说来，也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的

^①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565页。

党。”^①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由于抗日战争中党所处的环境更复杂了，加上党的队伍迅速扩大，这一切要求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以保持党的广泛性、群众性，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和巩固性。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有大批的新党员所形成的很多的新组织，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对于老党员，也发生了提高水平的问题，对于老组织，也发生了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问题。”^②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了统一战线；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的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③

第三，它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和建党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把本阶级的利益集中起来又化为行动的政治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它不仅以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而且有一个科学的世界观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有无产阶级的纲领路线和组织原则。毛泽东提出的建党目标和建党任务，体现了党的阶级性、先进性，体现了党的正确的纲领路线和组织原则。它从我们党和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划清了无产

①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566页。

② 同上书，第566页。

③ 同上书，第566页。

阶级政党同一切密谋组织的界限，划清了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界限，使党的建设的目标、任务更加明确、具体，使党更适应斗争的需要，更具有群众基础。

总之，毛泽东和我们党提出的党的建设的主题和任务，既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体现了党的先进性；又反映了抗日战争形势、任务、客观环境对党的建设的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群众性和先进性的高度统一，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二）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

党的建设是有其内在的规律性的。认识这个规律，把握这个规律，并进行正确的总结和引导，这是搞好党的建设的保证。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了我们党 18 年来的经验，指出：“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① 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党的政治路线、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阐明了党的政治路线、政治建设同党的其他各方面建设的相互关系，从而为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历史的经验证明，党要加强自身的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制定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认为，党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它决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斗争，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纲领。它是一面公开的旗帜，体现着党的性质和宗旨。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最

^① 《毛泽东选集》1 卷本第 596 页。

高纲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经过各个历史阶段。因此，党还必须根据各个历史阶段的情况，科学地确定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等根本原则和策略，这就是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纲领，它是总揽全局的，为党的全部工作确定方向、目标和航道，为党的建设指明方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新论断。

其次，在民主革命时期，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中心内容是处理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基本问题。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一方面分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两个基本特点，指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资产阶级建立过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这种统一战线的破裂，同大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进行过严重的武装斗争”^①的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因此，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再一个特点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②这一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所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在整个民主革命过程中党的政治路线必须解决好的两个主要内容。

另一方面，毛泽东论述了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

①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595页。

② 同上书，595页。

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①他还说：“我们党的建设过程，我们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②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同武装斗争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而如果不是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时，那么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要后退一步。从而可以看出，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由此，毛泽东的结论是：“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也就是说，18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③

再次，思想路线是制定和执行政治路线的基础。毛泽东在回顾我党发展的幼年阶段时指出：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此，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没能领导全党巩固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受了资产阶级的欺骗，致使革命遭到失败。党的建设的

①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6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596页。

③ 同上书，第569页。

第二阶段即土地革命时期，尽管资产阶级叛变了，敌人又天天在迫害我们的党，但是，由于有了第一阶段的经验，由于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进一步的了解，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能够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斗争。而一部分同志，由于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因而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跌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在党的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凭藉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① 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回顾和分析，强调了这样一个基本理论和基本事实，这就是：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和贯彻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和前提。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能不能正确地进行党的建设，能不能制定和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政治路线，主要在于是否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而核心是能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统一的理解，能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思想政治路线联系起来，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它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具有重要的现

^①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603页。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建党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党的建设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呈现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党的发展和成熟是同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紧密相联系的；二是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了党的各方面建设。

（一）党的建设的历史发展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发展大体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从1937年到1940年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国际势态的变化和国内复杂的背景，从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大局出发，制定了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坚持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又克服了党内出现的“左”的偏向，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党员人数和党所领导的军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二是从1941年到1942年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政策，使我们的党、军队和边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根据地缩小了，人口下降了，军队减少了，财政经济也相当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党实施了克服困难的各项政策，开展了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粉碎了日寇的“三光”政策和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围困、封锁及其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战的形势和我党我军有了新的发展。

三是从1943年到1945年8月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日本法西斯的失败渐成定局。我们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有效地实施多项政策，并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使党组织和解放区又发展和扩大起来。党胜利地结束了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整风运动，并胜利地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党的建设的一系列新理论、新思想，使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党的建设的过程，就是党领导全民族坚持全面抗战的过程，就是正确处理党的政治路线中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两个基本问题、反对和纠正党内“左”的或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的过程，就是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否则，党就不可能巩固和发展，就不能夺取领导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实践

延安时期（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党不仅确立了以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而且还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使党建理论和党建实践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

1. 关于党的思想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条重要原理。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 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党的思想建设的问题，也作了详细的阐述。为了保证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

^①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1095页。

设的首位，还是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针对抗战的形势、任务以及党内的思想状况，撰写和发表了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为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做了一个总结，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为了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教育，毛泽东与其他几个在延安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合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课本。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成为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教育的极好教材，极大地加强了党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此外，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都是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的极好教材，都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发生过深远意义的影响。特别是毛泽东发动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受到了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时，毛泽东还一贯强调，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首先要在思想上入党。为此，加强对党员，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将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2. 关于党的组织建设。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组织建设关系到党的组织的巩固和战斗力，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的正确贯彻与否。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十分重视党的组织建设的问题。在组织建设方面，主要强调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党要制定和贯彻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

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① 因此，毛泽东对干部问题特别重视，提出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毛泽东认为，在干部工作中，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干部，培养干部，爱护干部，并善于使用干部。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该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

二是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应表现在各个方面。共产党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毛泽东还对共产党员同友军的关系上、在政府工作中、在民众运动中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了详细的论述和要求。在共产党员如何对待个人与革命、个人与党外先进分子、个人与落后分子、个人与犯错误的人的态度上，也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毛泽东以为，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必须扩大党的组织，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他指出：“大胆的发展党是我们已确定了方针。”但是，同时又不可因为大胆发展而疏忽对于奸细分子和投机分子的乘机混入。因此，要贯彻既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混进党内的方针。

三是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和加强党的纪律。毛泽东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要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和积极性，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监督，就

^①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514页。

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加强党的纪律。他反复强调，在党内要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要努力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的泥坑。”他指出，扩大党内民主，应当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同时，鉴于当时斗争的需要和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强调和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并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与此相适应，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还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它对健全党的民主生活，严格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3. 关于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历来把党的作风建设看作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抗日战争特别是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党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更加臻于科学和完备。如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关于动员群众，正确处理军民关系是革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的思想；关于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的思想；关于“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思想；关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关于扩大党内民主的思想；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丰衣足食的思想；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思想等等，都是这个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发展。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党风”这个概念。他指出：学风和文风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全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党整风运动。这

次延安整风，总结了 20 多年来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同时，也使党的作风的思想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了。在延安整风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①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三大作风产生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斗争中，因而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总之，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首先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并且在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套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理论、新经验。1945 年在延安召开的具有决定性历史意义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建党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以来，我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从而标志着毛泽东建党思想已经完全走向成熟。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确立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党的“七大”最伟大的功绩。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来的一系列建党思想和建党理论并没有过时，它仍然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

^① 《毛泽东选集》1 卷本，第 1094—1095 页。

第三章 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刘少奇同志在《论党》中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精髓和实质作了集中的概括，指出，毛泽东的建党路线，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突出特点，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条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原理。这一基本原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破教条主义建党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和中国党的建设实践相结合所得出的创造性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重要发展。正是在延安时期，思想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方法得到系统化，对在中国特殊条件下把党建设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国情与党情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党的建设的理论武器。然而，党的学说反映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般规律，必须和各国党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列宁在俄国创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时就指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

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部分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① 1920年列宁进一步对东方共产主义者提出了希望：东方各国（包括中国）党的建设必须考虑本国的不同特点。然而，完成列宁提出的新任务，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党的建设中存在着照搬党的学说条文和外国党经验的倾向。以党章为例。从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到六大党章，内容几乎全是关于组织建设的条文，对思想建设很少涉及。关于组织建设的规定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组织建设离不开思想建设的指导，而思想建设无疑是在中国建设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重要的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当然与共产国际的片面指导有关。因为一大到六大的党章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制定的。而“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② 当然，也不能把这一缺陷完全归咎于共产国际。问题的关键在于，党自己如何看待共产国际的意见和外国党的经验。如同列宁所说：“要运用别国的经验，简单地了解这种经验或简单抄袭别国最近的决议是不够的。为此必须善于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经验，并且独立地加以检验。只要想一想，现代工人运动已经有了多么巨大的成长和扩展，就会懂得，为了履行这种任务，需要多么丰富的理论力量和政治经验（以及革命经验）。”^③ 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理论准备不足，自己的经验又少，在这种情况下，

① 《列宁全集》第4卷，第187—188页。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2页。

照搬外国党的一些经验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严重的是，在土地革命后期，简单照搬的倾向逐步发展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顽固的教条主义建党模式。

这种模式的显著特征，就是无视中国实际情况，要求共产党主要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大城市活动；片面强调党组织的工人成份，对知识分子采取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度；对党内分歧和同志的错误，简单地用组织手段加以解决，忽视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以至发展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自诩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共产党既然称之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内工人成分就应占大多数，而中国共产党在山沟里活动，党内工人成分大大少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受这种思想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就流行唯成份论观点，甚至把反机会主义斗争变为反知识分子。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问题决议案》提出，要对全党进行改造，使“党的核心建筑在工农的身上”；六大继续片面强调工人成份，在选出的36个中央委员中，有21个是工人，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受到限制，如刘少奇、恽代英等都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总书记，但他实际上并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周恩来语）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这种情况发展得更加严重。苏区一些地方提出“只有真正无产阶级才能加入共产党”的口号，拒绝职员和知识分子入党。1933年苏区中央局在文件中指出，有不少干部把党内非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成份，无差别地当做阶级异己分子和暗探一样看待。这种教条主义建党模式，给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造成很大损失。

和教条主义相反，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建党思想是以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其出发点是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从中国国情和党情出发。毛泽东最早觉悟到对共产国际的意见要独立思考。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遵循这样的思路,土地革命初期他就着手研究中国党建设的特殊问题。他一方面认为,在中国农村的条件下,“斗争的布尔塞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同时又在实践中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新办法,而不是简单照搬外国党的作法;提出对农民进行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古田会议决议》就是这方面经验的初步总结。到达延安后,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在1939年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这个基本原则,并论述了党是否学会运用这一原则,决定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成败。这些论述标志着党已经突破教条主义建党模式,从中国国情和党情的实际出发,解决中国党建设的特殊问题。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他明白无误地指出,认清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要懂得中国”的号召,要求全党一是懂得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二是研究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三是对敌我友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

党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以极大的努力研究中国，通过大量调查和艰苦的理论思考，对中国国情和党情的认识产生了飞跃。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党》等著作中，毛泽东、刘少奇对中国国情和党情作了详细阐述。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现代中国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小资产阶级是可靠的同盟者，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

（二）中国现代经济不发达，产业工人只有二、三百万，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构成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不仅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不可避免地有大批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到共产党内来找出路；也由于党的主要部分在农村，造成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党内工人成分很少。在这种条件下如何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极大的特殊性。

（三）中国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党的任务，基本上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的准备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与此相反，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中国国土的广大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中国革命有可能在农村首先胜利。因此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在长期领导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进行，克服残存的

封建主义影响和落后的小生产意识，成为党的建设的艰难课题。

（四）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因此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党的发展巩固和建设是在武装斗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军队中建党和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成为党的建设的突出任务。

（五）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妥协性、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在特殊条件下（如抗日战争时期）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联中进行的。保持党的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是党的建设的新要求。

（六）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实际斗争，理论准备相对不足，党员的文化水平较低，这种情况给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以可乘之机，尤其是教条主义利用广大党员理论和文化水平低的弱点，打着马列主义旗号借以吓人，曾多次统治全党，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反对错误倾向，坚持正确路线，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二、党内最本质的矛盾

从上述中国国情和党情出发，延安时期，我们党自觉而又坚定地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党建

设面临的特殊问题，对此，毛泽东、刘少奇等在理论上做了科学的论述。

（一）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中国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决定的。

什么是中国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呢？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①毛泽东也指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愿意积极参加革命战争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领导者。大量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党内，壮大了共产党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农民的生产方式是落后的分散的，许多农民（雇农除外）既是劳动者，受剥削者，同时也是小私有者，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农民不可避免的带有某种局限性，如保守、散漫、狭隘，容易因一时地位的改变而丧失革命精神，等等。所谓“农民意识”当然会对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产生影响。在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的小资产阶级具有很大的革命性，然而，小资产阶级革命性在本质上与无产阶级革命性是不同的。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局限性做了具体分析：

1. 在思想方法上，小资产阶级在观察问题时带有主观性和片面性，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实际。其中一部分人脱离生产实际过程，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思想方法容易表现为教条主义；另一部分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受小生产的限制，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容易表现为经验主义。

2. 在政治倾向上，小资产阶级因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的主观性片面性，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有些人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不愿做长期的艰苦的努力，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另一些人或在另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悲观失望，产生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左”右摇摆，好走极端是小资产阶级不稳定的经济地位在政治上的反映。

3. 在组织生活上，小资产阶级由于其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常常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等。”^①

在小资产阶级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可是，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共产党，会带来各种错误倾向。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当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参加我党后，绝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斗争，因而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有些人成为党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5页。

的事业牺牲了生命。然而也有少数人，在他们入党以后，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观点与作风，有时甚至顽固地对抗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作风，企图按照他们小资产阶级的面貌和兴趣来改造我们的党和建立我们党内的生活，这就要在党内引起各种错误和分歧。所以，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实质是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建设党的问题。这个矛盾的发展，影响乃至决定着我们的前途。“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步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它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①

（二）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毛泽东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尖锐指出：“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很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②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共产党人进行的革命就是为了解决矛盾，然而为解决矛盾又必须注意和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唯一的形式，不能用对抗的方式解决一切矛盾。以矛盾特殊性的观点分析，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1页。

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一般说不是对抗性的。因为有这种思想的同志，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政治上是忠于党的事业的，他们在革命的许多基本问题上同党是一致的，对他们的错误思想，是批评和教育的问题。然而，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时，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和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至容易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认为对犯错误的人们给以简单的处理，问题就解决了。结果，“左”倾错误连续发生，一次比一次严重，还使很多同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党逐步找到了从根本上克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的正确途径。这就是“深入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改正的办法”。^①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建设克服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这是毛泽东等人对于党的建设的杰出创造。

总之，以上两方面，决定了“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7页。

三、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

思想入党的核心问题，是要求党员不但在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入党，把自己锻炼和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这方面，毛泽东、刘少奇等辩证地考察组织入党与思想入党的关系，着重论述了两个方

（一）为把党建设成为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克服关门主义，吸收包括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内的先进分子入党。刘少奇明确指出，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入到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吸收了几十万名新党员，其中包括大批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毛泽东还专门为中共中央写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他针对一些军队干部恐惧和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针对一些地方干部不愿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的现象，尖锐地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懂得，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一。因此，他要求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二）组织入党不等于思想入党。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即没有完全达到工人阶级先锋战士所具有的政治觉悟、革命立场、先进思想、

崇高品质。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由于加入我们党的人，不只是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各不相同，而且是带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和动机而来的，如有些农民出身的党员是为“打土豪，分田地”而入党的；有些知识分子是为了解决职业、工作、读书问题，摆脱家庭束缚和包办婚姻而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的。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是从旧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某些党员不免带有或反映一些旧社会的脏东西，正如一个人从污泥中出来，尽管他在不断地清除污泥，但他的身上也难免沾有污泥，这是毫不奇怪的。对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思想入党的概念。然而，思想入党意味着要具备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革命觉悟和优秀品质，这需要进行不懈的思想斗争，抛弃长期生活所形成的错误思想。这对于某些自视清高、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尤其是个痛苦的过程。少数人没有能够完成这一过程，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味道，只有离开共产党完事。为了帮助广大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真正从思想上入党，党中央抓了这样几项工作：

1. 以严肃、扎实、生动、活泼，极有说服力、感染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党员。延安时期思想工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综合性和渗透性，思想政治工作不是当做口号去空喊，而是贯穿在根据地党政机关的日常工作中，体现在革命领袖、老干部、老党员的模范行动之中。当时，毛泽东等人的理论著作，领导人的报告演讲、他们的工作态度、生活方式和待人接物，党的生活中热烈的平等的讨论和民主气氛，边区政府的廉政措施和出色工作，无一不体现着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党员的心田。毛泽东等人在党员心目中不仅是革命领袖，而且是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他们所崇尚的理想人格和道德楷模。这本身不就是最好的思想工作吗。不少经过延安生活的同志回忆，当年，毛泽

东等领袖无半点架子，生活朴素，和边区军民一样住窑洞、吃小米、点油灯、开荒地，毛泽东等还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模范。一位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毛泽东的警卫员很高兴，以为一定会分给毛主席一辆。可是毛主席考虑军事工作需要和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坚持把车分给朱德同志和徐特立等“五老”用。一位老同志回忆说，他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毛泽东在一个纪念会上讲演，很显眼的是毛主席的裤膝盖上有两块大补丁。他头脑中第一个反应是：“共产党的领袖这样艰苦朴素，真是耳目一新，敬仰！”联想到国民党要员的腐败和豪华奢侈，深深感到国共两党不但在政治上、理论上，就是在道德上、灵魂上、精神上，都有根本的不同。讲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就抢救运动的错误主动承担责任，摘帽鞠躬道歉的事在党内传为美谈。当时，党中央毛泽东严肃处理黄克功逼婚一案，也产生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年轻党员和知识青年正是从这些事情中深深体会到马列主义的真理性和共产党的伟大，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以及作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和责任，做出了“得天下者，共产党也”的结论，增强了革命的信念。

2. 强调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那时，党内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要求是严格的、具体的，而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要求党员抓住思想上工作上的关键问题进行检查，而不能就事论事、敷衍塞责。例如，中央宣传部在党风学习结束时曾举行考试，考试题中有：你入党以后如何处理个人利益问题？你过去和现在对党的工作采取什么态度？自己在上述问题上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以后应如何努力？等等。中央材料室的党风学习考试是更加具体的：你入党以后在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曾经发生过问题没有？你是如何认识 and 处理的？有什么经验教训？你还

有什么对党隐瞒的事情吗？有对党不满意的地方吗？你入党后，对党分配的工作是如何对待的？执行的情形和成绩的估计如何？对于领导上有什么意见？今后准备如何工作？你的自我批评精神如何？其他同志对你有什么批评？你的认识如何？有无自由主义的毛病？自己还有什么缺点需要克服？这些问题都要求党员深刻地反省自己，做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

3. 强调共产党员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改造。刘少奇讲过，几个共产党员在大体一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参加革命实践，结果，有些同志进步很快，有的同志进步很慢，有的人甚至在斗争中动摇起来。这是人们主观努力不同的结果。因此，一个人在组织上加入共产党后，仍然应当把自己看作是需要和能够改造的，而不要把自己看作是不变的、完美的、神圣的、不需要改造的、不可能改造的。

4. 要以科学的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是因为它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而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和自己的主观世界。革命理论是党的行动指南，掌握理论是思想入党的根本条件；一个人不学习理论，只讲斗争坚决勇敢，在情况复杂的条件下，就有丧失方向的危险。而学习理论是否有成效，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只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才能了解和掌握这门科学。如果不想革命，那么马克思主义对他没有什么用途的。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去克服自己思想意识中的旧东西，这样就能端正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纯洁自己的思想意识。相反，有的人没有改造自己的决心，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克服思想意识中的旧东西，相反，企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他个人的目的，甚至用他原有的成见去歪曲马克思主义，自觉或不自觉地掩盖真理。这样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共产党员。

因此，一个决心在思想上入党的同志，必须把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的修养统一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

5. 要言行一致，知行合一。这是共产党员最可贵的品德。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的自由主义倾向：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们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不准备实行之，或不准备完全实行之，不准备拿马克思主义代替自己的自由主义。这些人，马克思主义是有的，自由主义也是有的；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两样货色齐备，各有各的用途。这种言行不一、知行相悖的态度和作风是共产党的大敌，也是一个人争取思想上入党的极大障碍。

6. 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入党提出了特殊的要求。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来到延安，很多人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给党的队伍注入了宝贵的新鲜血液。然而，很多人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没有彻底转变，他们主观上是革命的，在思想深处和行动上又与革命需要和群众斗争很不协调，产生了各种困惑和苦恼。如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眼光看现实，不理解“革命圣地”中还有落后的一面；站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立场上，难以接受严格的组织纪律；有革命热情而缺乏坚韧精神，经受不住残酷斗争的考验；有些人孤芳自赏，与群众斗争和群众生活格格不入，感到“怀才不遇”，等等。知识分子的思想入党成为党的思想建设中有特殊意义的问题。毛泽东等老革命家对知识分子是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的。一方面肯定知识分子的优点和对革命事业的宝贵作用，指出他们有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在革命斗争中起先锋和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知识分子的弱点，对他们的思想入党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知识分子党员要勇于正视自己的弱点。刘少奇讲过，产业工人由于对资本家剥削有亲身的体验，所以学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比某些知识分子党员要容易得多。毛泽东说过，有些知识分子只有书本知识而未参加实际斗争，他的知识是不完全的。这些尖锐而又与人为善的话，在当时的确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使不少人猛醒过来。

要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文艺工作者要把立足点移过来，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行动上做到这一点。毛泽东讲的是文艺工作者，实际上也指明了一切知识分子党员自我改造和努力奋斗的方向。

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革命的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群众，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如果不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种结合的作用是双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一方面向工农学习、改造自己，另一方面又要把工农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

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在一起，就要经过长期的甚至痛苦的磨炼，使自己的思想感情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毛泽东曾以自己思想感情变化的经历说明这一点。他说，在旧学校养成一种习惯，不愿意做劳动的事情，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和工人农民及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才逐渐熟悉他们。这时才根本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交给我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

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这叫感情起了变化，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革命领袖坦诚的自我解剖和深刻分析，使知识分子党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对于许多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来说，思想入党比组织入党更重要也更困难，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旧思想的激烈冲突，是人生路上一次艰难的“爬坡”。在党组织的关心帮助下，通过实践锻炼、党内生活的教育和自我改造，绝大多数人完成了这次“爬坡”，达到思想上的飞跃和升华。不少同志以激动的心情讲述自己难以忘怀的思想经历。有的同志这样说：如果说参加党是自己生命的第一次大震动，我的生命上附加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因素，那么这次整风运动是我生命上的第二次震动，使我政治生命中的共产主义因素提到自觉的程度，通过它我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找到了病根及改正的途径。还有的同志说：原来自己是抱着未曾彻底改造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进到共产党里的，经过思想的几番较量，激烈斗争，自己照出自己的原形来了，再也不敢自命不凡了，我的心真正和党的巨大心脏紧紧贴在了一起。这是多么巨大的思想飞跃啊！

可以这样说，延安时期，大批新党员尤其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由幼稚的革命者，锻炼成为成熟的革命家，坚强的“布尔什维克”，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骨干。这是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上的巨大收获。正是这一时期党的思想建设，为中国革命胜利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四、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鲜明特色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经验和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辉煌的一页，是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精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在以下几个方面，它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

（一）决定党的性质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由此，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历来强调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列宁讲过，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基石”和“支柱”建立起来的。然而，对此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显然，如果把成份作为决定党的性质的唯一因素，那么为了保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党就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只能搞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就只能发展工人入党，而把大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拒之门外，党就不能走出狭小的圈子。这样，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是没有前途的。与这种唯成份论的观点相反，毛泽东建党学说认为“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①。刘少奇在《论党》中指出：我们党的性质，是由这样一些因素决定的：党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接受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优良的传统，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党一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正确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指导下发展起来；党有无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5页。

产阶级的纲领和政策；党有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党经过 20 多年革命斗争锻炼，提高了广大党员的觉悟，增强了组织性纪律性；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得到彻底改造，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品质。这些条件，决定了我们党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党。这个党与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我们党以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批驳了单纯从成份判断党的性质的观点，证明在党内工人成份不占多数的情况下，也能够建设成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一新结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和党的建设有重要意义。

（二）党的建设决定于建党路线。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过论述。我们党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党路线这一科学概念。这一概念表明，党的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必须科学确立工作重点并由此规定一系列重大措施。《论党》指出，建党路线决定党的建设，它比党内成份更重要。在党的发展过程中，机会主义路线也反映到党的建设方面，因此，在党的建设工作中，会有错误倾向即错误建党路线的干扰。如果采取错误的建党路线，即使是党内工人成份再多，也不能把党建设好，因为党不能真正体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采取正确的建党路线，即使党内工人成份不占多数，也能够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建党路线决定党的建设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提高党的建设工作中的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并正确进行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

（三）思想建设是组织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所以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十分强调党的组织建设。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阐述了这方面的思想。怎

样进行党的组织建设，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党根据自己的实践指出：“党的组织上的统一首先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造成的思想上的一致为其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党在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党的纪律，就不能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各种分歧，就可能产生；党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就不能胜利。”^① 如果忽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单纯从组织上建设党，就会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我们党提出，把思想上建设党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在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同时，也重视在组织上建设党。这意味着，思想建党是组织上建党的基础，组织上建党是思想上建党的重要保证。这不仅解决了中国特殊条件下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而且从一般的意义上回答了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关系，有助于将组织领导提到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的水平。

（四）对列宁“灌输理论”的新发展。马克思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无产阶级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他强调用先进思想教育工人阶级的必要性，并终生致力于这一伟大事业。列宁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灌输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在工人中自发产生的，它必须在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依靠革命知识分子的理论创造，才能形成和发展起来，并依靠职业革命家的革命活动，把理论灌输到工人中去。列宁的“灌输理论”充分肯定先进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巨大作用，主张用先进理论去教育、武装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由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用社会主义理论教育、武装工人阶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人们是容易理解的。那

^①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第107页。

么，在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先进理论能否掌握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教育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呢？这显然是个新问题。我们党依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做出回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可以克服、改造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可以教育、武装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马列主义具有无可辩驳的真理性和吸引力。同时在我们党内，用马列主义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又是有组织保证的。因为“我们党的党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证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论它是怎样大量地反映在党内，但它在党内是不合法的，并在党的教育和整风中不断纠正，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被不断证明它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使它不断破产”^①。因此，在特定的条件下，以马列主义的真理性和前提，以党纲和党的组织原则作保证，通过党内生活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都能够抛弃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建党学说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是对“灌输理论”的重大发展。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25页。

第四章 组织建设的规律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和第一国际的活动中奠定的。列宁发展了他们的思想，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从组织上建设党，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起来的。在长期党的建设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发展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延安时期，党已经深刻认识到在中国条件下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特殊重要性和困难，并积累了自己独特的经验，极大地提高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从而促进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思想统一、组织团结和行动一致。

一、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和发展

按照什么样的组织原则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党在创建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创始者接受了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陈独秀提交一大讨论的一个党纲就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是民主集权制”。“一大”通过的党纲也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承

认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即“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建立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党章中第一次用“民主集中制”这一科学概念，是在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中，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在党章和党的正式文件上，关于党的集中和纪律方面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具体的，但相对地说，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则比较忽视，缺乏具体的规定。当然，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第三国际和俄国党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党处于军阀统治的黑暗年代，进行白色恐怖条件下的秘密斗争，党内强调高度的集中和严格的纪律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但是，从主观上说，建党初期我们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深刻，对中国国情和对党内实行充分民主的必要性还没有切身的感受，因此，执行民主集中制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由于发扬民主不够，在处理党内关系和党内生活时，往往侧重于集中一面。加上党的领导人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使党内民主很难实行。李维汉在《关于八七会议的一些回忆》中谈到，1927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陈独秀提出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十一条议决案，突出暴露了他的右倾投降主义。当时，任弼时代表团中央提出了批评“议决案”的书面意见，送交陈独秀，陈把材料撕得粉碎，并拒不听取任弼时的说明。与会者不便多发言，十一条议案就算通过了。在革命紧急关头，陈独秀还压制了毛泽东等许多同志的正确意见。陈独秀的家长制加强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的统治地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指出，中央所以陷于机会主义如此之深而能绝

不受警戒的去执行这些机会主义的政策，其原因之一，便是党内情形不好，中央以前不接受群众的监督，不向群众报告，不提出党的政策交一般党员讨论。党里面完全是宗法社会的制度，一切问题只有党的上层领袖决定，“首领”的意见不但应当认为是必须服从的，而且总以为是无可置议的可能，无论如何都是对的。这样，党的民权主义完全变成空话。

在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家长制的斗争中，党内又出现了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有些同志要求无条件的实行党内民主化，常常借此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威，甚至提出了“党内极端平等，绝对自由”的口号，这种倾向对党的危害很大。1929年6月，中央六届二中全会指出，怀着这种观点的同志不懂得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更不懂得在目前党内无产阶级基础削弱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的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同时党在各地必须实行列宁的民主集中制。同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铲除极端民主化和纠正非组织观点，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928年“六大”党章首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三条原则：一是下级党部和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和全国大会选举产生；二是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报告；三是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而切实地执行党的指导机关的决议。党员对党内问题，只有在组织未通过决议之前可以争论。这些原则体现了民主集中制的要求。

“六大”以后，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仍然有所反映，但更突出的问题是党内民主生活不充分，中央领导机关没有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内连续出现了李立三、瞿秋白和王明的三次“左”倾错误，尤其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把集中推向极端，

结果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过程中党内出现的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个人专断、家长制现象在遵义会议前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多次出现。这些错误倾向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我国是一个封建主义历史很长的国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端落后，小生产象汪洋大海。由于一方面，有封建专制主义和小生产的家长制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又有小生产的自由散漫性的广泛影响。因此，很容易出现个人专断和极端民主化的错误倾向。特别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从党内状况来看，党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成分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小资产阶级必然在思想方法、政治倾向和组织生活等方面顽强地表现出来。

遵义会议以后，党中央逐步地解决了党的组织路线问题。1937年5月，在抗日战争前夕，党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提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必须有一个伟大的党，有力量的党。必须依靠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去调动全党的积极性。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实行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看作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①毛泽东在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同时，又重申党的纪律。扩大党内民主的目的是为着发挥全党的积极性，是为着巩固纪律和

^①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增强战斗力，而不是削弱这种纪律和战斗力。

随着党的建设的发展，我们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认识越来越深化，特别是到延安整风和“七大”时，我们党已经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对于在中国条件下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特殊重要性和困难有了清醒的认识，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认识和经验集中体现在“七大”文件中。

“七大”确认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规律，提高了全党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党是由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把党的组织原则提到组织规律上来认识，这是党对民主集中制理论的发展。对于党的组织规律，我们必须认识它、遵循它，而不能违背它。遵照这个规律去建设党，党就统一，就发展；违背了这个规律，党就会涣散、松懈，甚至会瓦解。

“七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作了理论概括和明确规定，指出民主集中制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党的民主制又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状态。“七大”党章制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即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组织作定期的报告；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严格地遵守党纪和无条件地执行决议。

“七大”修改党章报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民主集中制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起来。报告指出，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

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了党内的群众路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产生，必须是先民主，充分在党内讨论，听取广大党员的意见，然后才能有正确的集中。这样的集中，才能为广大党员所理解和接受，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从而自觉地去执行。因此，贯彻民主集中制，既是执行党的基本组织原则，又是执行党的群众路线。

此外，“七大”党章依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各级组织的构成，职权、任务做了比“六大”更为具体、充实的规定。

延安时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集中制，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正确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光辉典范。当时，毛泽东身为党的主要领导人，非常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不管工作多忙，总要亲自阅读群众的来信，对信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或合理要求，他还要记录下来，甚至亲自复信。毛泽东对报纸上的群众来信，也看得很仔细，还用笔对重点做上记号，留作研究问题时参考。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党的“七大”，始终洋溢着非常民主的气氛。毛泽东要求大会每一个报告、决议、文件不仅会前经中央做好充分准备，而且还要经过全体代表详细讨论，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关向应同志当时在医院养病，不能参加会议，毛泽东就派人去看望，将会议情况告诉他，并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为了指导会议进行，经常参加小组的会议，一方面注意听取大家的发言，从中吸取经验，发现问题；一方面又作些启发诱导，让大家更深一步去思考。“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充分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

刘少奇 1941 年在华中局党校作的《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讲话中，曾以理论联系实际、言传身教地讲了党的领导应该模范地执行民主集中制。他回忆了一段亲身经历的事情。那是在建党初期，他受党的委托在一个地方做工人运动工作。那里的工人的斗争情绪很高，大多数的工人和这个支部的党员都主张发动罢工。根据对客观情况的分析，刘少奇不主张罢工。但是党支部的同志和工人们都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他们成立了罢工委员会，选刘少奇做罢工委员会主席，要他下命令宣布罢工。刘少奇说，怎么办呢？如果照大家的意见去做，那么罢工一定是要失败的，工人运动必然要遭受损失，但是如果照自己的意见去做呢，又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自己破坏了组织原则，而且造成自己的孤立，脱离了群众。因此刘少奇照大家的意见发动了罢工，而且积极地领导了这次罢工。不过在发动罢工之前，他就向大家声明：这次罢工是要遭受失败的，不过你们大多数主张要罢工，我就只好照你们的意见去做。后来，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因为在事先已有预防，所以损失不大。大多数同志在失败后，想起了刘少奇事先的估计，因此，对他更信任了。同时刘少奇也在这次罢工中把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同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性统一起来，树立了一个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榜样。刘少奇的这次讲话，使党校学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二、民主集中制是民主与集中的有机统一

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包含着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方面，是党内的民主原则和集中原则的辩证统一。1937 年 10 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指出，民主集中制，“它

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① 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民主集中制就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② 可以看出，毛泽东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科学地认识和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民主和集中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又是可以统一的。它们互为条件，互相依存于一个共同体中，它们既是矛盾的，又是相互不能分离的。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把二者孤立起来，看做是互不相干，没有任何联系，仅从其中的一方或不从联系的方面来看待民主集中制，片面地强调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都不能正确地理解和运用民主集中制。

对民主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阐述得最充分、最完整的是刘少奇。他在《论党》中指出，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物，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所以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党的民主又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就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

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制度，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所以，刘少奇指出，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民主与集中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民主是集体的客观基础，集中是民主的必然要求。如果民主发扬得不好，集中就会失去深厚的基础，就难以保证其正确，甚至会导致独断专行。另一方面，民主与集中之间又是相互制约的。这种制约作用表现在，必须将集中置于民主的基础之上，脱离了这个基础，这种集中只能是错的；民主也必须置于集中的制约下，否则就可能引向极端民主化、分散主义，无政府主义。

毛泽东、刘少奇关于民主与集中辩证关系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毛泽东充分相信群众，他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基于这个认识，他指出我们必须采取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与群众建立起正确的关系。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即党的领导骨干与党内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正是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及体现这个原理的群众路线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运用。毛泽东在工作中善于把握群众的情绪，听取群众的意见，把群众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就是个例子。1941年和1942年，我抗日根据地正

处于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困难尤为突出。在1941年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兵要精，政要简，行政机构要以质取量，提高工作效率。这一提案提出后，一些人不理解，甚至有人怀疑李先生的动机不良。但是，毛泽东对李鼎铭的提案非常重视。他在提案上画了很多红圈，并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同时加了一段批语，指出，这个办法很好。这恰恰是改变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精兵简政”提交大会讨论时，李鼎铭先生发完言，毛泽东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台前，极其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后来，毛泽东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此后，不仅陕甘宁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而且还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精兵简政”政策的实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为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坚持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既要反对片面强调集中而忽视民主的倾向，又要反对片面强调民主而否定集中的倾向，因为二者都是违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都是不符合党和人民利益的。刘少奇在《论党》中，严厉地批评了违反党内民主原则和集中原则的错误倾向。违反党内民主原则的突出表现，是存在于部分领导者中的个人专断和家长作风。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导上的权力，无需由党员群众授予，而是可以自己攫取的。他们的领导地位，也无需经过选举，无需取得党和下级组织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封的。他们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无需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经过群众去决定，而是可以专断的。这些人认为党的法规和决议，是为那些普通人写的，而不是为他们这些特殊的领导人写的。刘少

奇尖锐地指出，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与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另一种是违反党内集中统一原则的错误倾向。它的突出表现是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刘少奇指出，他们不了解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的自由的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纪律，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发展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拨弄是非，或者在党内实行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不顾环境的严重与紧急的情况，甚至利用党员群众一时在思想上没有准备的盲目状态，来表決自己的要求，利用“多数”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企图。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与我们党的民主制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总之，在党内生活中，片面强调民主而否定集中，或片面强调集中而否定民主，就破坏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刘少奇谆谆告诫全党：“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①

在党内的实际生活中，民主和集中这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在发展过程中并不是均衡的。因此，当着发生某种偏离，出现某种错误倾向时，在注意全面把握民主和集中两个方面的同时，适当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这和不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61页。

定一个方面而片面地强调另一个方面的做法有着原则区别。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多地强调民主，或比较多地强调集中，都要根据形势、任务、历史环境和党内生活实际状况来确定。也就是说，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开展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经验证明，在反动派统治的时期，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内集中就表现得多一些，以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在取得政权，特别是在政权巩固以后，就应当不断地扩大民主生活，以调动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在党内生活中，在出现极端民主化错误倾向时，就应相应地强调集中；在出现集中过多和个人专断的错误倾向时，就应相应地强调民主。党的领导人和上级机关应多注意发扬民主；党的被领导者和下级机关应当多注意服从。不过，这种着重强调某一侧面的情形，也绝不是离开民主讲集中，或者离开集中讲民主，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而是为了从总体上更好地把党内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使民主集中制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和执行。因此，无论情况怎么变化，民主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集中总是民主的指导和归宿。在强调民主时，一定要注意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强调集中时，也一定要注意以发扬民主作基础。

三、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设

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实际状况决定了党的建设的特点是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与此同时，党也着手进行制度方面的建设。周恩来最先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建立和推广了党代表和政治部的制度，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在毛泽东早期著作中已有一些关于制度建设问题的论述。1928年《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他

多次谈到红军的党代表制度和在军队及地方政权中实行民主制度的问题。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一文中，明确指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两种办法：不仅要“从思想上肃清”，而且要“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当时提出的制度建设还主要是根据党的建设的实际需要而采取的对应性措施，与之相适应的有关党的制度方面的理论论述也还不够系统和深刻。

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已有明显的提高。我们党明确提出了在制度上建设党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为了避免张国焘事件，使党内生活关系走上正轨，必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专门作了党规党法问题的报告。全会制定了全党都必须遵守的三项重要制度，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和《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又相继制定了一些具体制度，比较重要的有：《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的几个决定》、《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中央关于地方党及军队中党务委员会工作的决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关于党费的决定》等。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七大”党章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包括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它是民主革命时期历届党章和党的其他法规的继承和发展。1948年毛泽东同志还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这些都标志着我们党对制度建设认识的深化，并为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延安时期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主要是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制度。

（一）建立党的集体领导制度

集体领导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党的领导活动中的体现。鉴于王明、张国焘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的教训，为了巩固地建立各级党委特别是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有大多数中央委员出席方得开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到会委员的多数通过而成立，中央政治局规定每三个月左右至少须开会一次，要有半数以上政治局委员到会，会议的决定与通过的文件，须经半数以上政治局委员同意后，认为有效并须立即通知未到会的委员。政治局委员未得到中央政治局的委任，个人不得用中央政治局名义或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言论文件。中央书记处每星期最少须开会一次，集体解决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处理答复各党委的问题。凡用书记处名义发出之训令、电文、文件，须经过半数以上的书记同意后，方得发出。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还明确规定，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常委，须完全执行各该级党的委员会的决定。各级党委的重要文件决议须经多数委员或常委的同意，才能发表。各级党委负责人的重要文章及谈话，在可能时须经其他委员同意后发表。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全党遵守和运用集体领导的原则更加自觉和成熟，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应该指出，“七大”党章在“党的中央组织”中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党章又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样，党的最高权力就集中于一人了。早在1943年3月20日，党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就已推选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并决定书记处

“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①“七大”党章是追认了既成的事实。应当指出，赋予与党的领袖以高度集中的权力，这是战争时期的一项特殊措施。当时毛泽东尊重集体领导，谨慎地行使权力，因此没有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但是，把它作为党内生活的一项制度，是不利于坚持集体领导的。

（二）建立健全党的组织机构和代表大会制度

延安时期，按照战时的客观需要，建立了一整套党的组织系统。到1945年初，中央的组织系统大体是：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下分设3个委员会，即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在3个委员会下，设立26个部、委、局。与中央组织机构相适应，党的地方组织也日益健全。“七大”党章规定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通常情况下，每3年召集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职权是：听取、讨论和批准中央委员会及中央其他机关的报告；决定和修改党的纲领和章程；决定党的基本方针和政策；选举中央委员会。“七大”党章还规定，各级党的组织之最高领导机关，在支部是全体党员大会，在区、县、市、地方、边区、省是代表大会，在全党是全国代表大会。在各级大会闭会时期，由各级大会所选出的党的各级委员会，即为各级党的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

（三）建立党内生活制度

延安时期，我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邓小平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

^①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第369页。

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一整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使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生动局面，迎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四）制定党的监督制度

党内监督制度，是按照党章要求，对党的干部、党员和各级党组织进行监督，使其言论和行动符合党的原则的要求。早在1927年4月召开的党的“五大”上，就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1934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又选举产生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它实际上代行的是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能。这些党的监察机构，在当时由于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和其他原因，并没有能够正常有效地开展党内监督工作。1938年，在《扩大的中央第六次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中规定，由各中央局决定，在区党委之下，设监察委员会，并对监察委员会的职能作了具体规定。1945年“七大”党章在“党的监察机关”一章中，对党的监察机关产生的办法、任务、职权、领导体制都作了规定，指出，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成立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由中央全体会议选举产生，各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由各该地方党委全体会议选举，并由上级组织批准。中央及地方监察委员会的任务与职权，是决定或取消对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诉。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各该级党的委员会指导下进行工作。

四、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在一个小生产者广泛存在的国家里，组织和建设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强调铁的纪律，那么这个党就很难真正无产阶级化，很难领导亿万人民进行英勇的解放斗争。毛泽东建党思想从中国具体情况出发，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党的纪律的思想，成功地建设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延安时期，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领导革命斗争，在党的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指导下，党的纪律建设取得了重要成就。

纪律是我们党的重要武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两个月，我们的部队正挺进敌后打开新局面时，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反对自由主义》，指出自由主义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党的纪律，他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①“四个服从”从总体上确立了党内生活的秩序，构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它的根本出发点，就在于维护和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保证党在政治上和行动上的统一。六届六中全会还作出了关于党的组织机构、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194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再次提出，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8页。

体党员要增强党性，严格遵守和自觉维护党的纪律。1941年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受任于危难之际，担任中共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他在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发表了《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这是一篇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著作，曾经作为党的建设课程的教学用书印发给一些党校学员和干部学习。陈云自1937年冬始任组织部长，他致力于研究党的组织建设，先后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等著作。陈云说：“纪律是我们的重要武器。维护党的统一，不靠刀枪，要靠纪律”，“必须用纪律来约束党组织和党员的行动”。^① 1945年，“七大”党章总纲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的、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织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常注意清除自己队伍中破坏党的纲领和党章、党纪而不能改正的人出党。”这就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提出了根本的指导思想。我们党依靠严格的纪律，先后粉碎了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破坏活动，罗章龙的分裂党的活动、特别是张国焘的分裂党中央的反党活动，维护了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

纪律与自由，是矛盾的统一。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一个有纪律的党，也是一个最讲民主，最讲自由的党。刘少奇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文中，从实质上进行了分析。有的人害怕党的纪律，怕到党内来不自由，因而不参加党。有些已入党的同志要求党给他以自由。刘少奇指出，这种自由实际上是不

^①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第129页。

能实现的，客观上是不能自由的。他引用了恩格斯说的话，自由就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并进一步指出，认识了必然性就有自由，否则就没有自由。按照客观规律行动，才有自由，否则就不自由。我们强调纪律，会不会妨碍党员、党组织应有的民主权力和自由呢？不会的。党的纪律是建立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的，保证党员在党内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就是说，在党组织作出决定以前，每个党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自由地争论。在民主讨论、自由争论的基础上作出决议以后，每个党员在行动上必须服从。如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可以通过组织程序向党的组织直至中央提出上诉。在组织未改变决议前，党员必须遵守和服从。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纪律不仅不会妨碍而且恰恰保证了党员的民主权力。纪律只束缚那些非无产阶级的妨害革命的东西，就像游泳术对于游泳的人只束缚他不要淹死一样，真正的游泳家在水里是自由的，真正的革命家，在有纪律的革命运动里，也是自由的。因此，纪律是获得按客观规律办事的自由的的前提，组织越是健全，纪律越严格，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当然，纪律有强制性。如果不自觉遵守，必须强制执行，明知故犯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而不愿改正者，要开除出党。1939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解放》第73期，刊登了陈云写的《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刘力功于1938年入党，并在抗大毕业后进了党的训练班，当党组织决定他到基层工作中去锻炼时，他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否则就退党。党组织多次找他谈话，并给他一段反省错误的时间。刘力功最后还是拒绝执行党的决定。他违反了“个人服从组织”的党的纪律，又不接受组织的批评教育，因此被开除党籍，并公布于全党。

遵守党的纪律，领导要带头，党员要从自己做起。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是所有党员及各级党组织的最高责任。不管是党的领导人，还是一般党员，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是中央委员会，还是支部委员会，都应毫不例外地遵守纪律。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必须成为严守党纪的模范。正如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指出的，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是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则利用许多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因此，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的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能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避免再发生张国焘事件。延安时期，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带头遵守党纪。毛泽东在西柏坡居住时，经常教育机关的同志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时刻维护群众利益，自己更是以身作则。当工作人员要把他办公室前院的一个猪圈填掉时，他连忙制止，并让保护好猪圈，将来群众还要用。于是工作人员在猪圈上面盖了个顶，把猪圈保存了下来。对于违犯党的纪律的人，当时，党组织是严肃处理。1937年10月10日，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就宣判一个犯了重罪的老红军一事，严肃地指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陈云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党籍》一文中告诫全党说：“遵守纪律首先要从自己做起，要与党内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但尤贵于与自己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①刘少奇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中，列举以下情况与条件，最能看出党员有无遵守纪律的精神：第

^① 《陈云文选》（一九二六——一九四九年），第61页。

一，当领导者在政治上、文化上、能力上、资格上都不如你的时候，你能服从他，并且帮助他。第二，当领导者或多数党委成员发生错误时，你也服从多数，并能保留自己的意见，向上级提议。第三，当你和上级有原则上分歧，意见上的争论时，你仍能服从组织，尊重上级；当党内发生各种严重的思想斗争，有各种错误的思想来引诱你时，你能坚持正派，不为同化。第四，当你同曾经反对过你的人，对你个人有私怨的同志相处时，能在困难和危险时保护他，援助他，实行“以德报怨”。第五，当你在最困难、最危险，甚至威胁到自己的生命时，也能严格遵守纪律，那就是好党员。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容易违反纪律。延安时期，由于中央高度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从中央到党的基层组织，从高级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都把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置于党规党法党纪之下，并同违反党纪的行为坚决斗争，使全党在思想统一的基础上达到行动的一致，保证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延安时期，我们党在纪律建设方面提出的重要思想及实践经验成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

第五章 建设一个好的党员队伍

党员队伍建设的好坏，关系着党和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这是党奋斗几十年得出的宝贵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我们党提出“建设一个最好的党”的目标，并把建设一个好的党员队伍看成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基本的措施。这一时期，党的文件、领导人的著述对党员队伍建设的意义、党员条件和标准、党员队伍的思想教育、组织发展、监督管理等问题作了深刻地论述，从而形成了毛泽东建党学说中关于党员队伍建设的理论体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理论宝库。

一、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建设一个好的党员队伍，明确党员标准即党对党员的要求（包括基本要求和具体要求）是首要条件。党对党员的要求既是发展党员的依据，又是教育党员、规范党员行动的依据，同时也是衡量党员是否合格的准绳。从党的历史看，我们党对党员的最基本要求——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始终是不变的，但是党对党员的具体要求是随着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不仅没有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且呈现越来越高的趋势。例如，“一大”的党员标准是要求党员承认党纲，即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

级专政。《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的党员标准有五条，即政治观念无错误、对党忠诚，有牺牲精神，不发洋财，不吃鸦片和不赌博。这些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延安时期，我们党根据新形势和新任务，提出了更高、更严格的党员标准。

（一）共产党员应成为民族战争中的模范

我们的抗日战争是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除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之外，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无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等，也是形成这种困难环境的重要因素。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责任。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对共产党员提出具体要求。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中，应该是非常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①共产党员在群众工作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②在思想作风方面，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此外，共

^①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487—488。

^② 《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488页。

产党员还应成为学习的模范，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毛泽东从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工作、政府工作、群众工作、思想作风及学习等几方面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员提出了具体要求，为这一时期党员队伍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1939年5月，陈云依据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共产党员要在民族战争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精神，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中进一步阐述了做一个好党员的六条具体标准。

1. 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陈云认为，一个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更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终其一生。只为当前任务奋斗，而不愿为党的最高纲领而奋斗的人，是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后来，陈云到马列学院讲课时，专门解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含义。他说，“到底”究竟是什么意思？用上海人的话说，就是“翘辫子”，奋斗到底。他还讲怎么叫到底，怎么叫不到底。他说，陈独秀、顾顺章、张国焘，就是没有到底。再说，比如监狱叛变、战场逃跑，受金钱美女的利诱等等，总之是只想到个人的得失进退，就不能到底。一个共产党员如何做到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呢？陈云认为，首先就要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的前途；其次，每个党员必须具有英勇牺牲的决心和百折不挠的毅力。因为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在曲折险峻的革命道路上，革命者必须经历长期的艰苦和波折；在与敌人经常的斗争中，在每一事变的紧急关头，还有牺牲的可能。因此，每个党员不仅要坚信共产主义的必然实现，而且必须对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不怕牺牲、不怕困难和奋斗到底的决心。这是做一个好党员必须具备的首要条件。

2. 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陈云指出，共产党员是在党的领导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党员的利益同民族的、人民的和党的利益也是一致的。但是，在革命工作和党的工作中，也可能发生党员个人的利益与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情况。在这样的时候，每个党员必须依靠他对革命对党的无限忠诚，坚决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革命的和党的整个利益。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把革命的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不仅要在思想认识上懂得这个道理，而且要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动摇地执行这一条。这是做一个好党员最根本的条件。

3. 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陈云指出，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是党员的义务，一个党员不仅应该与一切破坏党纪的倾向作斗争，而且要着重与自己的一切破坏党纪的言行作斗争，使自己成为遵守党纪的模范。一个好党员，不仅在于他能够在党的会议上和稠人广众之前声明拥护并举手赞成党的路线和各项规定，而且在于他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表示出自己是坚决地遵守党的铁的纪律的模范。严守党的秘密是党的纪律的一个重要方面。陈云针对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存在的忽视秘密工作的倾向，强调每个党员必须高度地提高政治警惕性，严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并且与一切忽视、破坏党的秘密工作的危险倾向作斗争。任何党内的不对外公开的事件，不准任意向党外宣传；任何对其他党员没有必要说出的秘密事件，不准在其他党员中乱说。这是做一个好党员必须具备的重要组织条件。

4. 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陈云指出，实现党的决议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共产党员必须有大无畏的百

折不挠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共产党员不仅在日常工作中要忠实于党的决议，而且要在困难中，在生死关头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有党监督时，而且要在没有党监督时，忠实于革命和党的决议；不仅在胜利时，而且要在失败时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只有具备这样坚定和顽强的英雄气概，才配称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是做一个好党员必须具备的重要政治条件。

5. 在各方面成为群众的模范。陈云认为，党员无论何时何地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非党群众一种好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共产党员必须在英勇作战、政治工作、团结统一、遵守纪律、民众运动、统一战线、政府工作等各方面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使自己真正成为广大群众的表率 and 榜样。陈云还指出，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还表现在对于革命利益严肃的立场上面，对于一切为国为民的事业，应该始终不变地坚持自己的立场。任何威胁，任何利诱，都不能动摇自己的立场。谁要是放弃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

6. 努力学习革命理论和各种知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其间必然会遇到各种复杂曲折的情况，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和变化多端。为了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每个党员都必须认真学习革命理论。只有掌握了它，才能从复杂万分的事情中弄出头绪。从不断变化的运动中找出方向，才能把革命工作做好。共产党员不仅要学习革命理论，还要学习军事技术和文化知识，尤其重要的是还要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共产党员的口号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陈云认为，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才不致玷污了这伟大而光荣的党员的称号。

在今天看来，这些好像都是普通常识，但在那时，却是极为

宝贵的党建教材，对于党员起着极其重要的教育作用。据延安马列学院学员谢中峰回忆，他是1932年加入共青团并转为共产党员的，曾在白区做过一些工作，住过监狱，曾担任过开封共青团市委书记和豫西特委宣传部长等职务，但不知道什么是党的建设，也没看过党纲党章。自听过陈云的讲课后，才如梦初醒，好像才认识了党，才第一次入党，才懂得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了。^①尤其是陈云关于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一段话，几乎所有的听课者都铭记不忘，感到终生受益。许多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那样风浪考验过来的老同志，都深切地体会到，在最艰难的时刻精神上支撑自己的也还是延安时期在头脑中扎下根来的这些基本观念。

二、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和方法

（一）“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方针

党组织的发展是同党进行的实际斗争紧密相联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发展党员的经验 and 极少数人叛党、脱党的教训，并从党转入秘密斗争的需要出发，对发展党员作了严格的规定，从而使党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得以恢复和发展。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党面临抗日战争的新任务。新的斗争形式，要求有新的组织形式，要求党的战略策略、工作方法等也要有相应的改变。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了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的任务，强调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会议

^① 《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第1版，第91—92页。

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对发展党员的方针和标准等问题作了原则规定。《决议》指出：“在新的大革命中，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各方面的工作。”针对过去发展党员中过份强调社会成份而忽视政治标准的倾向，《决议》明确提出发展党员的主要标准是：“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1938年3月15日，党中央针对当时党的组织力量远远落后于党的政治影响的情况，专门做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对发展党员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决议》指出：“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同时《决议》还强调：“严防汉奸、托派分子、阴谋家、投机家混入党内，但不能因此妨害党的大量发展。”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中总结抗战以来发展党员的工作，明确提出了“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同志一方面强调，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另一方面又指出，在敞开大门发展的同时，对于奸细伪装积极企图混入我们党内的情况，一刻也不能放松。“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这才是正确的方针。此后，中央在1939年12月又提出大量

吸收知识分子侵入党的问题，要求各地党组织应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所谓“大胆发展”是指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发展党员工作，在行动上要积极主动做好发展党员工作。任何消极等待或关门主义都是错误的。所谓“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指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履行入党手续，不能把不够党员条件的吸收入党，尤其要防止坏人混入党内。这一方针体现了积极与慎重的辩证统一，注意数量与注重质量的辩证统一。综合这一时期中央文件和领导人的著述，这一方针的具体要求及政策界限是：

1. 在发展对象上，既要重视吸收工人入党，又要注意到贫苦农民和知识分子成份。同时还要特别注意吸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妇女入党。共产党应当首先把工人阶级的一切优秀分子吸收入党，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骨干，这是党的性质决定的。“但是，也必须指出，共产党并不是‘工党’，而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锋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因此，不是全体工人都可以加入党的，而只是工人阶级中最觉悟、最积极和最忠实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优秀分子。”^① 在重视吸收优秀的工人成份的同时，还必须重视吸收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贫苦的农民仍然和必将成为无产阶级最有力的联盟者。因此，大量吸收他们中的积极分子到党内来，使自己在农村中的社会基础放在农村无产者和贫苦农民分子的上面是完全必需的。”^② 同样，在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使他们成为党与群众之间的必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 第 67 页。

② 《陈云文选》1926—1949 第 68 页。

要的桥梁。我们党应该吸收许多能够献身于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事业的革命知识分子入党。”^① 在知识分子中，贫苦的知识分子是我们党发展的最好对象。此外，党还应该特别注意吸收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妇女入党。妇女占人口的一半，“没有妇女参加革命，革命就不能胜利。”^② 要反对借口中国社会男女不能接近而放弃共产党员介绍女党员的任务。“每个共产党员首先是女共产党员应该把发展女党员当作重要工作之一。”^③ 对于其他阶级出身的分子，“党并不拒绝将他们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但是他们必须放弃自己原有的非无产阶级的、非共产主义的立场，承认党纲党章，才能允许加入党的组织。”^④

2. 在发展党员工作中，既要严格入党条件，又不能任意提高党员条件。如：每个入党者要承认党纲，“但这并不是说要把精通党纲作为入党条件。因为精通党纲，是要有理论修养的人才行的。如果要求加入党的人特别是工人、农民，必须精通党章党纲之后才能入党，这样不仅会把许多要求入党的革命的优秀分子拒之门外，而且也是否认了党对于党员的教育的责任。”^⑤

（二）个别吸收的原则和方法

发展党员既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需要，又是广大先进分子的心愿和要求。这项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我们党历来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抗战时期，我们党总结以往发展党员工作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个别吸收的原则和方法。1937年5月《苏区党代表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 第 68 页。

② 《陈云文选》1926—1949 第 68 页。

③ 《陈云文选》1926—1949 第 69 页。

④ 《陈云文选》1926—1949 第 69 页。

⑤ 《陈云文选》1926—1949 第 66 页。

会议组织问题报告提纲》指出，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上，应该严守个别吸收的原则，应该成为一种经常的有系统的工作，要反对把党的发展做一种运动式的突击。“七大”党章规定，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成批集体地入党，是不能认为有效的。

所谓“个别吸收”，就是通常说的成熟一个，发展一个，个别履行入党手续。发展党员要坚持个别吸收的原则，一是因为只有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才能体现本人的自愿。党是根据自愿原则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加入党组织必须本人自愿，不能强迫。实行个别吸收，就能防止在所谓“集体入党”的过程中，把一些还没有入党要求的人硬拉进党内。二是只有坚持个别吸收，才能保证对申请人的充分审查，以尽可能地保证党员质量。关于个别吸收的原则和手续，集中体现在“七大”党章的有关规定中。

1. 新党员入党，须有本人的请求并在入党志愿书上签字，有介绍人的负责介绍书，经过支部大会的讨论与决定及上一级党委的批准。

2. 新党员入党须经过一定的候补期，方能转为正式党员。候补期的作用是进一步对新党员进行教育和考察。候补期的长短，依新党员的阶级成份而定。“七大”党章将新党员的候补期分为四类。第一类，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须经过六个月的候补期。第二类，中农、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入党，须经过一年的候补期。对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入党规定较长的候补期，是因为这个阶层出身的人的思想，常常是比较复杂的，对于我们党的纪律及参加严重革命斗争的顾虑也比较多，故须要用较长的时间对其进行教育和考察。第三类，除前两项所举各种成份之外的其他社会成份（主要指社会上中层和高层剥削阶级中出身的革命者）入党，须经过二年的候补期。这

些剥削阶级出身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更加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纲领和纪律更难接受，所以他们入党须有更长的候补期和更严格的批准手续。第四类，曾有过其他政治信仰，并加入过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人入党，也须有二年的候补期。这种区别是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必要的。它注意了成份，但不唯成份，而是重在政治表现。

3. 党委在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前，须指定党的工作人员与之进行详细的谈话，并须经过负责的审查。

4. 候补党员候补期满，转为正式党员时，须经过支部大会的决定，及原批准入党之上级党委或相当的上级党委批准。

（三）应注意的问题

抗战期间，我们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在正确的方针指导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抗战后共接收了100多万党员，建立了近千个县委，几万个支部。到“七大”时，已经有党员121万。但是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是有些党委对接收党员缺少负责的领导和具体的指导，把发展党员这样一件对党的建设起着基本作用的严肃工作，只委托给基层组织办理，或者只规定限期完成的发展人数，因而使发展工作形成没有领导的自流现象。甚至委托一些没有经过审查的、政治上不可靠的、在品德上不好的、对于党的建设毫无经验的人，去主持发展党员和建立下层党组织的工作，因而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和严肃性，不仅一些不可靠的和品德上很坏的人得以混入党内，甚至出现了一些成份不好的支部。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党员工作必须特别注意和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1. 要将党员发展工作与实际斗争和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紧密相联。当民族革命的新高潮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党及时提出扩大党

的组织 and 队伍的要求；而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统一战线内部投降、分裂、倒退的危险逼进时，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我们党又提出了巩固党的任务，要求慎重地作好党员发展工作，详细审查党员的成份，洗刷混入党内的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敌探奸细。在解放区，我们党始终把发展党员作为重要的组织任务之一，尽力在对敌斗争，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整风审干等运动中产生的积极分子中接收党员；而在敌占区以及一切党的活动需要极端秘密的地方，则要求吸收新党员的数量以不妨碍建立精干的极端秘密的党的组织为原则。

2. 党员发展工作要实行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与基层支部的积极工作相结合。具体办法是：首先上级党委对接收党员工作要高度重视，根据中央精神制定党员发展计划，建立必要的制度，定期进行讨论和指导。其次要健全党委的组织部门，培养和训练一些优秀的组织工作人员。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最重要的，是要将发展党员的工作，委托给一些完全可靠的、在党的建设上有经验的、思想作风都是纯正的工作人员去主持。刘少奇将这些人称为“党的组织员”。他要求每个区党委、地委、县委，以至区委，都应该有这样一批经过考验与训练的组织员，进行经常工作。再次，接收党员应成为党支部的经常任务之一，不可因为有了上述一批组织员，就不去动员一切支部去发展党员，发展党员必须由支部进行，但还必须要有上级党委的密切领导。这些办法保证了党员发展工作积极而有序地进行。

3. 正确把握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把质量放在首位。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对于党员队伍的需要量也在增加。没有一定数量的党员队伍，党在各方面的工作就难以开展。然而党员数量的增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的必然增强。历史经验表明，党是否坚强有力，

主要取决于党员的质量。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提高党员质量。陈云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明确提出了“党员的质量应重于数量”的重要原则，要求严格党员标准，洗刷落后分子，加强党内教育，造成成千成万政治上相当高明的党员干部。陈云特别强调：“这种质量上的提高，远胜于数量上的发展。”^①

4. 既反对关门主义，又防止突击发展。抗战初期，在党员发展工作上，主要问题是关门主义倾向。其主要表现是过分强调社会成份而忽视政治表现；惧怕某些投机分子侵入而不敢扩大党的组织，把党的注意力局限在恢复与审查旧关系和旧线索的狭窄圈子里；在统一战线中忽视党的发展，以为党的扩大无足轻重，甚至于取消党的发展。在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后，一些地方又出现了“突击发展”的偏向。主要表现是一些党组织为了追求新党员的数量，采取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详细审查的吸收办法，使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甚至一些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党内，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组织的巩固程度受到损害，使党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区别，在某些地方模糊起来，实践证明，关门主义和突击发展都违背了党员发展工作的客观规律，其结果或阻碍党员队伍的扩大，或是降低党员队伍的素质。我们党在贯彻“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的方针时，在指导思想，既反对关门主义，又反对突击发展，这一点始终是非常明确的。中央在《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一方面强调要“打破党内在发展党员中的关门主义倾向，”^② 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大量的发

① 《陈云文选》1926—1949 第 141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 第 478 页，第 479 页。

展党员，不是采用不经审查的拉伕式的办法，新党员的入党，必须经过支部一定党员的介绍与一定党部的审查。”^①“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也指出，由于各地运动发展的极不平衡，积极分子的产生与成长也极不一致，因此，发展党员的工作，也应该是个别地进行，不可在同一时期在一切地区普遍地号召发展党员，而必须具体考察和具体指导。

三、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

党的建设实践表明，好的党员队伍来自较高的党员素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提高党员素质，固然需要坚持党员标准，严格入党手续，加强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但是，更重要的，是靠每个党员本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地进行党性锻炼，提高自己的素质。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后，残酷的环境，艰巨的任务，对党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抗战以来入党的许多同志，虽有革命热情，但政治上思想上很不成熟，不知道怎样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怎样去进行修养和锻炼。不解决这些问题，党员的素质就会下降，党的领导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为此，党中央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向全党提出增强党性修养的要求。刘少奇依据中央精神，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员在组织和纪律上的修养》、《人的阶级性》、《论党内斗争》等著名演讲，还写了《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使党员思想入党的要求更加充实和具体化。

（一）从阶级性到党性：铁炼成钢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 第 478 页，第 479 页。

什么是党性，对于这个问题，往往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过去有的人讲，党性就是党的性质；也有人讲，党性就是组织纪律性，这些理解都是片面的。刘少奇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指出，党性是人们的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也就是说，党性首先是以阶级性为基础的，具有鲜明的阶级特性。比如，由于无产阶级是集中在大产业中生产，分工很细，一切动作都受机器的限制与彼此约制，他们一无所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因此，就养成他们伟大的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对于财产公有的要求，以及对于剥削者的反抗性、战斗性、坚韧性等等。这些就是无产阶级的特性。无产阶级的党性就来自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然而党性又不同于一般的阶级性，而是高度集中和升华了的阶级性在政治上的体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经受了各种考验和锻炼，把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和特性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等一系列党性原则，把工人阶级的阶级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工人阶级的阶级性上升到共产党人的党性，就好像生铁炼成了纯钢。因此，一个经过革命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员，比一个普通工人应该觉悟更高，理想更远大、胸怀更宽广、更富于牺牲精神，更能自觉地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正是在此意义上，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者阶级性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就是无产者本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和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来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用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经过长期的改造和锻炼，使自己具备无产阶

级的世界观和一切优良品质,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刘少奇认为,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要完成这一改造社会的事业,共产党员必须在斗争中“同时改造自己”。^①就是说,“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②可见,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锻炼,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

刘少奇还指出,共产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中国社会中产生并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他经常和这个社会中的不好的东西接触,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会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因此,“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③这就是说,进行修养和锻炼是提高党员素质保持共产党人纯洁性的需要。共产党员只有抓紧自己的修养,才能经得起失败和胜利的考验,才能百炼成钢。

(二) 做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 修养的标准和内容

刘少奇认为,党章规定的入党条件,是共产党员进行修养的基本标准,也是做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标准。因此,共产党员必须首先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进行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起码的够格的党员”。^④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够,还必须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切实“学习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和品质,做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94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97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99页。

④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第99页。

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①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一生的言行、事业和品质，作为我们锻炼和修养的榜样。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问题，这是共产党员修养的更高标准。

当时有人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伟大的天才革命家的思想和品质，是学不到的；要把自己的思想和品质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品质那样的高度，也是不可能的。刘少奇的回答是：我们今天普通的同志，诚然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高的天才和那样渊博的学识，但是经过努力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革命家，是完全可能的。这里关键要把握两条，一是要真正有决心，真正自觉地始终站在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岗位，真正具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始终不脱离当前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群众的伟大而深刻的革命运动，努力学习、锻炼和修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在工作和斗争中培养马克思和列宁那样的作风，不断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二是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即首先把自己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以这些创始人的伟大人格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质为榜样，在革命斗争中认真地进行自我修养，去检查自己处事、处人、处己是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在熟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的同时，着重调查和分析现实生活，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本国无产阶级所处的各方面情势的特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01 页。

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是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用这种态度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品质,我们就能够使自己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家。

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好学生,就需要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刘少奇在阐明修养标准的同时,还论述了修养的内容。首先,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延安时期,有的同志认为只要自己革命坚决,斗争勇敢,就完全行了,学习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进行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都没有什么关系。还有的同志甚至认为,只靠家庭出身好、本人成份好,用不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能够成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有的同志,虽然一般地承认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工作和斗争中,却从来不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针对这些错误想法,刘少奇详细论述了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如果我们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器,我们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在革命斗争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就有迷失方向、背离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甚至可能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各种机会主义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和应声虫。正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这样伟大的作用,因此,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行动。第二,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这项内容

紧密地结合了当时的斗争实际。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极其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不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不认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是无法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的。第三,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这是刘少奇着重论述的一个问题。所谓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按刘少奇的话讲,就是自觉地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克服和肃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针对当时一些党员中比较流行的是否具备无产阶级的立场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无关的错误想法,刘少奇深刻地阐明了思想意识修养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关系。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科学,是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科学,只有彻底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人,以无产阶级的理想为理想的人,才能彻底了解它和掌握它。他举例说,我们常看到某些由工人出身的最好的党员,虽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但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时,只要能用他听得懂的语言给他解释,他的兴趣,他所了解的程度,常比某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还要高得多。比如《资本论》中关于剩余价值一段,由于工人在生产中,在同资本家斗争中,深切了解资本家如何计算工资、工时,如何剥削工人取得利润,如何压迫工人等。因此,工人出身的党员常常比某些其他阶级出身的党员能够更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刘少奇在这里所说的工人出身的党员比较容易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说他们由于出身关系就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说,一切具有坚定而纯洁的无产阶级立场的同志,一切没有任何个人成见和其他不干净的东西的同志,只要虚心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切实掌握实事求是的方法,他们在观察和处理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就一定会比其他同志更敏捷而正确。同样,我们也常看到许多非无

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由于他们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立场不够坚定,思想意识也不很正确和纯洁,还有或多或少的、各种各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残余,加之自己又没有改造的决心,在他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时候,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去批判他思想意识中的旧东西,相反,他企图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作为达到他个人的目的的武器,甚至用他原来的成见去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他在处理革命斗争中各种实际问题的时候,往往抱有个人打算,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徬徨动摇,不能无阻碍地洞察事物,不能勇敢地拥护真理,不自觉地以至自觉地掩蔽和歪曲真理。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要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革命斗争的武器,是不可能的。”^① 第四,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刘少奇认为,我们的同志,不但应该有党外斗争的锻炼和修养,而且应该有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锻炼和修养。但是,在党内不少同志中,还缺乏党内斗争的锻炼和修养。这不但表现在党内有些同志常常进行许多无原则的斗争,而且还表现在党内有些同志,甚至斗争历史较长的某些同志,常常在党内经不起批评,受不得委屈、冤枉,甚至连一句不好听的话也受不起。或者是多心多疑,以为别人的某些话是有意隐射他的,为了这些话,他可以抱怨、伤心到极点。在这里,刘少奇告诫大家,对党内必要的斗争,应有思想准备,应该虚心接受一切正确的批评,同时也应该受得起误会、打击,以至委屈冤枉,尤其不要为别人的一些不负责

·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12 页。

任的、不正确的批评和流言所刺激而冲动起来。只要自己的思想正确,行为正大,对于别人不负责任的误会和批评,必要时可以申明和解释,如果解释不了,只好让别人去说。我们应该受得起误会,在任何时候都不牵入无原则的斗争,同时也应该经常警惕,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在党内斗争中应有的修养和胸怀。此外,对于当时存在着与发展着的不服从不尊重党与组织的倾向,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服从党尊重组织的绝对性上,表现在对于一切党员,一切党的组织,对于党的一切决议、命令、文件,对于党的一切东西的尊重、执行与爱护上。表现在对于党内一切缺点与错误的自我批评精神上。”^①“最好的党员,即在他最危险、最紧急的时候,他的行动,都是有组织的”。^②为此,共产党员还必须进行组织纪律方面的修养。第五,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艰难的事业,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曲折斗争,才能战胜最强大的敌人,战胜一切剥削阶级;在取得胜利后,还要长期地耐心地进行社会经济的改造和思想文化的改造。既然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在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克服各种困难,自觉地进行艰苦奋斗工作作风的修养,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很自然的责任。第六,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他对革命群众的无条件的帮助及亲密的联系上”。^③他认为,为了争取与组织千百万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入民族革命的战场,我们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 1 版第 305 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 1 版第 305 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 1 版第 306 页。

必须建立正确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是我们同国民党争夺领导权的重要工作之一。党是群众的领袖,群众的先锋队。但我们在群众中的党员是否成为群众的领袖,那完全不是由于法律的规定,不是由于党的任命,而是由于我们的党员能够了解群众,能够牺牲自己,最忠实地为群众的利益而斗争,能够说服群众,能够在长期的斗争中证明我们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那种以群众领袖自居,只要求群众服从他,而他可以不服从群众,不尊重群众,甚至强迫群众,命令群众,包办一切的做法,大大地妨碍了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只有我们的同志尊重群众,信任群众,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困难,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群众才会尊重我们,相信我们,亲近我们,而举我们的同志为领袖。^① 第七、要有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提出这方面的修养任务是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的:党已经是一个大党,而且在解放区已成为执政党。党除了领导革命战争的任务外,在解放区还有组织生产,政权建设等许多复杂而繁重的任务。而当时不少党员只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做好工作的良好愿望,却缺乏科学文化知识,难以胜任自己的工作。因此,刘少奇指出,只有革命热情,而无熟练的业务本领,那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的事业,就不能建设强盛的国家。刘少奇提出的这方面的修养任务,对党领导全国政权,建设新中国,具有深远意义。总之,刘少奇论述的共产党员修养的标准和内容,为广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自觉进行修养指明了方向。

(三) 学习和实践: 修养的途径和方法

刘少奇认为,我们所讲的党性修养和锻炼,实质就是党员的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第 32、33 页。

本质改造，而不是古人所说的唯心的、形式的、抽象的、脱离社会实践的闭门思过。这就决定了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途径一是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二是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他说：“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① 因为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是一种互相推动的辩证的矛盾运动。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促使主观世界得到改造，改造主观世界后，又可以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共产党员要学习革命理论，从而指导自己正确地进行革命实践和改造；同时，也只有投身革命实践，才能使自己不断得到锻炼和提高。

为了使我们的党员掌握正确的修养方法，刘少奇还指出了党性修养中要着重注意的几个问题：

1. 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能动地改造世界，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也是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巨大动力。而为了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就必须首先改造好主观世界。特别是以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就更应该具有自我改造精神。一个幼稚的革命者，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老练的革命家，必须经过长期的自我锻炼和改造，这—是因为他是从旧社会生长教养出来的，总带有旧社会中各种思想意识（包括成见、旧习惯、旧传统）的残余；二是因为没有经过长期的革命的实践；因此，他还不能真正深刻地认识敌人，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发展和革命斗争的规律性。只有加紧学习和改造，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培养了革命的品质，改善了革命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99页。

的方法，才能更好地完成革命任务。

2. 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和帮助。

刘少奇指出，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因此，党员党性修养得如何，思想改造得怎样，也是以是否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标准的。所以，共产党员在党性修养和锻炼中，一定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自己高度负责的精神，自觉地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为此，所有党员不论他资格多老，职务多高，都要经常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都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参加党的各项活动和党的组织生活，都要虚心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批评意见。只有这样，党员才能在党的怀抱里迅速成长。

3. 要有高度的自觉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为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锻炼提供了客观条件和用武之地，但它代替不了党员的自我学习和改造。刘少奇谈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环境和条件大体相同，出身和经历也大致一样的情况下，有的党员进步快些，有的进步慢些，有的甚至退却和逃跑了，究其原因，关键是个人主观努力的自觉程度不同。因此，共产党员在进行自我锻炼和修养的时候，一方面要亲自身体力行，不要坐而论道；另一方面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纵自己，都能经常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改造。也就是说共产党员不仅要在艰苦的、困难的环境和条件下，在事业遭到失败、挫折之时，在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受到委曲之后，不畏缩、不自暴自弃，不动摇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的自觉性；而且在优越的、顺利的环境和条件下，在事业成功之时，在自己受到领导和群众信任、受到组织上的重用

之后，不骄傲自满，不忘乎所以。这里刘少奇还特别强调共产党员要能够做到“慎独”，即在一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時候，他也能自觉地做好事而不做任何坏事。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只有达到这样高的精神境界，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的共产党员。

延安时期，尽管环境十分艰苦，斗争异常残酷，党的队伍情况复杂，但由于我们党在党员队伍建设上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极大地提高了党员队伍的素质。使我们这个党内产业工人数量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大多数的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党相比，至少是毫不逊色的。

第六章 造就治党治国的人才

培养和造就大批治党治国的的人才,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干部队伍的培养与建设,以建党初期和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开端,经过 10 余年的革命实践,到延安时期,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和大丰收的新阶段,出现了空前的大繁荣。这一时期,毛泽东等人有关干部队伍的培养与建设的理论也日趋成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它主要包括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性,干部的教育与培养,干部的选拔标准和爱护使用以及干部的团结合作等内容。在毛泽东这些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党通过多种形式,对干部进行政治、军事、文化和本职业业务等方面的教育和训练,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解放事业“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治国的有力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①这些干部是来自东南西北甚至海外,来自中国各民族的优秀分子。他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骨干和桥梁作用,成为革命胜利的基本因素。并且在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① ②《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8 页

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党的干部是党的骨干，在实现党的路线、方针和各项任务中起决定作用。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党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革命胜利。党的正确路线制定之后，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需要各级干部以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忠诚，通过艰苦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带领群众去实践。否则，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因此，干部队伍建设，历来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列宁在建党时曾对干部问题作过重要论述，他指出“没有职业革命家，事情总是寸步难行。”^① 斯大林发挥了列宁的这个思想，把解决干部问题作为党的头等重要任务来抓，他明确指出：“干部是世界上所有宝贵的资本中最宝贵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本。应该了解：在我们目前的条件下，‘干部决定一切。’如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运输业和军队中拥有大量的优秀干部，那么我们的国家将是不可战胜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干部，那我们就会寸步难移。”^② 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思想，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高度重视干部问题，把培养、训练和提高成千上万的适合革命斗争需要的干部，当作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作党的全部工作中一项经常的战略任务。刘少奇在《论党》中也指出：“我们党的干部问题，实是中国人民事业中决定一切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稍为严重的错误，都足以损害中国人民的事业。”^③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125页。

②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73页。

③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471页。

延安时期党强调干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又是与党当时所处的环境、任务和党的自身状况密切相关的。第一，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需要大批干部。1935年华北事变，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在全国迅速掀起新的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了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在《决议》中专门写了“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一节，提出了“为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指出：“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周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党要团结全党领导最广大的群众走上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与很好的干部作枢纽，是不能成功的。”因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只有通过千千万万的干部去发动、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才能够迸发出来。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也说：“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①

第二，当时党的干部十分缺乏。我们党在过去长期的英勇斗争中，已经锻炼和培养出大批的领导骨干，他们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勇于自我牺牲，富有创造性和坚定性，表现了中国人民最高贵的革命品质，毛泽东称他们是民族的珍宝，全党的荣誉。但是，一方面他们中的许多优秀分子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牺牲，许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多保存下来的干部也需要提高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另一方面，随着抗日战争的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无论是党的、政权的、军队的、民运的以及文化教育各条战线上，都感到干部严重不足。朱德曾经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次，邓小平同志带了两个马列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前方去，走到半途，便被别人从后面把那两个同志留下了，于是打官司，打了整整半年，结果还是从总司令部抽了两个能教书的同志去替他们“顶赎”回来。由此可见当时干部缺乏的情况。朱德说，“前方太缺乏教师了，有马列主义修养的同志到前方去的越多越好，我们都欢迎。”^① 因此，干部的缺乏，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17年来，我们党已经培养了不少的领导人才，军事、政治、文化、党务、民运各方面都有了我们的骨干，这是党的光荣。但是，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还须努力培养人才。为了使全党适应从内战到抗日，从革命低潮走向新高涨的战略转变，重新训练干部已成为实行这种转变的重要一环。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新干部，成为当时党所面临的战斗任务。

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党克服一切困难，在延安及各个革命根据地开展各种学校，大批培训干部，把干部教育工作，放在一切教育工作的优先地位。1936年6月1日，在毛泽东的关怀指导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成立（简称抗大）。毛泽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并明确规定抗大的教育方针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还亲

^① 《朱德同志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第110期（1940年7月1日出版）。

自兼任抗大哲学课的讲授任务，从1937年5月一直讲到7月，历时三个多月，讲授110多个小时。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与重视下，抗大成为一所名扬中外的军事学府。它从陕北到华北，再从华北回陕北，坚持办学9年，并且在西北、华北、华中办起了12所分校和6所陆军中学，总共培养和提高了近20万抗日军政干部。一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经过抗大的教育和提高，成为人民军队的柱石和国家的栋梁；一些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抗日根据地以及白区地下党的干部，他们经过抗大培训，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坚强骨干；还有一些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知识青年，他们经过抗大的教育，政治觉悟、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抗大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继抗大之后，在毛泽东亲自领导和热情关怀下，陕北根据地陆续开办了10多所培养各种干部的学校，如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文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研究院、民族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等。这些学校以崭新的教育制度、教育方针、教学内容和独特的校风，独立自主地培养、训练和提高了大批革命干部，解决了当时各地对干部的迫切需要，成为我党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

二、德才兼备与任人唯贤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高度重视培养干部，而且总结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关于“德”的方面，要求干部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素养，以

及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锻炼，具有好的品格和作风等等。毛泽东说：“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①1937年10月，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和开学纪念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襟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②这个题词，为我党干部培养指出了目标和方向。

在“才”的方面，要求干部精通业务，努力学习文化知识。1940年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提出：“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是一个好的革命者。”^③1942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规定：“对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业务教育，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动员》第10期（1937年10月23日出版）。

③ 《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要求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与精通自己的业务。”“务使所属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职业之目的”。

毛泽东十分强调培养德才兼备的干部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1937年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说：“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① 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②

为了使干部提高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达到德才兼备的标准，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理论与实践活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放到重要地位。他说：“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③ 因为，如果干部不学习革命理论，就不可能树立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个革命干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可能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可能树立终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远大理想。为此，毛泽东经常不断地号召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亲自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他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军事斗争，写了许多军事著作，不但吸取了我国古代军事学说中有价值的东西，特别总结了10年苏维埃运动和军事斗争的经验。干部学了毛泽东的著作以后，能很好地和自己的经验结合起来，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为什么会是错误的等等。经过学习，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都有了很大提高，增强了他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识别正确与错误的方针政策的能力，巩固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为以后的整风学习打下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重视干部的理论学习和思想素质提高的同时，十分强调干部的业务学习。1940年毛泽东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194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延安自然科学学院”。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理工科大学。该院的任务是：培育既通晓革命理论、又掌握科技工业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使学员成长为具有基本科学知识、创造精神和独立工作能力的革命通才、业务专家。对自然科学学院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始终十分重视和关怀，他曾亲笔为学院题写院名，并经常出席一些专业会议，充分肯定各项业务工作对于革命事业的重要意义，教育有关人员努力学习，精通业务，提高业务水平。

毛泽东积极倡导广大干部提高文化水平，注重学习历史知识。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工农干部要学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

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必须强调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对于他们，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徐特立等同志专门为工农干部编写了《文化课本》，毛泽东亲自为该课本写序，阐明革命干部学习文化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为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毛泽东谆谆告诫大家应该注意学习中国历史和各种社会常识。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②

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克服各种困难，边打仗，边学习；边生产，边学习，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列主义和所需业务知识的热潮，迅速提高了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确立了正确的干部标准之后，按照正确的干部路线把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到适合的工作岗位，就成为干部工作的关键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并在这条政治路线指导下第一次制定和形成了正确的干部路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明确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

① 转引自靳宏斌：《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第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①毛泽东提出的“贤”，即是德和才的辩证统一。我党在毛泽东这条正确的干部路线的指引下，把许多优秀干部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不仅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而且对于反对干部工作中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促进党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和统一，起了重大作用。从而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

三、干部的考察识别与爱护使用

为了总结抗战经验，确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纠正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全面的战略规划，并对党的建设作全面部署，党中央于1938年9月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毛泽东结合我党的历史经验，及当时党的干部状况，对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作了全面的系统的详尽的论述，为我党确立了一整套完整正确的干部政策。它主要包括在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指引下正确地、有效地考察识别干部与爱护使用干部。

考察识别干部是巩固党的干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干部的考察、识别是为使用和选拔干部提供客观依据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毛泽东历来重视考察干部，提出了一系列考察干部的原则和方法。其基本方法是：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了解结合起来，既要听取干部的上级和同级的意见，又要听取下级和广大群众的意见，也要听取干部本人的意见；还要通过考核、选举等多种形式和渠道了解干部的表现。在深入了解干部、充分占有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对干部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将被考察者的基本情况、过去和现实表现、政治立场、工作态度、思想作风、理论水平、领导管理能力、群众威信、专业特长以及主要缺点和不足等情况综合整理成干部考察材料；在考察过程中要坚持原则、公道正派、实事求是，真实地、全面地、本质地反映被考察者的情况；干部的考察要经常化、制度化、民主化、公开化、科学化，破除神秘观念。1940年，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指出：“在今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对于干部的审查、考察与教育，更成为巩固党的一个重要工作。在这方面的疏忽，是可以造成极端严重的恶果的。”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延安地区和其它根据地全面开展了对干部的审查活动。在审查过程中主要是注意研究每个干部的家庭背景，社会关系，以及过去是否参加过反对革命（入党前）和反党派别（入党后）活动，是否脱离过党的关系，脱离原因及其如何恢复和重新入党，如曾被捕或被俘过的干部，则须仔细的审查被捕或被俘过程中的政治上的表现，对单独行动的党、政、军干部，则注意其单独行动时是否有贪污腐化、违背党的政策行为。经过对每个干部的细心审查之后，一方面加深了对干部的了解，并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和表现给予安排适合的工作；另一方面对暴露出来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给予洗刷。从而保障了党本身的纯洁，使一切干部都能发挥其聪明才智。

识别干部是为了使用干部。是否能正确地判别干部的是非、功

过、优劣、好坏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①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识别干部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具体运用，是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干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它要求客观地、全面地、发展地看待干部。要从干部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从领导干部和组织部门的主观印象或先入之见出发，干部的德、才表现于他的实践即工作之中，而工作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时一事的表现要看，因为它的全部实际是由一时一事积累而来的，并且个别中存在着一一般，但一时一事毕竟只是全部实际的一部分，个别不等于一般，而且人是变化的。只有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才是干部的全部实际情况，表现着干部德才的全貌和整个发展过程。以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为根本依据，并将其同一时一事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识别干部。识别干部应注意防止主观片面性，同时应注意避免表面性。不能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更不能被某些假象所迷惑，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识别干部的客观性，使组织上对干部的判断和评价符合客观实际。

考察识别干部使得对干部的了解更加全面和进一步加深。这就为正确使用干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前提。毛泽东认为干部使用的恰当与否，对于保障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具有决定意义。他把领导者的责任归结为“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页。

使用干部的基本原则是“任人唯贤”。陈云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作了更加详尽的阐述，他提出使用干部应坚持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用其长，不用其短的原则。

在使用干部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爱护干部，因为爱护干部是党的组织团结巩固和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证。他说：“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爱护的办法是：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①

爱护干部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干部，发挥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只使用，只布置任务，不指导、不检查、不教育提高、不关心帮助，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是不正确的。对犯错误的同志，毛泽东提出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他们的错误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对这些同志应该热诚相待，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7—528页。

团结共事。只要他们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们，团结他们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们去了解和改正错误。

正确的东西总是与错误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1943年7月，康生在中直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在很短时间内把一大批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打成国民党特务，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很多同志政治上、人格上受到侮辱，心灵上有了创伤。毛泽东很快发现了“抢救运动”中的错误，及时采取了纠正的方法，并于1945年初在中央党校和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主动对错误承担了责任，向被错戴了帽子的同志赔礼道歉。得到大家谅解。随后不久，这些同志就愉快地接受党的派遣，轻装奔赴前线，投身到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去。

在延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干部队伍也不断扩大。毛泽东同志适时地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干部政策，使得干部在数量大增的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质量，为我党建设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为革命胜利的干部准备

从抗战胜利后到全国解放前夕，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急需大批政治上坚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和基本科学知识的干部来充实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新华社1948年10月16日社论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任务，就会妨碍战争的胜利和国家的建设。

对此，毛泽东强调要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为革命胜利做好充分准备。

早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反攻的需要，于1942年12月1日发出指示，提出：“各地干部凡可能来延安的，由中央局、分局筹划派送大批来延安保留学习，保留干部仍是目前要注意的任务。”次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决定》指出：估计到敌后形势与将来反攻，我们必须有最大决心抽调一大批干部来延安保留与学习。保留培养干部的目的不仅为了适应目前敌后的环境，同时也为将来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和毛泽东这一英明决定，各抗日根据地认真执行，从而在延安保留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干部。日本投降后，保留在延安的干部，迅速被分批派回各解放区。从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底，由中央直接调动的干部共有万余名。这部分干部多数来自中央党校、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甘宁边区政府各机关和中央各机关。他们都是参加了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受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高昂的革命斗志，并有丰富的实际斗争和工作经验，是我们党的精华。有的老同志深情地回忆，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几乎每天清晨都有人从延安出发，他们肩负着党的希望，告别了滋养他们的革命圣地和培育了他们的党中央，迎着朝霞，向着浊浪排空的黄河渡口奔去，形成了壮观的人流。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革命力量猛烈发展，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夺取全国胜利的条件已经成熟。随着战争的顺利发展，新解放区的迅速扩大，干部数量显得严重不足，特别是城市管理和工业部门干部

的缺乏，更为突出。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能够有秩序地管理新开辟的解放区，要有计划地大量地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特别是大量提拔与培养新干部，才是解决干部缺乏的主要方法。

这一时期，全党积极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开始大规模地、广泛地培养训练与提拔新干部。其主要途径是：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从产业工人中培养选拔干部；从军队中培养干部。

对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早就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①全面抗战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做了相当大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与民众运动，培养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但是知识分子干部仍然十分缺乏。1948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指出：“争取和改造知识分子是我党重大的任务，为此应办抗大式训练班，逐批地对已有的知识青年施以短期的政治教育。要大规模地办，目的是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受一次这样的训练。训练后因才施用，派往各种工作岗位，再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同时还要求创办和办好中等学校，培养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才；开办正规大学，培养较高级人才；创办各种专门学校，培养各种专门人才。

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解放区的各级学校迅速发展壮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8页。

大起来。在华北解放区、晋察冀边区有华北联合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铁路学院、建国学院、行政干部学校、工业专科学校、农业专科学校、商业专科学校及中学师范等 60 余所，学生有 12,000 人以上。晋冀鲁豫边区于 1945 年 11 月创办了北方大学，另外还有其他干部学校数十所，在 1946 年—1948 年间，就为部队和解放区建设、文教机关输送了万余名干部。在陕甘宁边区的干部学校有延安大学、西北军政大学及工业、财经、艺术、行政等专科学校，学生约 3,000 人，各专区设有干部学校数十处，中学、师范学校 27 所，学生共约 11,000 人。苏皖边区于 1948 年相继成立华中大学和建设大学，招收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到解放区来的大中学生，引导他们参加革命工作。这些学校都为解放战争和解放区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

东北解放区的干部学校有东北军政大学、东北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高等学校，各地区各部门还开办了各种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如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辽宁省民主学院、辽宁公学、郑家屯青年训练班、东北军需学校、东北卫生行政干部学校等。除这些学校外，还开办和接管了一所大学和许多专业学校，如哈尔滨大学、农科专校、商科专校、助产专校、铁路学校、邮电学校、师范学校等。

这些学校除了教授有关专业知识外，主要任务是给入学的知识青年讲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知识，初步奠定革命的人生观，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及政策。学生经过三至六个月的短期训练，即分配工作，参加解放区各项建设活动。

全国解放前夕，根据中央的决定还在各大行政区设立人民革命大学，招收知识分子，并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在华北解放区设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校采取“大量招收与严肃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第一期就招收学员 12,000 人。其它各个地区也都成立

了类似的学校。如东北有政治学院，山西成立了山西公学。各种抗大式的学校遍及各地，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这批新干部大多年纪轻、文化高、思想敏锐、革命积极性高，他们不但在建设新解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从他们中培养锻炼出了大批治党治国人才，成为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

关于在城市里培养提拔产业工人干部问题，中共中央与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党必须立即训练和准备接管全国各大城市及大工商业的干部，否则，决不能应付迅速发展的客观形势。”^①因此，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大批地培养、训练和提拔产业工人和职员干部，已成为全党性的迫切的中心任务之一。为此，中共中央要求各城市党委及工会党组，从产业工人和职员中挑选大批思想进步、工作积极、忠实可靠、懂得技术并有组织才能和办事才能的优秀分子，开办职工学校或速成训练班，给他们以短期的政治训练及组织纪律训练和城市政策教育，然后征调他们到新解放区去工作。

根据中央指示，各个新解放区的城市，都组织了对优秀产业工人的培训，并提拔了大批工人干部。据东北统计，在沈阳市解放后，全东北共有11万工人受到了脱产训练，从工人和职员中提拔干部3万余人。其中工人干部2万多人。这些工人干部文化政治水平相对较高，团结性纪律性强，从他们当中培养出了一大批管理企业和管理国家的优秀干部。

在为革命胜利所做的干部准备工作中，干部培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军队培养选拔干部。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指出：“中国地方甚大，人口甚多，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4），第466页（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革命战争发展甚快，而我们的干部供应甚感不足。”^① 怎么办？毛泽东根据这种情况，提出了“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方针。他明确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懂得在城市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总之，过去军队干部和战士们所不熟悉的一切城市问题，今后均应全部负担在自己身上。”“军队就是一个学校，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等于几千个大学和中学，一切工作干部，主要地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把军队办成培养干部的大学校，培养了新解放区各项工作急需的大批干部。对当时接管城市、巩固政权和整个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革命胜利的干部准备工作，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它使我党不失时机地从知识分子、工人和军队中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干部，满足了战争迅速发展和新解放区各项工作开展的需要，锻炼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治党治国人才。

总之，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人有关干部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不仅为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学说，对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干部队伍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06页。

第七章 开创党风建设的新阶段

党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党风”这个概念。经过延安整风，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党的作风做了高度的理论概括，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①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最终形成和发扬光大的时期，是党风建设史上的新阶段。

一、以三大作风为中心内容的 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

党风是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应有的优良作风的总称。它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党风属于实践的范畴，是思想见之于行动的东西，它具体体现着党的精神风貌，体现着党的性质、特点和宗旨，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上的表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3—1094页。

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是按照一定的世界观指导行动，形成自己的作风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与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党，它除了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般风格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种传统和作风是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建党初期，这种优良作风主要体现在我们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活动上。如，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彭湃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北伐战争时期，这种优良作风主要是通过从事工农群众运动的共产党员及北伐军中的共产党员表现出来。他们联系群众，不怕牺牲，英勇善战，以他们模范行动，使党的威信大为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大革命失败后，在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过程中，这种优良作风主要由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表现出来，如官兵平等的新型关系，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的良好纪律等等。这些都构成了我们党早期优良作风的实质内容。到了延安时期，党风不仅是作为党员的个人风格，而且是作为全党自觉接受的统一的优良作风而发扬光大，并且有了理论上的科学概括。

这一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党的领导人认真总结了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艰苦的理论创造工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等等，全面阐述了党的作风建设，使之成为科学的理论。

（一）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作风。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事共产主义事业的，如何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基本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是要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具体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找出其特殊的规律，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导。就是说，要有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体现，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是在曲折复杂的革命斗争中逐步认识和明确的。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自觉地提出这个思想路线问题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中央到延安后，1937年7月—8月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光辉著作，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高度阐述了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辩证关系，为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奠定了理论基础。继“两论”之后，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理论创造，又写了一系列科学著作，进一步阐明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深刻批判了主观主义及其表现形式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1942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要我们去研究。这个解释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高度上赋予“实事求是”这一概念以崭新的内容。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毛泽东倡导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在全党扎了根，成为全党自觉的行动。

（二）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这是党的唯物史观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指出，人民群众是

历史的创造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力，组织和领导人民群众去争取革命事业胜利。中国共产党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对这一原理作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中国革命一个重要特点，是敌人异常强大和残暴，而革命力量比较弱小。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先锋队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更需要扎根于群众之中，紧紧地依靠群众，把群众最充分地发动起来，才能使自己的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正是在长期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以极大努力教育、动员和组织群众为革命事业而斗争的过程中，党的群众路线逐步成熟和丰富起来。1929年9月，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并就筹款工作，指出“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而要“经过群众路线”，^①这是第一次赋予群众路线这一概念以比较明确的含义。作为群众路线具备成熟的理论形态的标志，是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为党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在这个决定中，他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结合起来，并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而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样一种正确的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概括地说，就是要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正确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67页。

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往复，一次比一次更正确、生动、丰富。1945年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明确载入了党章。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指出：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因此，“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路线”。他还详细阐述了群众观点所包含的四项内容，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又指出，只有具备这样的群众观点，才能在工作中执行正确的群众路线。经过延安整风，特别是党的“七大”以后群众路线更加为全党所熟悉，在各项革命工作中得到了更加普遍和更加自觉的运用。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特有的风格，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是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坚强党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强调党要进行自我批评的思想是一贯的，毫不含糊。在博大精深的马克思主义建党著作中，有许多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深刻的、耐人寻味的精采论述。同时，他们还以模范的行动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19世纪90年代为了批判德国党内日益泛滥的错误思潮，恩格斯决定在党的机关报上公开发表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给威·白拉克的信。当时党的一些领导人担心公布马克思对德国党的批评意见，会给敌人提供武器，恩格斯回答是：“担心这封信给敌人提供武器，证明是没有根据的。恶意的诽谤当然是借任

何理由都可以散布的。但总的说来，这种无情的自我批评引起了敌人极大的惊愕，并使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一个能给自己奉送这种东西的党该具有多么大的内在力量啊！”“哪里还有另外一个政党敢于这样做呢？”^①果然，《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引起了极大震动：敌人为之惊愕，真正共产党人感到鼓舞，增强了对错误思潮的识别能力和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党内错误的勇气。

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接受和坚持的。但是，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成份很多，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比较突出，加上党创立时理论水平较低，民主生活不充分，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十分不易。从全党来说，自觉地正确地把这一原则贯彻到党内生活中去，形成一整套科学的方法，是在延安时期逐步解决的。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就认为，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意义。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②并指出开展党内批评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然而，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并没有这样做。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和推行者，不是压制党内广大群众对他们的批评，就是歪曲批评和自我批评，把它变为打击坚持正确原则的同志、推行其错误路线的工具。1935年遵义会议是党从危机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也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分歧的成功范例。以后，鉴于王明错误路线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严重教训，毛泽东提出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并提出了“团结——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0页。

评——团结”这一解决党内矛盾的科学公式。党成功地开展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延安整风运动，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七大”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写进了党章。党章总纲提出，“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反对那种自高自大、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害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绪。”由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又积累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武器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促进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不断胜利发展的独创性经验，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七大”上被概括为中国共产党三大作风之一，成为区别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四）艰苦奋斗的作风

艰苦奋斗的作风，是指共产党人为了党的事业而甘于吃苦，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和作风。它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上，有旺盛的斗志，为实现伟大理想而战斗不息；在工作上，不避艰苦，不怕困难，勇挑重担；在对待国家和集体的财物上，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不浪费；在个人生活上，艰苦朴素，克勤克俭，不铺张，不奢侈。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倡导和培养的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是在强大敌人的包围下，在祖国沦亡的危难中诞生的。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确定了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坚强信念。延安时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仅在实践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而且在理论上得到了高度的升华。延安的岁月，是艰苦的岁月。人们不会忘记，自1938年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主要兵力压向

解放区战场，连续向我抗日根据地发起大规模的扫荡，实行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根据地军民生存的条件；国民党反动派也调集大批军队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另外，华北地区连年发生水灾，抗日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到1941年和1942年，“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被盖”的境地。共产党人受到了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毛泽东尖锐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在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下，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男女老幼共同投入了生产自救运动即著名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创造了奇迹，它粉碎了日伪顽的经济封锁，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生动体现了我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共产党人不可战胜的光辉形象，坚定了人民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精神成为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优良作风。

延安时期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确立，使党赢得了人民的敬仰和拥护，极大感召与鼓舞着延安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外广大仁人志士和热血青年，他们从共产党人的奋斗中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和美好希望，从而奋不顾身地奔向延安等根据地，亲身投入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中。

二、率先垂范 开一代新风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倡导者，在延安他们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使优良作风在全党推广开来，蔚然成风。

（一）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中，一贯注重调查研究。他曾写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的材料。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了许多著作，使调查研究的理论和经验更加系统、完备。1941年3月、4月间，写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向全党提出了调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和革命实际，正确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任务。在毛泽东的倡导下，1941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根据《决定》的要求，党中央设置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下设情报科、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在党务研究室之下又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三个研究室，同时健全了情报机构。各地党的领导机关中也相继建立了调查研究工作机构。这样就从组织上保证了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开创了党内调查研究的新风。

在中央决定的推动下，在延安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纷纷派出考察团、调查团下去作调查研究。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于1942年1月率领调查团，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在调查中，张闻天深入各阶层、农户、基层干部，以及地主、商人的家庭，查阅和核算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帐簿，听取各调查小组的汇报，审阅和修改了几十份调查报告。1943年3月结束这次调查写给中央的报告《出发归来记》中，生动描绘了他这次调查的心情：“冲破了教条主义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光和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的愉快心情。”林伯渠率陕甘宁边区政府考察团到郿县、甘泉调查区乡基层

情况。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对转变党的作风，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关心群众利益，和群众同甘共苦

延安时期，为人民服务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个纲领，它更主要体现在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大量的实践活动中。这就是一切以人民利益为转移，“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人，不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而且首先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毛泽东在处理党政军民大计的繁忙工作中，总是挤出时间接触群众，在田畔、街头，在杨家岭故居，他经常与群众交谈，询问人民的衣食住行问题；在生产季节，他多次指示中央机关的同志帮助附近农民收割、耕种。即使在转战陕北、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中，也处处关心群众利益，指示身边的同志帮助群众生产、组织群众安全撤退与转移。为减轻转战行军的疲劳，身边的同志提议做个担架，让他坐在担架上。毛泽东说：“那有抬人的！这不和旧社会的官老爷一样吗？不行，我们是共产党，不是旧官僚。”^① 坚持和大家一起徒步行军。

朱德时刻不忘帮助群众。一次，他骑马从外地回延安，看到一位老大爷，背着一口袋粮食艰难地走着，就赶忙下马，走到老大爷身边说：“老乡，你那么大年纪，背上东西走路太吃力了。来，放在马上给你捎走。”说着，他和警卫员把粮食抬到马鞍上，和老乡一起步行。

党的领袖们还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1942年8月的一天，暴雨倾盆，雷声隆隆，正在边区小礼堂开会的延川县县长被雷击身亡。当时有的群众对一些地方征粮过多不满，便借题发

^① 转摘自《延安精神报》1986年12月。

牢骚：“老天爷没长眼，为什么不劈死毛泽东？”有的同志听到这话后，主张严厉查处。此事传到毛泽东那里，他制止了追查的做法，心平气和地说：我们要好好想想做错了什么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经过调查，发现个别地方征粮确实过多，加重了人民重担。毛泽东听了汇报后说：“群众意见正反映了我们工作有毛病，人家说救国公粮太多，这是实际情况。”之后，中央很快做出决定，切实减少了救国公粮的征收数量。这件事表现了毛泽东革命家的胸怀和气度，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人维护人民利益的精神。

边区主席林伯渠常常微服出访，体察民情。一次到富县，林伯渠着装朴素，态度和蔼，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也没有地方干部的欢迎，和普通老百姓完全一样，人民群众感到亲切，仅仅十几天就接待民间告状案40多起。林伯渠深入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动人事迹在边区传为佳话，续范亭写诗赞道：“年来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不学导引不避世，童颜鹤发自风流。”

（三）正视缺点错误，勇于自我批评

许多在延安工作过的老同志都记得这样一件事，延安整风运动中一度出现偏差，发生了“抢救运动”，很多知识分子被怀疑，有的被错打成了“特务”。后来毛主席发现了这个问题，先是发出了审干九条方针，提出了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接着又进行了甄别平反，对被错划了的同志平了反，分配了工作。最使人感动的是1944年春天，毛主席在延安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讲话时，检讨“抢救运动”搞错了，整错了我们好多同志。当时毛主席把戴着的帽子摘下来，说：“我给大家摘帽子”，并给大家行了两个鞠躬礼，表示道歉。这一来可不得了了，当时好多人感动得泣不成声，心灵上的创伤好似立刻平复了。这件事更使人感到毛主席和共产党的伟大。

又如，李立三同志，他是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我党早期重要活动家，后来在中央犯了“左”倾错误，他认真检查了错误，在“七大”又被选为中央委员。1945年冬，辽宁部队请一位叫李隆郅的人作党史报告，他讲了李立三等人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之后，大声问台下听众：“你们认识李立三吗？”众答“不认识”，报告人指着自已说，“我就是李立三！”顿时全场震动。李立三这种勇于解剖自己，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的精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艰苦奋斗，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

延安时期，毛泽东和党的领袖们艰苦朴素，亲自参加生产劳动的作风，不仅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精神风貌，也对整个解放区艰苦奋斗精神的发扬光大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1940年冬，部队同志都穿上了新棉衣，毛泽东仍坚持穿着那件穿了四年、补了许多次的旧棉衣外出开会做报告。警卫员趁主席睡觉给他换了件蓝布棉衣，主席发现后说：“这样吧，你们一定让我穿新的，那就把这件蓝布棉衣送回去，给我领件灰粗布的，和你们穿得一样。”党的领袖们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决不搞任何特殊，这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

在解放区大生产运动中，运筹帷幄、日理万机的领袖们，也没有置身事外。当时周恩来经常往返于延安、重庆、南京之间，政事繁忙，手臂还受过伤，但他仍抽时间参加生产劳动。1943年，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任弼时提出要一个纺车，王震知道后派人从南泥湾送来纺车。周恩来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纺出来的线又快又多，又细又匀，大家称赞说可以评头等，他却谦逊地说只够二等的标准。一个美国记者不相信边区政府主席能象老百姓一样从事生产劳动，他悄悄抄下了林伯渠在政府门前贴出的《我的生产计划》，并找机会拜访了林伯渠。当他看

到菜园里甜菜和胖墩墩糖萝卜时，他打消了疑虑，情不自禁对林伯渠说：“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会影响全民族。”^① 在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倡导、带动下，党的优良作风深入人心，不仅对根据地军民，也对全国发生巨大影响，一时延安成为人心所归，万众向往的地方。一些持公正、客观态度的外国人士也对此赞叹不已。1938年10月前后，以柯尔满为首的世界学联代表团访问延安，他们在延安逗留的时间并不长，却为延安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所倾倒，在其主动请求下，成为抗大名誉学员，每人领到一套粗布军装及抗大领章和校徽。他们欣喜若狂，极其珍爱这些物品。后来他们各制一玻璃盒专装这套军装，留作永久纪念。纽约《先锋论坛》记者斯蒂尔，曾在延安访问10天，后来他说，“真的，我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这证明优良作风具有多么巨大的凝聚力、感染力。

三、延安整风运动与党风建设

延安整风运动，是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第一次整风运动。由于这次整风运动是从当时革命指导中心和总后方——延安开始的，而且当时延安整风最为典型，因此，人们通常称这次整风运动为延安整风。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延安整风是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内容的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思想革命和思想解放运动。经过整风运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被科学地概括为“三大作风”，使之成为党的优良作风的主要内容。可以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就没有党的三大作风的形成。

延安整风发生在40年代初，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我们党从成立到40年代初已有20年的历史了。20多年来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其中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损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从遵义会议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且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和世界观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会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所以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基于这种需要，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此外，随着抗日民族运动的高涨，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到1942年党员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80多万人，增加了20倍。大批新党员的加入给党增添了新鲜血液，但也给党的建设带来了许多问题。党内还存在着大量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及时抓住抗战相持阶段局势变化较少的极好时机在全党开

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同心同德战胜困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一）批判主观主义，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学风

延安整风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

当时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也脱离实践，把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王明教条主义主要是假借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崇高威信，把他们的言论变成教条，到处乱套，谁不执行他们的“教条”，就严加惩办，乱打乱斗。经验主义者轻视理论，也不愿刻苦地学习理论，只满足于狭隘的、局部的、个人的经验。虽然这两种主观主义表现形式不同，但在思想方法上都有共同的特征，都违背了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是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基础。所以，主观主义“是共产党的最大敌人，是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是人民的最大敌人，是民族的最大敌人，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①

毛泽东批判主观主义的时候，着重批判了对党内危害最大的教条主义，指出教条主义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王明教条主义者，他们自诩为“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此吓唬工农干部，把他们俘虏过来，充当自己的佣人，工农干部不易识破他们；也可以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把他们充当俘虏，因为他们缺乏实际斗争经验，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识别能力不强，往往容易上当受骗。因此，在整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0页。

风运动中，党和毛泽东从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把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作为整风的中心内容。

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广大党员、干部认真阅读中央规定的 22 个整风文件，从理论上武装头脑，同时，广泛联系本部门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对自己思想上、工作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种种表现，进行认真的检查，自我批评和反省。在整风学习中完成了世界观方法论的根本改造，大大提高了全党自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过去许多年以后，那些曾在延安生活过的老同志回顾延安整风这段经历，都把它视为自己人生旅途中一次真正的革命洗礼。李维汉说，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延安整风教育了两代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这是非常深刻而全面的历史概括。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的马克思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正如毛泽东 1953 年同薄一波谈话时所说的，“1942 年全党整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①此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被全党所接受，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全党深深扎下了根。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贯穿于整风运动始终

延安整风运动中，从始至终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

^① 转引自 1981 年 7 月 3 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薄一波的文章。

需要。”^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 1942 年“四三”指示（4 月 3 日发布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再一次强调了，在整风学习讨论中“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② 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整风中必须注意的宗旨。它包括两方面的意思。其一，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以便使后来的工作做得好些。其二，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全党从上到下，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都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并开创了建党以来开展积极党内思想斗争的新局面。结果，既清算了存在于党内的不正之风，又推广了民主作风；既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既密切了干群关系，又密切了党群关系，全党达到了思想上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从此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党的优良作风之一，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加强自身建设的强大武器。

（三）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延安整风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自我教育运动。在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广泛的群众性思想革命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部队、学校，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革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1 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年版，第 70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2 册，第 54—55 页。

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员，无一例外地都投入了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之中。例如，1942年4月29日延安《解放日报》报导：解放日报报馆的工作人员，对整风文件的学习，已形成热潮，指导阅读的文件已成为终日手不释卷的读物。报务员、译电员、编辑在完成每天的工作后便学习文件。外勤记者由于终日在外奔忙，便把文件带在身上，在来往途中或访问之暇，抽时间阅读。中央直属机关的学习又怎样呢？那时高级干部既忙于自己的学习，又要领导学习；中级干部在散步时，闲谈时，吃饭时都在谈论学习问题；初级干部也不甘落后，积极性很高。党外同志也自动积极参加。有位党外同志在自己笔记上写道：整风不仅是共产党的事情，无论什么人都应该整风，把风整好了，对办事、处事都有好处。可见参加整风运动的人数之多，群众发动之彻底，参加者态度之积极都是空前的。

我们党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充分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从各级领导班子的建立到整风计划的制定，直到每一个阶段运动的具体部署，都贯彻了群众路线。上下结合，领导蹲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等一整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整风运动中得到了全面的实践和运用。

通过整风运动，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得到了全面弘扬，党内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干部。1943年2月3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在工作中成绩显著，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中选拔出王震等22名给予隆重奖励。毛泽东亲手为获奖同志题词，有“善于领导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为群众谋福利”等等光荣称号。

四、具有中国特色的党风理论

正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系统的、有中国特色的党风理论。它的主要内容有：

（一）明确提出了党风的科学概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始人，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党风的倡导者、实践者。对党风这一概念，虽然他们没有明确表述，但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有优良品德和作风这一思想，在他们最早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和制定的党纲和党章中就有体现。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问题上使用作风一词，最早是1879年恩格斯在致德国工人运动领袖约翰·菲力蒲·贝克尔的信中提出的。信中谈到他和马克思极端蔑视企图把“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社会改良主义者赫希伯格一伙，并与之断绝了任何往来。1895年在另一封致意大利工人运动的著名政治家菲力蒲·屠拉梯的信中，恩格斯严厉地批评巴枯宁派一味追求“华而不实的作风”给社会主义政党带来的危害。恩格斯在此表达了两个思想：一是在党内生活中，不允许有任何与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相违背的作风存在；其二，作风主要指党员个人在实际活动中表现出来的风格。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也曾多次使用作风一词，主要是批评苏维埃机关中的拖拉作风，提出了同官僚主义，拖拉作风作斗争的办法。如，1918年起草了《关于苏维埃机关管理工作的规定草案》，1922年5月写了《劳动国防委员会给各地方苏维埃机关的指令草案》等著作。这里列宁使用作风一词，主要指工作作风，包括党员个人的工作作风和整个国家机关的工作作风。列宁逝世

以后，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著名长篇演说中把列宁的工作作风概括为“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的结合。使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成为有确定内涵的规范化概念。

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较早提到作风问题，是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其中写道，“坚持不屈地反对一切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在延安，1937年5月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等一些党的领导人都在讲话中提及作风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党风”这一概念。他说：“学风和文风都是党风，都是党的作风”。经过延安整风，这时党风问题已由党员个人问题扩展到全党的问题，形成了全党的统一作风。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把我们党已经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使党风成为一个有特定含义的完整的科学概念，并把它写入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用以指导全党的行动。

（二）提出了把党风问题提到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加以解决的原则

党风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表现。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表现在党的行动上，就是知行统一，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表现在党的行动上，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有了这种世界观，党员就会在行动上无所畏惧，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会不怕困难，坚持艰苦奋斗。党的世界观决定着党性，党性的纯与不纯往往又通过党风表现出来。因此，党风、党性、党的世界观三者，党的世界观是源头，然后才有党性，才有党风。既然党的作风是党的世界观在行动中的表现，世界观决定党风，党风反映世界观，那么纠正不正之风，树立优良作风，

就必须着眼于从世界观上解决问题。据此，在党风建设中，毛泽东等人十分注重党性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他认为，党风不正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所以必须加强党性修养。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等等文献中一再论述了加强党性锻炼和世界观改造的重要性，并把这一原则具体应用到党风建设的实践。

（三）特别强调领导者以身作则，认为这是搞好党风建设的关键

党的历史证明，优良作风的养成总是与领导者的倡导和榜样作用分不开的。所以说，搞好党风的关键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我们党在加强党风建设时强调，党的领袖、各级领导干部对革命事业、对党的建设、对端正党风负有更重大的责任，要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等方面成为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榜样。延安时期，党中央文件和党的领导同志对这个问题有大量的规定和论述。毛泽东曾讲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要求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带头搞好党风，是我们党进行党风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四）充分依靠党员的觉悟性，引导党员自觉培养优良作风，克服不良作风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员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党风的好坏。我们党在加强党风建设中十分重视提高党员素质。党积极引导党员加强个人修养，依靠党员的觉悟性树立优良的作风。毛泽东 1941 年 8 月给肖军的信中强调：“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1941 年 7 月中央政治局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要求每个党

员，都要“深刻地自省自己的弱点”，周恩来自己制定了“我的修养要则”，提出了七方面加强自我修养。特别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论待人接物》对共产党的修养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并提出了共产党员的修养方法，即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革命实践相结合，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通过加强党员修养，提高党员觉悟，才能保证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

（五）创造了整党整风形式和一整套正确解决党风问题的原则、方针和方法

如以整党整风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批评——团结”等等。

（六）提出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综合建设党风和治理党风的问题

搞好党风是一个整体的综合治理的过程，也就是说，整顿不良作风，非有集体的行动、统一的步调，不能成功。各级党组织都要做好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没有有效的宣传教育，党风建设就没有牢固的思想基础；没有必要的组织及纪律措施，党风建设也就没有可靠的物质保证。党风建设涉及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必须综合治理。

第八章 实现全党的坚强团结

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是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能否正确地把握这一规律，是一个政党在政治上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总结了我们党 20 多年来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在深刻认识党内矛盾性质的基础上，提出了指导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和原则，找到了解决党内思想矛盾的正确方法，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延安整风运动之中，从而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实现了全党的坚强团结。这是我们党在党的建设中的一个创造，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的理论。

一、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

加强党的团结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既没有经济上的巨大实力，也没有意识形态上的优势。要实现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党首先必须依靠自身的团结和巩固。离开了党的团结，党就无法生存、发展和取得胜利。为此，早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之初，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总结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

经验教训时，马克思则明确提出，团结是国际的一个基本原则，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一切国家的一切工人中间牢牢地巩固这个富有生气的原则，我们就一定会达到我们所向往的伟大目标。”^① 列宁在创建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和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他认为，无产阶级最亲密无间的团结，无论是为了尽快地实现最终目标，或是为了进行现实的政治、经济斗争，都是绝对必要的。

党始终重视党的团结和统一。因为它知道，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异常强大的敌人。要战胜这样的敌人，无产阶级自己必须有强大而统一的组织。只有党的坚固的团结和统一，才能率领本阶级和全国民众进行战斗并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因此，党把团结和统一看作是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党克敌制胜的“无价之宝”。

在延安时期，党肩负着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因之，党内团结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的团结，把它看作是党的生命，解决党的一切任务的决定因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② 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演讲时也专门讲到了党内团结的重要性，认为党的团结与统一在今天已是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对于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胜利更具有特别重要与决定的意义。

把党的团结提到如此的高度来认识，是由当时党所处的特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5页。

环境和党内状况所决定的。具体来说：

（一）当时中国正值对日抗战的严重时期，日本侵略者把占日本总兵力一半以上的陆军主力部队压在中国战场上，特别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占领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为挽救民族危亡，我国各党各派联合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提条件，就是首先巩固共产党自身的团结统一，否则，全国人民与各党各派的团结就是一句空话。在这种情形下，破坏共产党内部团结的任何行为，都是自觉与不自觉的最大的帮助日寇。

（二）鉴于我们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日寇、汉奸及妥协投降分子与反共分子，纷纷倾注全力来破坏共产党内部的团结统一。他们派人千方百计地钻入共产党内部，利用一切机会进行阴谋挑拨，使共产党内部发生不必要的斗争，相互不信任，制造分裂。因此，维护党的团结，成为每个党员的重要责任。

（三）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要求党员除与下层劳动群众建立和保持密切的联系外，还须与上层社会的各色人物接触，甚至需要参加国家的、军事的、行政的工作，因此旧社会各种不良思想习惯的影响和物质的引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这为党保持无产阶级的纯洁性和思想意识的统一性造成更大的困难。

（四）抗战以来，党内吸收了70余万新党员，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了大多数，他们一方面具有很可贵的革命积极性，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把他们身上残存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带到党内，产生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从而使党内发生不团结的现象成为可能。

(五) 由于党在组织上存在各种缺点错误，党员和干部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意见分歧，加之全国正处于战争状态，交通不便，各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包围，使党的中央及各地高级领导机关不能完全集中统一领导，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更加困难。

(六) 过去我们党内缺乏关于团结的经常教育，在党内斗争中也曾出现某些原则上、方式上的错误与过火行为，某些同志对于党内纪律与民主集中制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甚至个别党组织中经常发生无原则纠纷，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党内团结。

刘少奇对以上诸多方面原因作了认真的分析，然后提出，继续保持与巩固我们党内的团结和统一，是全党同志特别是干部应当努力的严重任务。任何不团结的现象，都能被敌人所利用，都能给全党的工作以极大的损失，甚至遭受失败。为此，党中央向全党发出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能战胜一切的口号。

党的团结首先是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及全党团结在中央周围。刘少奇认为，这是团结全党的关键所在。党中央是党组织的首脑机关和中枢神经。只有党中央团结一致，党内才能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而实现全党思想上的一致和组织上的统一，更好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担。如果党中央经常处于涣散、无序甚至分裂状态，党组织势必失去任何力量，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将是一句空话。党的历史多次证明，当党中央团结一致、坚如磐石时，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中国革命就蓬勃发展；反之，当党中央意见各异、纷争不断时，党的事业就举步维艰，中国革命就停滞不前甚至遭受挫折。为了加强党中央内部的团结，党在延安整风的前期和后期，分别组织高级干部学习党史，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弄清了党的重大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统一了思想认识，并以党的决议的形式作出正式

的结论，使党中央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团结，除了中央内部及全党对中央的团结之外，还有党的上下级组织的团结，新老党员及新老干部的团结，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内部的团结，党员同志间的互相团结及党所指挥的武装部队的团结等。毛泽东提出，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并号召全党要团结得像兄弟姐妹一样，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他认为，加强全党的团结是党的力量所在。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

党的团结是建立在一定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袖们尽管十分珍惜团结和统一，但却从来反对无原则的团结和形式上的一致。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刘少奇也指出，党内团结，是原则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党的团结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上的统一，以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纲领，以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来作为团结基础的。那末，怎样实现这种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呢？延安时期，党认真总结了20多年来党内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找到了实现这一团结的途径，即通过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来达到党内的团结一致。

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是党内矛盾运动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推动党的发展。党内团结只有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才能实现。因为如果不对党内的错误言行和倾向进行必要的批评斗争，错误就会越变越大，党内矛盾就会日益加深，结果必然危及党的团结；但是如果无限度、无节制地乱斗一气，搞

得人人自危，不仅党内矛盾得不到化解，党的团结也将成为泡影。对此，刘少奇曾专门做过论述。他说，团结自己，战胜敌人，这是我们的总方针，所以在我们党内是讲统一、讲和气、讲团结的方针。但是当党内对某个问题的争论已经发展成为原则上的争论，非用斗争来解决不可的时候，我们应该毫不躲避地进行党内斗争，来解决这些争论。然而斗争的目的还是为了团结，以斗争达到团结。可见，党的团结是党内斗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内斗争是实现党的团结的途径和手段，只有通过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党内矛盾与斗争，才能达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目标。

基于以上的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妥善地处理党的团结与党内斗争的关系。毛泽东在许多重要场合的讲话中都强调，党内开展批评斗争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位，要有利于而不是妨害团结。1942年1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应当是：第一是团结，第二是有了错误要进行批评。针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斗争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作法，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并把它科学地概括为一个简要的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到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正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地把握了党的团结与斗争的辩证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原则，才使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从而在全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可以说，延安整风运动，

是我们党正确地运用党的团结与党内斗争理论的成功范例。

二、党内斗争的实质

对党内斗争的性质作出正确分析，是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前提条件。

党内的矛盾和斗争是普遍存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①然而党内斗争的历史证明，党内的矛盾和斗争又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多样性的。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反对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党的历史表明，正确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党成立的20多年间，我们党曾经同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和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并在斗争中逐步成长和发展起来。

（二）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党内错误倾向往往从“左”或右的方面背离或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党的正确路线，它与错误路线的区别在于尚未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形成完整的体系，尚属局部的思想、观点或作风上的错误。

（三）反对党内宗派活动的斗争。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是向党闹独立性，在对待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上，总是强调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为了达到某些目的或是拉拢一部分人，或是排挤一部分人，甚至结成帮派组织。

（四）反对党内一般错误思想和行为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党内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6页。

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着。主要指党员之间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品行作风上的优劣、工作方式方法上的是非所产生的矛盾和斗争。

在党内，以上诸多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往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延安时期，随着1936年10月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红军主力长征胜利会师于陕北根据地，各路“山头”的领导人也相继齐集陕北，党内、军内各种矛盾明显增多。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在诸多的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并透过矛盾的表层把握党内矛盾的性质，就成为正确地解决党内矛盾与斗争的关键所在。此时，党已经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并积累了丰富的党内斗争的经验，在探索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党提出了党内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思想斗争的科学论断，这为制定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和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在这方面，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党的领袖做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党内斗争实质的论述是从分析产生党内矛盾的诸多根源入手的。早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前，毛泽东就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①刘少奇更为详尽具体地论述了党内斗争的来源。刘少奇首先指出，党内斗争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我们党长期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作风无时不对党产生影响。其中对党影响最大的当属小资产阶级思想。刘少奇指出，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要与不同的革命阶层和阶级联合。由于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党只能不断地从小资产阶级中补充自己的队伍，于是不可避免地将小资产阶级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06页。

思想意识、作风习惯带入党内，形成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和对立。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有时在党内潜伏着，只在一些个别的小问题上暴露出来，有时发展起来，系统地暴露在党内各种原则问题、党内斗争问题上。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也是党内斗争的主要来源。

党内斗争也是党外阶级斗争的反映。在中国，党为担负自己的历史使命，一方面必须领导人民大众同一切剥削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受到剥削阶级的影响。统治阶级的屠杀政策和诱惑收买等手段，有可能使党内的不坚定分子屈膝投降、脱离革命。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也往往被党内某些动摇的不坚定分子带入党内。因此，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引起党内斗争。

党内斗争还有其思想认识根源。由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由于党员社会出身的不同，所以在党内就产生了党员间在世界观方面的某些差异，产生党员间对于同一事物同一问题之不同的认识方法和思想方法。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但是，也有一部分人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事物，习惯于孤立地静止地看待事物，主观地片面地认识问题，所以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在党员之中看问题的方法不同，就使他们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就必然引起党内许多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分歧和争论，从而引起党内斗争。无产阶级政党成员之间认识上的差异，也是引起党内斗争的重要原因。

在科学分析党内斗争根源的基础上，刘少奇明确指出，党内斗争，“主要的是思想斗争，它的内容是思想原则上的分歧与对

立。”^①

诚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严重的路线斗争，给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如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使党几度濒临绝境。但究其主要根源，还在于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这种思想矛盾的实质，一般来说，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而是如何革命的问题。也就是党内在革命形势、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革命的具体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和分歧。毛泽东在批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同时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② 他曾经说，在打蒋介石时，我们党就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等问题上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大体上说，不同的意见主要不外乎这三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敌人，什么是朋友；第二，如何组织队伍；第三，如何打法”。^③ 这种分歧和斗争，是“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④ 刘少奇也阐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在党内，由于同志间原则上的分歧与对立，虽然可以发展到政治上的分歧，在某种情形下，甚至不可避免地发展到党内组织上的分歧，但是它的实质、它的内容，基本上还是一种思想斗争。”^⑤ 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党内斗争实质的分析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8页。

③ 《“七大”工作方针》（单行本）第9页。

④ 《“七大”工作方针》（单行本）第13—14页。

⑤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9—180页。

正确地反映了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党内斗争的客观规律。

党对党内斗争实质的正确认识得来不易。它是在经历过多次党内重大斗争的洗礼和锻炼，并在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基础上获得的真知灼见。很长时间以来，由于党的理论水平不高，不能正确地把握党内矛盾的性质，因而在党内斗争中，不是着力于弄清思想，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和原因，而是意气用事，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如1927年的“八七”会议，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是正确的，必要的，然而，会议在不让陈独秀参加会议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缺席批判。同时，把共产国际代表应承担的责任一古脑推到陈独秀的身上。随后发生的三次“左”倾机会主义也都因为缺乏对错误根源的深刻剖析，只是简单地采用组织手段，撤换一、两个负责人来解决党内的意见分歧，结果导致“左”倾错误一犯再犯，愈演愈烈。党内斗争的实践表明，党内机会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思想认识根源，只有认真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才能有效地克服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路线的负责人固然对机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全党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机会主义的观点就不能形成气候，就会及时受到抵制和克服。因此，防止和纠正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本途径在于，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用正确思想统一全党的认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那种希图依靠撤换几位负责人来解决党内矛盾的作法，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

在延安时期，党在经历了20多年血与火、成功与失败的考验之后，终于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党始终把着眼点放在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上。整风运动一开始，党中

央规定了 22 个整风学习文件，首先组织全党认真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界限。在此基础上，中央组织高级干部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六大以前》、《六大以来》计 380 万字的党史资料，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时，进行比较、分析、鉴别，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作了一系列有关党史的报告和总结历史经验的专题报告，引导大家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提高认识，端正态度。1944 年 4 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又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对党成立以来的全部历史，特别是 1931 年初到 1934 年底这一时期中央的政治路线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分清了在党史重大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对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方法上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以及贯彻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极大地加强了全党同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

三、既要反对党内斗争扩大化， 又要反对取消斗争的自由主义

长期以来，在党内斗争中，主要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机械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一是取消斗争的自由主义。在延安时期，党认真吸取了以往党内斗争中的教训，坚持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党内斗争扩大化，又反对取消斗争的自由主义，保

证了党内斗争在正确的轨道上进行。

遵义会议以前，在党内斗争中主要存在着党内斗争扩大化的倾向。这种“左”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错误地捕捉党内斗争的对象。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认为，党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胜利，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只有依靠党内斗争，才能得到灵验如神的开展。所以，他们在党内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时候也硬要去“搜索”斗争对象，故意制造党内斗争。

（二）频繁地、毫无节制地开展党内斗争。王明错误地把党内斗争作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要求在党内全面开展“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有些同志机械地、绝对地理解党内斗争，认为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要开展党内斗争，于是把什么小事都提到所谓“原则的高度”，动辄戴上“机会主义”大帽子，否认党内在原则一致基础上的和平。

（三）党内斗争的方式方法粗暴简单。在一些地方经常采用所谓“斗争会”的形式解决党内矛盾。这种“斗争会”主要不是为了检讨工作，而是要打击某某人，用以压服那些敢于坚持自己不同意见的同志。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全党时期，一些同志把党内斗争方法与党外斗争方法不加区别地混淆起来，用对敌人对异己分子斗争的方法来对付党内同志，把监视、逮捕、监禁、审判等办法也运用到党内斗争中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四）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施行惩办主义、驱逐政策，以组织决裂作为党内斗争的归宿。1927年11月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开了一个对党的干部施行惩办主义的先例。会议采取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打击政策，对各地领导武装起义失败的负责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给予撤职处分。从此，惩办主义、

组织处分成为“左”倾机会主义者处理党内斗争的基本手法。这种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方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曾经造成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现象；肃反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则使数以千计的党员、干部被逮捕或杀害，给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为使全党深刻认识党内斗争扩大化给党造成的危害，彻底消除其影响，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中详细地分析了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党内斗争时产生偏向的社会历史原因。他指出，党的建设是遵循列宁的原则来进行的。这有好的方面，它使我们党从最初组织起就有自我批评和思想斗争，就有严格的组织与纪律，而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则使一些同志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使党内斗争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这是因为许多同志机械地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建党原则，把列宁的建党原则教条化、绝对化。他们不了解列宁的建党原则是在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在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中，充满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即反对不要严格的组织与纪律，反对无原则的党内和平，反对不要党内的思想斗争及害怕自我批评等。而中国很少第二国际的影响，也不存在欧洲工人贵族阶层。恰恰相反，在中国党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成份占着相当大的比重。如果忽视中国党的自身特点，不注意克服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狂躁症，而机械地运用列宁的建党原则，在党内斗争中，机械、过火的现象就不可避免。党的这种特殊环境与特殊条件，决定了党内斗争扩大化很易成为党内斗争中的主要倾向。

遵义会议以后，党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在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中央及时提出防止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自始至终强调要把张国焘同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

区别开来，明确指出，所犯错误，应该由张国焘负最主要责任，最广泛地团结了四方面军的广大党员和指战员，避免了党和红军的分裂。对张国焘本人，也采取了既严肃批评又耐心说服的方法，并给他充分的改正错误的机会。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党积累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丰富经验。

在整风过程中，为了避免重犯党内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保证这场伟大的思想斗争的健康发展，毛泽东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求我们进行党内斗争中，一方面，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和批判以前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另一方面，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要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毛泽东曾对“治病救人”做了个很贴切的解释。他说，治病救人是说，为了救人而去治病。人本来是好人，但病菌进去了，得了病，就请医生看一看，吃点药，治好了。要救人不治病不行，要治病不救人也不行。

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逐步总结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法，主要是：

1. 要有团结的愿望和与人为善的态度。毛泽东指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错误人人皆有，只是各人大小不同。任何犯了错误的人，只要真正愿意改正错误，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对同志不能搞冷嘲暗箭，更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同志。毛泽东认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腐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2. 批评要实事求是，斗争要恰当、适度。刘少奇指出，对待

错误，要从客观实际出发，把事实弄清楚，对错误的性质、严重程度、范围及影响，进行符合实际的剖析，不能夸大错误，滥扣帽子。对错误的分析应把重点放在产生错误的原因方面，首先“对事”，然后“对人”。对于犯错误同志应负的责任，当然应说清楚，但不要过分予以指责和追究。对同志的批评要恰当适度，掌握分寸。刘少奇指出，党内斗争不是斗得愈厉害愈好，问题提得愈严重愈好，给别人戴的帽子愈大愈好，而应当有所限制，讲求适当，“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3. 要坚持用民主的、讨论的和说理的方法，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提出，开展批评或者斗争的含义，就是“好好地说理”。思想斗争，只能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用正确思想克服错误思想，如此才能使人心服、口服，达到真正的思想上的一致。思想斗争的特点决定了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采用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采用民主的讨论的和说理的方法。为此，在整风过程中，党中央始终强调要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允许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些同志对一些问题，包括对自己的错误，一时想不通，党采取等待的政策，允许他有一个觉悟的过程；有些同志一时想通了，以后又有所反复，党提出只要行动上遵守党的纪律，就应当允许。正是经过反复地充分地说服讨论和风细雨的批评斗争，使大家真正从道理上弄清了是非，从而取得了思想上的一致。正如毛泽东所说，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4. 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整风中摒弃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采用简单的组织手段处罚犯错误同志的过火做法，提出了一套科学的办法。

首先，提出历史地、全面地评价人的功过是非，不搞全盘否定。刘少奇指出，当批评犯错误的同志时，不能把其缺点错误当作他的全部，还应指出他的成绩、功劳、长处和他的正确主张，这样才能给人以全盘的估计，才能帮助其进步。

其次，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人家改正错误。毛泽东说，党一方面必须对于错误思想进行严肃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地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自己觉悟的机会，不能采取绝交的办法，把人拒之门外或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帮助他们找出犯错误的根源和改正错误的方法。

最后，对历史上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的组织处理要慎重。毛泽东指出，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刘少奇也提出，思想原则上界限的明确划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应尽可能不采取组织手段及做组织结论。他批评了那种“一律不要”、“一概不能容纳”的驱逐主义政策，主张党的政策的宽容性。他认为单是在组织上处罚同志，并不能提高党的纪律，党的纪律和统一主要的不是靠处罚同志来维持，而是主要依靠党在思想上、原则上的真正一致来维持的。因此，组织手段不可滥用，对人的处理要留有余地，珍惜犯错误同志的政治生命。在整风后期，党对犯错误的同志作组织结论时采取了宽大的方针。在“七大”上，毛泽东提出对犯错误的人不一掌推开，亲自做说服、动员工作。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七大”选举了李立三、王明、博古为中央委员，张闻天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

在延安时期，党内除了存在党内斗争扩大化的倾向之外，还有另一种倾向，即自由主义。遵义会议以后，随着对党内斗争中“左”倾错误的纠正，一部分人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以无原则的党

内和平取代了党内的过火斗争，自由主义在党内滋长起来。主要表现在，有的人在思想上是非不明，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同错误思想和平共处。有的人不愿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有的人主张个人的言行绝对自由，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不要组织纪律。有的人以强调“民主”为理由，主张各种思想自由发展，反对从领导方面按照党的团结纠正错误思想。有的人搞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任意散布损害党、损害革命利益的错误言论。

在延安整风运动前期，自由主义又有所发展，在许多地方已经成为妨碍党内斗争正确进行的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有些部门“就文件讨论文件”，不愿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缺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有的甚至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斥之为溜沟子拍马屁。有的人密定协定，互不侵犯，把“与人为善”当作拒绝或逃避批评的盾牌。有的人则由于政治经验不足或者理论水平过低，“斗不过人家”而退却下来，故而在整风中出现敷衍应付的情况，一些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均未展开。面对这种情况，党对党内的状况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决定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机械过火的党内斗争，又要反对自由主义。同时指出，当前党内的主要倾向是自由主义。过火的党内斗争仍然存在，在某些地方甚至还比较严重，但就全党来说已不是主要倾向，因此应强调反对自由主义。

为彻底肃清自由主义的坏影响，1942年3月，党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对产生自由主义倾向的主客观原因作了认真的分析。指出，从客观上看，一是因为抗战以来党

接收了约 70 万新党员，而这些新党员不论来自哪一阶层，都未受过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铁的纪律的锻炼，他们带来了浓厚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其中尤以许多知识分子党员表现得最为严重。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在入党初期，仅仅怀抱着一个民族主义目的（抗日），没有共产主义目的，或对共产主义仅仅采取同情态度，因此，他们不愿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不愿服从无产阶级纪律。另有许多人虽有模糊的共产主义目的，但对马列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纪律则认识不深刻。二是党原有的数万党员，虽然经过长期实际斗争锻炼，但其中有许多人对于马列主义思想与无产阶级纪律的认识依然很差，因而发生自以为是、个人意见第一、闹独立性等毛病。三是遵义会议后，党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在党内外实行了正确的宽大政策，但在具体执行中，却被有些地方和部门作了不正确的解释，把宽大政策变为自由主义。有些部门对待干部缺乏严肃的态度，只强调团结教育的一面，忽视了对错误进行批评以至必要的斗争的一面。此外，过去犯过“左”倾错误的许多同志消极地吸取了以往的教训，今天又反过来犯了右的自由主义错误。四是日寇与国民党乘着我们党抗日统一战线成立和大量发展党员的机会，派遣一些内奸混入党内，他们以党员面目在党内活动，利用党员中不坚定不纯洁的分子，挑拨离间，败坏纪律，散布自由主义空气。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之外，党内教育工作的缺乏与放松，则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主观原因。在分析了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之后，中央号召全党在整风中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

党内的批评与斗争是推动党进步的原动力。党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用自我批评方法，不断清除附着在自己肌体上的污垢和病菌，从而保持良好的循环和健康的体魄。丢掉自我批评的武器，放

弃积极的思想斗争，听凭错误现象任意蔓延，党就会失去活力，就要变质，以致最终停止自己的生命。正如毛泽东所说，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在客观上起着援助敌人的作用。

为克服自由主义倾向，党中央把毛泽东在 1937 年所写的《反对自由主义》列为整风的必读文件，帮助全党提高对自由主义危害的认识。同时要求党的高级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弼时，主动检讨了自己在党的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对错误的性质作了深刻的剖析。党内其他高级干部也都结合自己的工作互相开展了严肃而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高级干部的带动下，全党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风气，自由主义得到了有效的抵制和克服。

总之，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正是因为党正确地开展了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所以保证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并最终收到了提高认识、团结全党、增强战斗力的巨大成效，延安整风运动和整个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党内团结和党内斗争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第九章 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目的是为了实现对革命事业的领导。关于这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有过论述。但是，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把能否坚持党的领导提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并指出实现党的领导的首要问题和中心问题、基本条件和基本原则，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加以创造性解决的。党的领导原理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时期，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和发展，毛泽东的党的领导的思想更加充实和系统，形成了理论体系。党的领导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毛泽东建党思想走向成熟的又一重要标志。党的领导原理的核心就是坚持党对革命事业的正确领导。在中国，离开了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这是无可辩驳的历史结论。

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一文中明确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

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①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又郑重宣告:“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② 这就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中国革命中肩负着至关重要且不可替代的领导责任。

那么,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把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进而将中国革命引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呢?毛泽东通过总结百余年革命运动的历史,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及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等情况,对问题作出了深刻而肯定的回答。概括和归纳毛泽东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大致分如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那时候起,中华民族的许多仁人志士为了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顽强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但是,直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没有一个斗争不是失败的,成效甚微。洪秀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7—1098页。

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倡导的维新变法、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等，概莫例外。原因是什么呢？其根本原因就是革命运动没有真正革命的理论指导，没有一个真正彻底革命的先进政党作为领导核心。从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看，太平天国运动是单纯的农民革命运动，作为革命基本力量的农民，毕竟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可能建立先进的政党，不可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提出科学的纲领和政策，因而不能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代替旧制度。辛亥革命是比较更完全意义上开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国思想深入人心。但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十分软弱的、具有极大妥协性的阶级，他们害怕帝国主义，又不敢发动广大农民去消灭封建的土地制度，摧毁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因而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历史证明，他们都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者。

近代中国革命，只有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用毛泽东的话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

路。”^①

中国无产阶级是个什么样的阶级呢？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成为中国社会里比较最有觉悟的阶级。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② 正因为中国无产阶级有这样一些与众不同的优点，所以，一当它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就充分地显示出极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从此以后，中国革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③

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自封的。从它一诞生，“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此以后，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3—1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15页

中国历史的发展就离不开共产党，不但离不开共产党，而且是以共产党为中坚来发展的。”^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中国革命是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它宣告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已经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世界革命已经开始。中国民主革命已经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在阐述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性质和前途时说，十月革命以后，在世界上“竖起了两面大旗：一面是红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②他坚决地批驳了资产阶级想把中国革命引上资产阶级革命的老路，企图在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毛泽东指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在国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环境，是资本主义向下没落，社会主义向上生长的环境。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要想在中国建立由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不会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而不是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临近死亡的时期，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允许任何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也不会容许。因为中国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只能得到社会主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5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页。

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所有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敌人。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再去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堪设想，中国人民是决不会答应的。那么，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毛泽东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国革命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①“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在抗日战争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内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既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的专政。”^②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前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基本的特征。它的基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并使革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完成这样艰巨的历史任务，没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不可能成功的。况且中国革命的敌人又是异常的强大，中国革命若是没有无产阶级这个中国社会最坚强、最有力量、最能战斗的阶级作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8页。

导力量，没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作中流砥柱，就不能够把其他革命阶级、阶层团结起来，形成足以最后地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所以，毛泽东指出：“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党的性质决定的，是党在长期的艰苦奋斗中确立的。创建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马克思恩格斯理论遗产中的主要思想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在它的纲领《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阐明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列宁在俄国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指出：党是阶级的觉悟的、先进的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它吸收了这个阶级的一切优秀代表，集中了经过不断的革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的、完全觉悟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由此可见，革命导师的出发点是，党应当是工人阶级先进的有组织的队伍，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起领导作用，它的活动应当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正是这样的政党。她是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且和中国工人运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2页。

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政党。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① 刘少奇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是代表着现今人类社会中最光明的最进步的方面，是人类最高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寄托和发育之所。世界上最觉悟、最进步、最健全、最有道德和最富正义感的人士，集中在共产党中，而坚持不屈地和一切黑暗势力搏斗着，为人类社会的光明和最后解放奋斗着。”^② 这些论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它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在中国工人阶级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优秀品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忠诚战士和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建立起来的，它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并以此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南。它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完整地制定了自己的纲领，党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最高纲领是建成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纲领完全是从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出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第 834 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148—149 页。

发的。中国共产党绝不仅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而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不仅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进行奋斗，而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进行奋斗。除了阶级的利益，中国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和纪律建立起来的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统一整体。它非常有战斗力，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实现自己的目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先进性，决定了她能够当之无愧地担负起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责任。

二、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中国共产党能否运用好统一战线这个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成败的大问题。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的关键问题，则是统一战线中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之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①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特别是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问题中，在同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7页。

误的斗争中，阐明了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权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他在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党的领导的基本原理。

1937年日军进攻芦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组成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它的政策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国共两党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因而虽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一致抗日的局面，但是在统一战线内，国共两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形成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国民党从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推行的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单纯依靠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包办的片面抗战路线。旨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共产党则实行的是放手发动群众，动员一切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全面抗战路线。旨在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这样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必然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其斗争将贯穿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中。斗争的实质，就是谁来领导抗战的问题；斗争的结局，将关系到是使抗日战争有利于巩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还是使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反对片面抗战路线，争取抗战的胜利。

但是，当时共产党内对于统一战线中的斗争存在着不同的认识，逐步形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倾向。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抹煞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

许的范围内，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树起了自己鲜明的旗帜，同统一战线内的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共产党内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思想，主要包括：

——为什么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原则，就是在统一战线中，实行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保持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冲破国民党的限制和束缚，努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际就是坚持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及至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毛泽东在抗战刚开始时，就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①他毫不含糊地作出结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1页。

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①

毛泽东还就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使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其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提出并实行自己的政治路线，既不破裂统一战线，又不束缚自己的手脚，既统一，又独立。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

毛泽东还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指出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权的重要性，他说：1924年至1927年的经验，表明了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这种历史不应当重复了。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客观上虽然不能领导中国革命，但他们却千方百计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这就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依现时的情况说来，丢掉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势必放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结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所以，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94页。

成为实现党对中国革命领导的一个重要的方针。

——怎样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原则和措施。例如，在统一战线内，制定和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毛泽东指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这里所谓联合，就是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变为武装斗争。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一定时期中同资产阶级联合，党就不能前进，革命就不能发展；如果我们党不知道在联合资产阶级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就会瓦解，革命就会失败；又如果我们党在被迫着同资产阶级分裂时不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武装斗争，同样党也就会瓦解，革命也就会失败。毛泽东还阐明了具体的斗争策略，指出，基本策略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在与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政策和策略是实现政治路线的重要手段。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定而明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就能够保证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从而有效地实行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

再如，在共产党内，坚决反对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组织统一战线的问题上，必须实行坚

决的、严肃的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要反对忽视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参加革命斗争的可能性的错误。这种错误，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看做一样，因而忽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并尽可能保持这个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另一方面，则要反对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纲领、政策、思想、实践等等看做一样的东西，忽视它们之间的原则差别的错误。这种错误，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不但在极力影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还在极力影响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力求消灭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力求把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变成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尾巴，力求使革命果实归于资产阶级的一群一党的事实；忽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一到革命同他们一群一党的私利相冲突时，他们就实行叛变革命的事实。如果忽视这一方面，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实践中，在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时，为了更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以争取共产党的领导权，我们党同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做了坚决的斗争。统一战线建立后，为了坚持党在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领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我们党又对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抵制。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正是在反对党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中坚持和实现的。

再有，刘少奇曾对如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问题作出过专门的论述，他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自己确实地、不动摇地独立起来，然后才能与别人进行平等的联合。若是无产阶级自己还不能独立或取消自己的独立，那就不能联合别人，只能供别人利

用。在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保持与加强自己的独立呢？（一）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不要放弃自己的独立立场，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二）对于每一个重大事变和重要问题，都要根据自己的观点给以分析，提出自己独立的主张和办法，并根据自己的主张行动；（三）要在群众中宣传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并评论各党派的主张，使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与其他各党各派的观点和主张在群众面前分别得清清楚楚，让群众来选择；（四）要建立无产阶级群众独立的组织和独立的力量，要加强巩固我党的组织和一致。”^①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个重要的法宝，其中一条根本的经验，就是始终正确地对待统一战线内的斗争，始终坚持通过斗争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争取和实现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充分地反映了这一点。可以这样说，没有统一战线内的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就没有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三、党指挥枪 还是枪指挥党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革命原则，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是对的。然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也不同于俄国的“十月革命”。当时的中国，反动势力十分强大、革命力量相对弱小。中国共产党又长期处于“非法”地位和白色恐怖之中。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只能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战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9—50页。

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①因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问题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掌握枪杆子。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由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因此,无产阶级的军队必须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这条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他不仅强调和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规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基本条件和实现途径,逐步形成了一系列保证党指挥枪的根本制度。从历史的追溯中,我们可以看清毛泽东关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脉络。

我们党从成立到参加北伐战争,对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认识还很不够。在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指导下,党不敢与国民党争夺对军队的领导权。1927年,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12”血的教训使我们党清醒起来。于是,党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小上百次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毛泽东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党虽然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1924年至1927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4页。

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革命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①

当我军初创时期，主要成份是农民，但也有从旧军队过来的人员，甚至还有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军阀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失败情绪等在红军内有很大影响。要把这样的队伍改造成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党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加以统一，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坚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才能把红军建设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担负起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任务。秋收起义后，毛泽东领导部队在江西永新举行著名的“三湾改编”，第一次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第一次全面地阐明了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问题。古田会议强调在红军中“要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实现党委集体领导。为了建立党在红军中的领导中枢，毛泽东提出了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实现党的领导的途径和措施：（1）必须确立一条正确的指导路线，使党在政治上成为红军的坚强核心。指出党的领导机关遇事要拿出主意，作出正确决定，为红军指出前进方向；各级党组织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决定，保证党的指导路线的顺利贯彻。这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基本思想。（2）必须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以确保党对红军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不仅规定了红军思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7—548页。

想政治工作的任务和19项具体内容,而且规定思想教育和训练的具体方法,同时还建立了红军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机构、条例和制度。(3)必须健全党中红军在的组织机构,使党的思想政治领导有可靠的组织保证。提出要处理好军事与政治、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强调在前委的统一指导下,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

红四军的建军原则和制度逐渐在其他红军部队中实行。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正是这支军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次“围剿”,历尽千难万险,把革命的烽火举到陕北,成为后来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中坚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国民党借口“军政统一”和以给装备、给军饷、给官职为诱饵,企图取消我们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党内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主张放弃党对军队的领导权。党中央顶住了国民党的压力,排除了党内错误的干扰,牢牢掌握人民军队的领导权。1937年8月,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签署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强调指出:各师改编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坚决执行中央与军委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外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领一部分军队。中国则不同,由于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①“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页。

(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现在是民族抗战，还要争民族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劳动人民几千年来上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欺骗和恐吓的老当，很不容易觉悟到自己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全民抗战，把劳动人民推上了战争的舞台，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这个战争的最自觉的领导者。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①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八路军新四军能够挺身而出，以弱小的力量，担负起抗日救国的历史重任，靠的正是党的坚强领导。在党的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方针指引下，我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终于打败了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并大大发展了自身力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主要阐述了确立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初步论述了如何实现党对红军的领导，并建立了一些制度。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思想进一步深化。根据形势的变化，毛泽东不仅坚持必须确保党在军队中的领导权，而且强调必须在统一战线中争夺共产党的兵权，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高到关系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首要地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6—547页。

四、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条件

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那么，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的原理，在延安时期提出了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几个基本条件。

——及时提出正确的政治口号和行动口号。毛泽东认为，要实现党的政治纲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要坚持党的领导，又必须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以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这种具体目标，是无所谓政治领导的。从历史经验看，当我们党提出了正确的政治口号和行动口号时，就能引导和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革命就胜利发展。反之，革命就遭到挫折和失败。例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我们党提出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红色政权”的正确口号时，革命就蓬蓬勃勃地发展；当中央提出了“夺取大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口号时，革命就遭到了挫折和失败。后来，我们党改变了这些“左”的口号，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口号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行动口号时，革命又有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这就告诉我们，及时根据历史进程提出正确的政治口号和行动口号，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首要条件。

——充分发挥共产党人在革命事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确定了党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就有了实现党的领导的先决条件。但

是，党的路线如果不付之正确实行，党的领导仍然是空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共产党员去贯彻和实现。党依靠全体党员以高度的自觉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各方面的模范行动，来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来实现党对群众的领导。毛泽东指出，当人民群众按照这种具体目标在全国行动起来时，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实际上体现了党的领导作用。

——与同盟者建立正确的关系和联盟。马克思主义认为，党的领导，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与同盟者建立正确的关系，并结成巩固的联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提出，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这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形式和条件。毛泽东还谆谆告诫：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我们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一定不能达到。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共产党要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必须首先使自己的组织坚强、团结、有力量。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断加强，才更能团聚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为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坚。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条件。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的状况，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在这方面主要强调：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优良的工作作风。

共产党队伍的发展。它既包括建立一支宏大的党员队伍，又包括建立一支强大的干部队伍。这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组织保证。

思想的统一性。它包括统一中央领导核心、各级领导骨干和全体党员对形势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认识问题。如果全党的思想不统一，行动就不会一致，因而就无法实现党对人民群众和广大同盟者的政治领导。统一思想，要靠思想教育。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

纪律的严格性。它既包括要遵守党的纪律，又包括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决议，维护党的团结。只有坚持严格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才能实现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优良的工作作风。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作风。无产阶级政党由于党的指导思想、最高理想和党的宗旨不同，也有自己所特有的作风。倡导和培育优良的工作作风，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条件。

——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照顾被领导者的经济利益。把政治思想教育和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教育群众，对群众关心的现实问题给予理论说明，指出完成我们近期任务和长远任务的途径和办法，提高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自觉地投身到革命事业中去。毛泽东指出，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当着人民还不觉悟的时候，把革命果实送给人家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事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今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

也已经是大大地提高了。我党在人民中的威信从来没有过现在这样高。但是，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提高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他认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有待于我们的宣传、鼓动和组织，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之下，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些论述告诉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手段和条件。

所谓“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讲的就是物质利益原则。毛泽东提出这个物质利益原则，是他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凡是违背了这个物质利益原则的，都受到了挫折。例如，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我军在占领城市时较多地损害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以立足。由于党执行了打击小资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逐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因此，就要求党在自己的政策中善于把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同日常的眼前的利益结合起来，根据需求和可能，适当满足群众的要求，至少不损害其利益。这是实现党的领导的又

一有效手段和条件。

总之，“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就是使革命获得彻底的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①

综上所述，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在党的领导问题上，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重任的必然性，坚持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重要性，及实现领导权的一系列原则、方法，特别是比较系统地提出和论述了实现党的领导的几个基本条件。这些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领导的原理，保证了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这些思想，对于今天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党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更好地发挥核心领导作用，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第十章 新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建党思想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探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建国40余年，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建国到1966年，在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毛泽东建党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也经历过一些曲折。从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建设受到严重破坏，党的建设理论也出现许多混乱和迷误。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的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也使毛泽东建党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一、建国以后，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发展和曲折

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从战争环境转到了和平环境，从农村转到了城市，这一根本变化使党的建设面临着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和新的考验。第一，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延安时期党的自身建设的丰富经验对执政党的建设是十分宝贵的。但是，执政以前和执政以后是党的建设的两个不同的

阶段。执政以后，党的地位、自身状况和所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单靠老经验是不能完全解决新问题的，必须进行新的探索。第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解放前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没有民主制度和民主传统，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在这种条件下领导全国政权和进行自身建设，其艰难程度不亚于夺取政权。正如刘少奇在1948年一次讲话中指出的：我们“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中国，事情更艰难了”。“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①第三，执政党的建设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完全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这种实践，只提出过一些原则性的设想，列宁逝世过早，也没有来得及全面系统地解决这个问题。当时可供我们党借鉴的，只有斯大林时期苏联党的经验。但苏联党的经验本身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还有不少教训，而且由于国情不同，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也不完全适用。

我们党对执政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论述了在夺取全国胜利后党所面临的新情况。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可能产生骄傲、以功臣自居、不求进取、贪图享乐等情绪；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主要危险；要求全党继续保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

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当然，这些论述还只是正确的预见和必要的提醒，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系统地论述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但是，它表明党重视执政条件下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标志着党在认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上，注意发扬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从1949年10月到1956年党的“八大”，是进一步探讨执政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建党思想在建国后继续发展的阶段。由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由于党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党成功地经受住了执政党地位的考验，党的组织得到空前迅速的发展，绝大多数党员朝气蓬勃，努力工作，党风很好，党的威信已经在人民心中扎下根来。这是党后来能够战胜“文化大革命”这场大动乱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时期党内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有些问题比预料的还要严重。当过“红小鬼”的青年领导干部刘青山、张子善的腐化变质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官僚主义作风在一些党员干部中也有所滋长，短短几年，有的省政府就积压了7万件人民来信没有处理。但是这些问题一经察觉，一般都得到比较妥善的处理，并能从中引出必要的经验教训。

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八大”时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八大”通过的党章。“八大”时党对如何领导国家，如何处理党群关系，如何进行组织建设，如何防止和克服不良思想作风等等，已经有了初步的经验。1956年是世界的“多事之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暴露出的一些严重问题表明，如果取得胜利的党，对自身建设注意不够，特别是在民主集中制、党群关系、国内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处理失当，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在一定的国际条件下，局势可能变得十分危险，甚至威胁到党的生存。这些国内和国际经验都

唤起我们党对自身建设的高度注意，并根据这些经验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从而把以前的认识大大推进了。

党的“八大”对执政党建设经验作了初步总结，提出了一些重要理论原则：

（一）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党和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八大”根据当时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虽然还有阶级斗争，但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二）执政党必须更加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说：“我们的各项具体工作，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等工作，百分之九十不是党员做的，而是非党员做的。所以，要好好团结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一道工作。”^①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提出，必须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克服骄傲自满情绪，遇事同群众商量等途径，来克服官僚主义和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

（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反对个人崇拜。“八大”把加强民主集中制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使党不犯错误与少犯错误联系起来。这主要是从苏联经验教训中得到的启发。“八大”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和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反对个人崇拜。“八大”党章明确宣布，任何政党

^① 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

和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是没有缺点和错误的。这实际上是对神化领袖观点的批评。还规定，任何党组织都必须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并且规定，中央委员会必要时，可设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这实际上表明，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领导职务也不是终身的。

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原则和论述都是正确的，有远见的，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遗憾的是“八大”的正确路线没有很好地坚持下去，这里有许多原因，其中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和执政党自身建设规律认识不足。

毛泽东在1962年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①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自然也包括党的建设规律）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既需要有成功的经验，也不可缺少失败和挫折所提供的教训。“八大”召开时，党执政只有7年时间，要全面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规律，7年时间毕竟太短了。当时，党只有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还没有经受社会主义时期曲折发展的教训。同时，执政党建设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充分暴露。由于“八大”所处的历史条件，当时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不够全面和深

^①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

刻，对执政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党章的权威性、执行党章的严肃性以及党章可能遭到的破坏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因此，“八大”虽然作出了许多正确的论述和规定，但一些规定还不够完善和具体，从全党范围说，也缺乏执行这些规定的高度自觉性。例如，“八大”虽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变的战略方针，但是当时党对实现这一战略转变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成熟地和牢固地树立起来，因而很容易在复杂的形势面前发生动摇。在反对个人崇拜，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方面，“八大”时党主要是借鉴别国党的间接经验，自己的实际感受不深，也没有采取严格有效的措施，特别是对于坚持党中央内部的民主生活，缺少制度上的保证。这些就是“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重要原因。

从1956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20年间，是毛泽东建党思想曲折发展的时期。前10年，党的建设理论有发展，也有错误；后10年，毛泽东建党思想受到严重破坏。

党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继续探索执政党建设的道路问题。毛泽东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断。

1. 重新肯定了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本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解决了的问题，但是，在新形势下，又受到了挑战。1957年，极少数人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公然提出要共产党下台，鼓吹“轮流坐庄”。1957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三大”代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

利。”^①

2. 对民主集中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1962年1月举行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并且强调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② 这些，都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发展。

毛泽东在党的建设问题上的失误是从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理论的错误派生出来的。大体上说，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逐步形成，到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才趋于严重的。这一时期，政治上，组织上“左”的错误逐步发展。在政治上，由于党没有牢固地树立起以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的指导思想，也由于党长期处在战争和阶级斗争环境中，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容易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搬用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特别是在1957年发生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情况后，党就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夸大估计，因而产生了对“八大”战略转变方针的动摇。1957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不断发展，给党的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组织上，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八大”党章的许多正确规定没有得到执行，党内民主生活日益削弱，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个人崇拜是一种在我国有深厚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1957年5月）。

②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

历史基础的封建遗毒，是强大的历史惰力，在缺少防范制度和思想警惕的情况下，它很容易复活和发展。应该看到，政治上“左”的错误和组织原则上的错误是差不多同时发生，又互相影响的。政治上的“左”的错误把党内一切分歧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形成频繁过火的党内斗争，从而造成民主集中制的削弱和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而民主集中制的削弱又使党不能及时总结经验，倾听党内外群众的意见，从而妨碍了纠正政治上“左”的错误。政治上、组织上错误的不断发展，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受到严重破坏。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恢复与发展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的又一次重要转折，它重新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也就为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恢复发展创造了根本的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指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方向；明确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全面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建设理论上的直接贡献，是提出和论证了加强民主集中制，扩大党内民主的重大课题，并恢复了毛泽东倡导的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

、 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从各方面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建党理论的发展不是偶然的。第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揭示出执政党建设的正确道路。历史的代价是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的。“八大”以后20多年的曲折发展，深刻教育了全党，和“八大”时相比，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无论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丰富得多了。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民主得以恢复和发扬，思想非常活跃。这样，党就能够深刻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最大限度地集中全党的智慧，从而解决长期以来缺乏认识和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时期，党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对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用一些符合当前实际的新结论代替某些已经过时的旧结论；用党的建设的新经验，充实和丰富原有的基本原理，使之更加完备和具体化；重新肯定和进一步阐明被“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否定过的一些正确原理。这些发展，体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有关论述及中央的有关文件中，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十二”大报告和党章中。这一时期，党建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关于正确发挥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关于健全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关于改革干部制度；关于正确进行党内斗争。以上这些方面的论述和规定，标志着党艰难地但是比较成功地把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且使全党有了统一的认识和比较高度的自觉。这是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的根本保证。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党的十三大召开，这是一次以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为中心任务的大会。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到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这次大会的任务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并且确定了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十三大”文件对于党的建设着重指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党的思想建设中，必须全面宣传党的基本路线，牢牢掌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党的基本路线统一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第二，进一步推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十三大”报告强调干部队伍的素质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具有决定的意义。指出，坚持干部的革命化，最重要的是看他是否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应当重用德才兼备、公道正派并能够创造性地执行党的路线的干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都要看实绩，要以此为标准，评价干部的功过是非。第三，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强调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从中央做起，理顺中央领导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解决好集体领导、集体决策的问题。第四，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风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起来。“十三大”报告指出，改革，将为我们党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我们一定要适应这一伟大的变革，把我们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建设好。这样，我们党就能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召开，这次大会是在

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关键时刻召开的。在党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动摇。“十四大”提出了90年代改革开放和建设的主要任务，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更快更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四大通过的党章，从党所面临的环境、任务以及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地位出发，明确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指导思想：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坚持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的坚强核心。“十四大”报告还提出了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环境中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解决的5个方面的重大任务。这就是：（一）认真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因为党的巩固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能否全面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能否正确处理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之间的相互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党的政治路线正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党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了，不等于党的建设就自然而然地搞好了，还必须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地联系起来，通过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十四大”报告指出，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领导集体，是保证党的路线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

报告强调选拔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进入领导班子是当前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在重申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的同时，报告明确地提出衡量干部的德和才，主要看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的表现。（三）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反腐败斗争，搞好廉政建设，对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特殊重要意义。（四）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五）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这5个方面的任务，都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

三、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对毛泽东 建党思想的突出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和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等艰苦探索的基础上，成功地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阐发了社会主义时期执政党建设的规律，解决了毛泽东生前未能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及毛泽东未曾遇到的新问题，在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把毛泽东建党学说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

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思想最大贡献，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时期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如何确立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

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要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要对中国的国情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其中就包括了对我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对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估计偏高，因而急于求成，实行超越阶段的路线、政策，搞“穷过渡”等。新时期，邓小平引导全党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社会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还不成熟。因此，“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① 这里一方面指明，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从成熟程度上讲，还处于初级阶段。经过“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我们党集中全党智慧，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明确规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在这条基本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邓小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并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早在1980年，邓小平就强调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强调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又多次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所阐明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执政党的建设引入了正确的轨道，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中如何正确地建设执政党，如何正确地发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7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3页。

挥执政党作用的问题。

（二）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

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关键在于把党自身建设好，使党组织坚强有力，才能带领人民去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而要把党建设好，必须有一个党的建设的正确目标。“文化大革命”中曾把“党组织应该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的50字建党纲领作为党的建设的目标和指导思想，其核心是党的建设要围绕阶级斗争进行。由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已不应是党的中心任务，“50字纲领”不能反映时代对党的建设提出的要求，因而，未能加强党的建设，而且在10年内乱中使党受到严重创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拨乱反正，其中也包括在党的建设的根本目标上的拨乱反正。

在党的建设的目标上，邓小平强调了两点：一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二是坚持党对社会主义领导，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党的性质问题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决定党自身建设的方向；把保持党的先进性作为党的建设的目标，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保持党的先进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正确领导，担负起时代赋予党的任务。邓小平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就给保持党的先进性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而且找到了在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途径。毛泽东生前一贯重视保持党的先进性问题，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他本意讲，也是为了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但实践证明，那条路是走不通的。党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必须站在时

代前列，提出那个时代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并成为领导人民实现这一政治主张的坚强核心。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把党的建设成为领导人民实现这一任务核心，党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的先进性。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是密不可分的，把这两者结合起来，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为党的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理论

1. 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主要在以下方面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建党思想。

第一，重新确立和深化了党的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后，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纠正“文革”的错误，确立正确的政治路线。然而，纠正“文革”的错误，要有极大的革命魄力和政治勇气。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纠正“文革”的错误，首先要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魄力和政治勇气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列主义，这样搞下去，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而是要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积极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于是在中国大地上，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又展开了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通过这一运动，重新确立、恢复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完整地表述了党的思想路线，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又明确提出，“实事求是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这一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还是第一

次。这些宝贵思想，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

第二，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克服僵化、半僵化思想的同时，党又遇到来自另一方面错误思潮的严峻挑战，即借口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事求是地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提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同时又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冷静的科学态度及革命的远见卓识有力地捍卫了毛泽东思想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地位。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这一论断，对于党的巩固与发展，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不仅仅涉及毛泽东个人，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看待我们党和现代中国的整个历史的根本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党和国家的未来。国际共运的现实证明，有些执政的共产党正是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否定了党的指导思想，造成极大混乱，以致失去执政地位。我们必须引以为戒。

第三，丰富和发展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党内错误思想的理论。

思想建设的实质是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加强思想建设，必须正确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克服党内一切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在这方面，邓小平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

首先，在反对错误思想的内容方面，提出了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宗法观念，等级观

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种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地区、部门之间划地为牢；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都是封建残余思想影响的表现。现在应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同时丝毫不能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其次，提出实事求是地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鉴于历史的教训，邓小平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就反右，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在反对一种错误倾向时，不能放松对另一种错误倾向的警惕和斗争，抓住重点，有所侧重。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讲话中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再次，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不搞政治运动，原则上不使用“路线斗争提法”。邓小平指出，对党内犯错误同志的错误性质要做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由于党内矛盾和斗争，实质上是一种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根据历史教训，邓小平提出要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和不由分说的那种“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他还提出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软弱涣散的情况。他指出，不搞政治运动，决不是放弃党内斗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必须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进行严肃认真的批评。这是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

2. 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主要有以下新发展：

第一，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

制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特征，是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重要条件。1962年，邓小平就指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粉碎“四人帮”后，他又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有关，防止“文革”重演，开创历史的新局面，都必须健全民主集中制。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根据“文革”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对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含义，邓小平多次讲，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我们要发扬民主，但同时需要集中。历史经验证明，在一个时期，在一定范围内，民主和集中在党内生活中可以有所侧重，但是，即使在重点强调一个方面时，也绝不可忽视另一个方面，离开集中讲民主，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离开民主讲集中，就没有正确的集中。根据邓小平这一思想，“十四大”党章对民主集中制概括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一新表述是我党多年来贯彻民主集中制经验的总结。

第二，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

首先，确立了适应新时期党的政治任务需要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建党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就及时提出：“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

行，结果不一样。”^① 所以，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的干部标准，就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这个前提下，实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十二大”把这一方针作为新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战略方针写入党章。“四化”方针是毛泽东关于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其次，树立了适应新时期政治路线要求的用人观点。这就是为贯彻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必须解放思想，树立新的用人观。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落后习惯势力；要解放思想，打破老框框，扩大视野，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用人要重在表现，注重实绩，上述思想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的用人观点。在邓小平倡导下，全党逐步树立起新的用人观点，对贯彻干部队伍建设的“四化”方针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再次，丰富了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理论。新时期，邓小平提出，干部队伍建设要按干部“四化”标准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使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里。“四化”要把革命化放在首位。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特别强调各级领导班子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一定要坚持改革，给人以希望。必须以改革的观点来确定领导班子的成员，要选人民公认的，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把他们放进领导班子特别是重要岗位。坚持改革的班子要扎扎实实做事，取信于民。这些语重心长的教导，对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干部队伍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邓小平提出必须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

^①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66页。

务终身制，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奖惩、升降、轮换、退休、退职、淘汰制度，解决干部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以及副职多、闲职多、效率低的问题。还要加强对干部的监督。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实践，是改进党的组织建设的创举。

3. 在党的作风建设方面的新发展。

第一，把党风问题提到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1980年，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邓小平很赞成陈云的话，提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①

第二，阐明了党风建设的实质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问题。邓小平指出，党的组织，党员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就会失去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所抛弃。

第三，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坚决惩治消极腐败现象，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邓小平多次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第四，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邓小平指出，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要从高级干部做起，纠正不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31页。

正之风也要从高级干部抓起，群众的眼睛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了。

4. 在党的制度建设方面，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发展。

第一，提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如何防止类似“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重演。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即10年动乱的原因及防止它重演的办法，不应只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中去找，而应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方面的缺陷以及社会、经济、思想根源中去找。他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①从这样的高度，如此深刻地论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第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党的制度建设的主要内容。邓小平提出要重视党的根本制度及基本制度的建设；论述了党的基本制度的主要内容：党的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生活制度和党内监督制度；并且区分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与具体制度（体制）。这是制度建设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是在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只有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才能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好地发挥出来。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293页。

第三，具体分析了我党现行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及党的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党内其它一些制度的具体内容及步骤方法。

（四）发展了关于党的领导的理论

关于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强调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关于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指出：“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①从这个论述可以看到，提出改善党的领导，不仅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而且因为我们的领导方式、领导制度和领导作风在很多方面与党所担负的新任务，面临的新形势不相适应。邓小平指出，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又指出，10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要求各级党委一定要拿出主要精力抓思想政治工作。

（五）始终强调要坚持两手抓，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两手抓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和主张。只不过在不同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的。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

^① 《邓小平论党的建设》第116、117、119页。

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① 有时，邓小平也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或讲，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虽然提法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贯的，就是强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方面抓改革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要抓思想和政治领域的工作，抓精神文明建设。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中再次重申：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这主要是针对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② 各种犯罪活动的增多，妨碍和影响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顺利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不仅经济要搞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可能显示出来，反之，如果只是经济繁荣，收入增加，而不注意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忽视思想政治领域的工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反过来也会阻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成功的意义也要打大大的折扣。怎样坚持两手抓，邓小平提出，一靠教育、二靠法制。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依靠群众民主自治的方法，解决好人民内部的矛盾；依靠法制的办法，严厉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制止各种丑恶现象的蔓延，并逐步地加以消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59页。

②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141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才能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坏人坏事。邓小平始终强调的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邓小平在新时期的党建理论，内容极为丰富，以上论述的内容只是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他的这些思想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四、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新的历史时期，是以改革开放为显著标志的。可以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经济、政治及思想意识观念的全面而深刻的伟大的社会变革。它不仅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会改变人们的观念形态、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给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心理状态带来巨大的冲击。党的建设是与党的政治路线紧密相联，并且为政治路线服务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坚持党的先进性提出了新要求

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党的建设带来了极其复杂的影响。一方面，它必然会促进

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给党的建设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也会给党的建设造成某些不良影响。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对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提出了新课题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竞争客观上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开拓进取、奋发有为的精神，摆脱因循守旧、碌碌无为的庸人作风；竞争机制的建立，也有助于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然而，竞争的优胜劣汰，会造成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之间收入的巨大差别。而党的宗旨要求我们既要保护竞争、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何把握这个“度”，需要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在精神领域，竞争也会刺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使党长期倡导的集体主义，大公无私观念受到严重冲击。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对坚持党员的党性原则提出了新要求

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及其所派生的平等观念，对于强化人们的民主意识，消除特权思想和等级观念，克服官僚主义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等价交换原则也会对党性原则产生冲击和腐蚀作用。在经济领域实行等价交换原则而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坚持党性原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因为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是相互影响的。一旦等价交换原则侵入党内，就会扭曲变形，导致把党的原则、党的权力和党内关系商品化的倾向。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原则，对党员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

市场经济的活动主体是求利的。求利性一方面促使人们提高

自身素质和科学决策水平，尊重知识和人才，勤俭节约，实干苦干，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分散决策，必然造成个人利益、本位利益同整体利益相分离的现象，使个人物质利益产生极大的诱惑力。求利性原则所体现的价值导向同以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为核心的价值观显然是矛盾的。现实生活中，党员既是工人阶级先锋战士，又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党员教育工作面临很大的困惑。一些党员可能见利忘义，把对党的理想、宗旨的忠诚变为对金钱和物质享受的追求，甚至唯利是图，丧失党性和人格，违法乱纪。

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原则，对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观念提出了新考验

市场经济要求活动主体享有充分的自主性，减少不必要的制约和束缚，才能提高对市场经济的适应和应变能力。自主性原则对于我们加快党政机构改革、简政放权、改进作风，以及提高党员的自立、自强精神有重要作用。但是，自主性原则的实现要求党员、干部要有更强的组织纪律观念，自觉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而现阶段还缺少健全的法律和规章制度来保证市场行为的规范化，因此对自主性原则的曲解和滥用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少数人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破坏党纪国法，损害党的集中统一。

总之，市场经济对党的建设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又有不容忽视的负效应。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否定党员投身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但也不能对其消极影响熟视无睹。正确的选择是兴利除弊：鼓励党员站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前列，经受考验，增长才干；同时抵制、克服消极影响，永远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二）扩大开放，要求党实行“排污不排外”的方针，处理好学习、吸收和抵制、消毒的关系

对外开放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往来，随着国门打开，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相互影响日益增加，党的思想建设置身于一个十分复杂的国际大环境之中。从本质上说，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是最开放、最善于学习的。我们党应当也能够在对外交往中吸收外国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作为思想建设的有益营养。但也要看到，国外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会乘虚而入，腐蚀我们的党员和干部。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是依附于他们的经济实力和物质财富的。在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遇到严重挫折、我国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条件下，一些人容易盲目崇拜西方文明，成为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如何在对外交往中贯彻“排污不排外”的原则，大胆吸收外国先进的经验和有益文化，同时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深化改革，要求党组织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有较大改变

传统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与活动方式，是与党的一元化领导和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相适应的。从旧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传统的一套就不完全适用了。例如，在农村如何对流动、分散的党员进行管理？在改革中成立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组织，党组织如何设置和发挥作用？股份制企业中，党的干部如何维护国有资产的利益？外资企业中的党组织如何坚持对外开放的正确方向，维护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这里面有一系列新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特别是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党组织从决策领导转为参与决策和保证监督，其地位、权限、

责任都与过去不同了。没有与新体制相适应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就会成为空话。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给党的建设带来挑战和考验，同时也为加强党的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发展的契机。因此，在新形势下，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把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使党能够更好地领导和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五、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

党的建设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基本原理和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验，又要适应新的情况，进行党的自身建设方面的改革，创造性地运用党的建设的基本原理，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发展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使党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前列，成为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更有力地领导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江泽民 1992 年 6 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等等，也要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因此，这就告诉我们，过去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应该结合新的实际继续运用和发展。发展就是创新。面对今天业已变化的形势和任务，面对大量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建设完全拘泥于传统做法，以不变应万变，是会脱离实际，流于形式的。但是，党建理论的创新发展决不是另起炉灶，抛弃全部传统去标新立异，而是把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形成了一整套符

合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要求的、建党治党的优良传统。其中包括：始终坚持党的根本性质、根本宗旨和最终目标，并以此要求全体党员；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把从思想上建设党放在首位；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铁的纪律；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选拔、要求干部；按照“团结——批评——团结”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处理党内矛盾，等等。这些优良传统，是党把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国情和党情所取得的成果，凝聚着党的历史经验和集体智慧，是党的立党之本。其基本精神和实质，在当前和今后都有指导作用和宝贵价值，抛弃这些传统，就会自毁优势，削弱甚至瓦解党。但是，必须把传统和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结合新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传统，使传统获得新的时代内容，才能保持生命力。例如，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在今天就要求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全党，使党的建设各方面都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在新形势下实践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带领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要根据改革开放和建设的实际提出新的具体要求，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应和时代需要相结合，赋予新的内涵和标准；在党组织的工作内容、工作方法和活动方式方面，更需要进行大胆创造，等等。我们只要做好坚持、继承优良传统和发展、创新相结合的大文章，就能不断开辟党的建设的新天地。

20 世纪就要结束，21 世纪就要来临。新世纪的曙光正在召唤着人们。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 70 多年，已经证明了她的伟大、光荣和正确。她所领导的事业业已取得无比辉煌成就。在未来的岁月里，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波折，但

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自身有能力去应付和驾驭这些困难和波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能够实现。到那时，中国共产党连同她所赖以存在的民族定将以其更加伟大的形象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

后 记

《延安时期毛泽东建党思想》一书是系统地、史论结合地阐述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一部专著。由范平、姚桓主编。绪论由范平教授所写。绪论阐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杰出贡献，论述了毛泽东建党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结合新的实际，提出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建党思想科学体系的重大课题。各章作者为：刘道福（第一章）；崔岩（第二章）；姚桓（第三章）；黄敦弘（第四章）；薛梅（第五章）；谭凯（第六章）；姚友群（第七章）；张晓华（第八章）；何晓莉（第九章）；苗佳瑛（第十章）。全书由范平、姚桓统改定稿，吴木审定。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杨植霖、周逸、吕澄、王仲清、刘鹏等都提出过宝贵意见，特表示感谢。我们真诚地期望读者对本书提出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

作 者

1993年5月